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對憂鬱與自殺意念之病理影響：

以關係霸凌受害青少年為例

The Psychopathological Effects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on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 Victims of Relational Bullying

施柏任

Po-Jen Shih

指導教授：陳淑惠 博士

Advisor: Sue-Hue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June 2023



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施柏任 先生所提論文 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對憂鬱與自殺意念
之病理影響：以關係霸凌受害青少年為例

經本委員會審議，符合 碩 士學位標準，特此證明。

論文考試委員會

主席 王心子
委員 黃云萍 陳淑惠
王心子 _____

指導教授：陳淑惠

所主任：周泰立

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26 日




誌謝

整個大學加研究所的學涯熬過九個年頭，總算是把論文完成了。回顧踏上心理學之旅程，持續往目標邁進。當時在推甄的路口，帶著青少年的研究計畫進入研究所，再一路修改、付諸實行、撰寫到完成，也算是保有初衷做出些成果。未來順利的話，就以臨床心理師的身分繼續以助人工作貢獻於社會吧。

首先，非常感謝從大三就願意收留我進研究室的淑惠老師，能跟隨老師學習是我的萬分榮幸！青少年霸凌研究有其困難性，經過老師的引導、建議我才能逐步建立起完整架構，探討青少年憂鬱和自殺的病理機制。除了研究以外，臨床工作的態度、專業知能、以及思考邏輯等也在耳濡目染中，向老師學習了許多，相信未來的我帶著這些養分，會成長為一位足夠好的臨床心理師。此外，也非常感謝劉同雪老師、黃玉蓮老師撥空擔任我的口試委員，兩位分別在憂鬱和自殺、臉部情緒辨識領域皆有所專精，給予我十分深入的提點，這些回饋讓我重新整理思路，最後才能將論文編修的更完整。

收案期間受到母校李侶菽老師的大力協助，一口答應後也給予我許多建議，因應教育現場調整收案形式，並且找到其他願意幫忙的輔導老師，再連絡各班導師。沒有侶菽老師的奔波，我絕不可能完成這份研究，致上十萬分的謝意，祝老師退休愉快！我也要感謝所有協助我的母校輔導主任、組長、老師及學生們，你們的參與對這份論文的貢獻難以言表。

研究所的生涯中，就屬 406 研究室從長到幼的陪伴最熟悉也最溫馨。謝謝同屆的好朋朋們鄭晴、舒亭、亭妘、佳嫻，雖然大家都提前離我而去，但一起打拼



的日子彌足珍貴，無論是學術研究上的討論，或是八卦閒聊的打鬧，都是甜美的回憶。感謝蔚群、慈怡、欣烜為我解惑許多行政流程的問題，也常常在喝咖啡、吃甜食的時光聽我碎碎念。感謝淑欽學姊在自殺議題上提供不少寶貴的建議。前前後後的學長姊、學弟妹，垂品、書凡、林近、孟頻、黃蓉、靖雅、晉良、祁峻、潘言、子銘、劉靜、若喬、洛涵、余絮，感謝各位在 406 的陪伴、關懷以及各種小小卻溫暖的協助。另外，我想特別提到幸珊，妳的離開讓我重新看待生命，也擴充了論文主題，這份研究因為妳而更有了意義。然後是 R08 好同學們，麗心、璟容、葛瑞、承運，感謝大家在艱苦路上的相互扶持，祝福我們一路順風！

很幸運能遇見珮琪，雖然我們先後經歷實習和論文的摧殘，分隔兩地都受了不少苦，但你還是一直陪在我的身邊，我們可以整天幹話連發，也可以認真討論學術和研究，還有一些臨床心理師的生命哲學（？）。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聽我訴苦、給我打氣。兩年多的時光真的很感謝妳的支持與陪伴，雖然這段時間真的很少見面，希望熬過去以後，我們都可以愈來愈好！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雖然常聽到爸爸媽媽唸我書讀太久，但還是一直支持我走到這裡，不管是物質層面、或是關心我的進度與生活。我終於要畢業了，爸媽可以不用擔心了，臨床心理師用愛發電還是賺得到錢啦！然後是妹妹，我只能說當妹寶當的很開心，果然賺錢真好。除了錢以外，工程師思維也幫我解決了關鍵的收案困難，沒有這個意見我可能真的沒辦法畢業。

長年的學涯即將在此畫下句點，義無反顧走上臨床心理師的這條路坎坷崎嶇，其中有許多磨練，也有許多貴人指引與協助，接下來出了社會又是全新的挑戰。未來的生命旅程會如何我不太可能預知，但我相信這些經驗和養分，都會成為我的一部份，帶著他們繼續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位足夠好的心理師，活出自己滿意的人生。再次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們，還有感謝我自己！



摘要

目的：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盛行率的提升，嚴重影響其性格與身心發展，現今已難以忽視之。本研究奠基於脆弱質－壓力假說（diathesis-stress hypotheses）與社會訊息處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之憂鬱病理的觀點，並結合自殺人際理論，嘗試從人際與社會認知的角度，探討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對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的病理性影響。此外，關係霸凌亦對人際需求提升之青少年造成負面影響，為重要的人際壓力事件。故本研究建構一霸凌影響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的病理模型，探究脸部情緒辨識能力、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之間的關係。**研究方法：**研究首先編製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重新編譯臺灣中文版之人際需求問卷，並檢驗二者之心理計量特性。繼而以高雄某國中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n = 210$ ），透過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與自陳式量表蒐集資料。**研究結果：**（一）難過情緒辨識與憂鬱症狀為負相關，不具情緒一致性。（二）憂鬱症狀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聯。（三）不同情緒的辨識能力對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的病理性影響有所差異。（四）女性之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關聯較男性強。（五）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在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的關係中具調節效果。**討論：**本研究結果可於教育及臨床場域中，提供對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病理嶄新的視角，協助拓展對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之病理性影響的瞭解，並促進關係霸凌的預防與介入策略的發展。

關鍵詞：青少年、憂鬱、自殺意念、脸部情緒辨識、關係霸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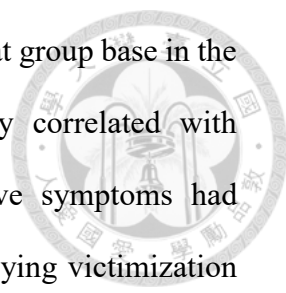
The Psychopathological Effects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on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 Victims of Relational Bullying



Po-Jen Shih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among adolescent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ir personality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us difficult to ignore. Based on the diathesis-stress hypotheses an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as well,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sychopathological effects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on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adolesc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cognition. Moreover, due that the interpersonal needs have increased for adolescents, relational bullying, an important interpersonal stress event, has brought in huge negative impa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psychopathological model of bullied events,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adolescents,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experience of rela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 First,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ranslated the 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and tested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Next, a total of 210 seventh graders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Kaohsiung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group-



version of DANVA-II-TW and self-report measures were collected at group base in the classroom. **Results:** (1) Recognition of sadne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suggesting no mood-congruent effect. (2)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 of experience of rela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 (3) Different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ies displayed different psychopathological effects on experience of rela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4) For gir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of rela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boys. (5) Experience of rela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displayed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iscussion:**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concerning the psychopathology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adolescents, and can inspire more evidence-based programs for educational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Moreover, it will help to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pathological effects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so thus to bette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relational bully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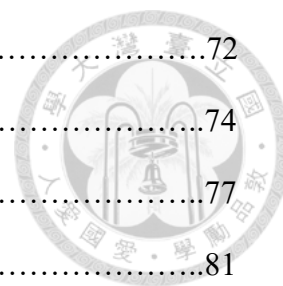
Keywords: adolescents, depression, suicide ideation,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relational bullying



目次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表目次.....	ix
圖目次.....	x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與自殺.....	2
第二節 青少年憂鬱之社會認知病理機制.....	6
第三節 關係霸凌受害及青少年憂鬱病理.....	15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假設.....	21
第二章 研究一：研究工具之建立.....	25
第一節 研究方法.....	25
第二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29
第三章 研究二：病理機制之模型檢驗與分組差異.....	41
第一節 研究方法.....	41
第二節 研究結果.....	47
第四章 綜合討論.....	71
第一節 臉部情緒辨識與憂鬱情緒一致性.....	71

第二節 SEM 模型中的中介效果.....	72
第三節 性別差異.....	74
第四節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之差異.....	77
第五章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81
第一節 研究貢獻.....	81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83
第六章 參考文獻.....	85
附錄.....	101
附錄 1：個人基本資料表	
附錄 2：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附錄 3：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	
附錄 4：臺灣版兒童與青少年憂鬱量表 (CDI_TW)	
附錄 5：臺灣中文版人際需求問卷 (IN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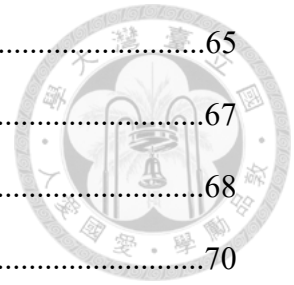




表目次

表 1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各題項之相關矩陣.....	31
表 2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	33
表 3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單因子模型因素負荷量.....	35
表 4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量.....	49
表 5	各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	50
表 6	SEM 模型中各觀察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51
表 7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52
表 8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之 Welch 及 Brown-Forsythe 檢定摘要表.....	52
表 9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非中性刺激 CR 之 Games-Howell 事後檢定摘要表.....	53
表 10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中性刺激辨識次數之 Games-Howell 事後檢定摘要表.....	53
表 11	不同獨變項之 SEM 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57
表 12	不同獨變項之 SEM 模型中介效果統整.....	58
表 13	性別對各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59
表 14	男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61
表 15	男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中介效果統整.....	61
表 16	女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63
表 17	女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中介效果統整.....	63

表 18	高低受凌組對各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65
表 19	高受凌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67
表 20	高受凌組不同獨變項模型之憂鬱症狀中介效果統整.....	68
表 21	低受凌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70





圖目次

圖 1	自殺人際理論模型圖.....	5
圖 2	修正版社會訊息處理論模型圖.....	10
圖 3	研究假設模型.....	23
圖 4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陡坡圖.....	32
圖 5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單因子模型.....	35
圖 6	人際需求問卷 (INQ) 之二因子模型.....	37
圖 7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練習題刺激材料範例.....	43
圖 8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刪除之刺激素材.....	47
圖 9	以 tCR 為獨變項之 SEM 模型估計結果.....	54
圖 10	以 HCR 為獨變項之 SEM 模型估計結果.....	56
圖 11	以 SCR 為獨變項之 SEM 模型估計結果.....	57
圖 12	男性組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60
圖 13	女性組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62
圖 14	高受凌組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66
圖 15	低受凌組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68



第一章 緒論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廿一世紀初指出鬱症（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MDD）將會是本世紀影響人類最劇的疾病之一，同時亦有患者年輕化的趨勢。臺灣青少年的MDD盛行率居高不下，達到 8.7%，遠高於 WHO 對整體人類估計的 3%（陳為堅，2001），而近年本國兒青族群的MDD盛行率也稍高於過去文獻，並隨年級增加有提升趨勢（陳儀龍，2018）。青少年憂鬱的問題除了反應在盛行率的提升以外，全球性的報告中更提及MDD在造成人類失能、增加整體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的疾病中名列前茅（GBD 2015 Disease and Injury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Collaborators, 2016）。此外，臨床上不乏憂鬱合併自殺風險之青少年個案，自殺亦漸成為近年臨床與社會大眾皆關注之議題；國內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三到七年級學生中自殺意念盛行率達 7.9%，且自殺長年居於12歲至17歲青少年死因第二名與第三名之間（陳儀龍，2018；衛生福利部，2022a）。有國內學者指出，青少年憂鬱症狀能預測其日後社會心理發展問題、罹患MDD風險提高、自殺或自傷意圖等因子（王齡竟、陳毓文，2010）。有鑑於此，釐清青少年憂鬱與自殺背後之心理病理機制，為研究值得關注之議題，更可以研究證據做為發展前端預防、後端介入方案之基礎。

校園霸凌問題為影響青少年族群身心健康之重要現象，至今累積不少相關文獻，國家政策亦積極預防。然而，相較於肢體、言語等常見霸凌行為，關係霸凌較易隱蔽而難以察覺，傷害卻可能更加嚴重。青少年族群的人際需求提升，與同儕的人際互動經驗成為其性格與身心發展的重要基礎，然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

可能使其發展歷程不甚健全，引發後續身心問題。關係霸凌受害的風險可能源自於個體對社交線索辨識、評估能力的缺損，尤其是臉部表情等非語言的情緒性線索，辨識能力缺損者易出現不適當之社交行為，進而提高成為受害者之風險，挫敗的人際互動經驗也使受凌者之憂鬱、自殺風險提高。本研究以Beck（1976）的憂鬱認知模型為基礎，並透過社會訊息處理論（Crick & Dodge, 1994; Dodge, 1986）與自殺人際理論（Joiner, 2007）的解釋，進一步建立一描繪青少年憂鬱背後可能之病理機制的假設模型。


以下將分別針對青少年憂鬱與自殺、青少年憂鬱之社會認知病理機制、關係霸凌受害及青少年憂鬱病理等議題，包括自殺相關理論、憂鬱的社會認知與情緒處理、憂鬱的非語言情緒訊息處理、青少年人際壓力與校園霸凌等，一一進行文獻整理與闡述。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與自殺

壹、憂鬱與自殺的嚴重性與關聯

鬱症（MDD）為現今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除了造成個體失能，亦增加整體社會成本。過去多認為鬱症常見於成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雖未獨立列出兒童與青少年憂鬱疾患章節，卻已經於相關準則進行註記，包括鬱症核心症狀「心情憂鬱」部分，兒童與青少年之症狀可為「易怒」；持續性憂鬱症（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PDD）持續時間若為兒童與青少年僅需一年，可見兒童青少年憂鬱與成人憂鬱之臨床表徵稍有不同。

近年美國青少年的鬱症盛行率逐年提升，2016年臨床樣本之終生盛行率與12個月盛行率分別達18.1%、12.9%（Lu, 2019），而亞臨床或社區樣本自陳之憂鬱



症狀亦具愈來愈嚴重的趨勢，造成顯著的認知、社會功能等缺損，影響注意力或理解力使課業表現下滑，人際關係可能因缺乏社交動機等而難以維持；而功能缺損可能是更長遠的負面影響，與成人期失業、離婚等有關。臨床方面，青少年期即罹患鬱症者，未來更容易復發，罹患其他精神疾病（如焦慮疾患）風險也較高，亦能預測成人期之自殺風險；即使憂鬱症狀未達診斷標準，未來罹患鬱症之風險也較高（Clayborne et al., 2019; Hankin, 2006; Johnson et al., 2018; Rudolph et al., 2009）。憂鬱盛行率的提升亦具有性別差異，Van Droogenbroeck等人（2018）發現，女性的憂鬱盛行率在2008至2013年間大幅上升，然而男性卻未出現此現象。過去文獻即認為憂鬱盛行率具有性別差異，不分年齡女性對男性之勝算比為1.95，然青少年期之性別差異更為顯著，兒童到青少年期之勝算比逐漸上升，13至15歲時為最高峰，高達3.02，可見女性青少年發展憂鬱的風險顯著高於男性（Salk et al., 2017）。

全球各地青少年族群的自殺率皆逐年上升，而本國15到24歲族群的粗自殺率，由十年前的每十萬人約6人自殺身亡逐漸爬升，2021年時達到每十萬人就有9.6人死於自殺，通報人數亦為創新高的12316人，佔總通報人數的四分之一，自殺身亡亦常年名列該族群前三大死因（衛生福利部，2022a, 2022b）。此現象引起學者注意，試圖探究青少年族群自殺行為的病理機制與相關風險。過去文獻顯示，出現自殺嘗試的青少年高達九成有一個以上的精神疾病診斷，其中更有將近八成符合鬱症準則，其餘包括焦慮疾患、物質使用障礙症等，此外，青少年自殺身亡者生前有鬱症診斷之比例亦高達六成（Cash & Bridge, 2009）。針對憂鬱與自殺關聯性的研究發現，憂鬱症狀能預測自殺相關行為的發生（Allison et al., 2001; Horwitz et al., 2017; Reinherz et al., 1995）。過去的DSM-IV-TR於鬱症診斷中，包含一條「重覆與死亡有關的念頭」的準則，而DSM-5於此條添加了自殺意念或嘗試，將自殺相關行為視為憂鬱症狀的一環，並且於〈未來有待研究的情況〉章節納入「自殺行為障礙症（suicide behavior disorder, SBD）」，提及自殺相關行為納為診斷的效度，以及對臨床工作的益處（Fehling & Selby, 2021）。綜上所述，

青少年族群憂鬱與自殺之嚴重性於現代已是不可忽視的議題，影響其身心發展與生活功能，而兩者之間更具有顯著的關聯性。



貳、自殺人際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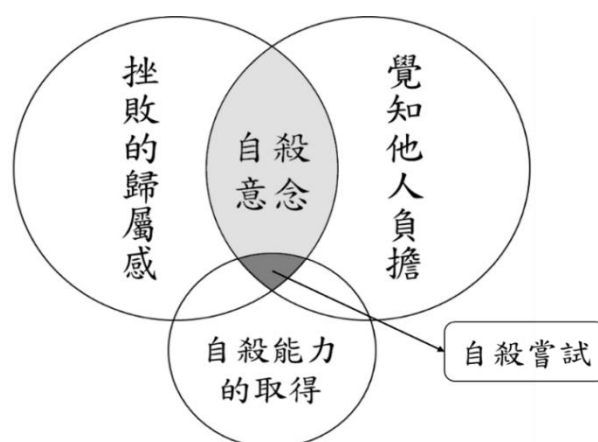
人際關係與互動一直是青少年研究所關注的議題，一般認為個體對人際互動的需求會在青少年期有所提升，他們更渴望發展與維持友誼關係，並進一步以友誼為基礎展現出對親密感與歸屬的需求（Bakken & Romig, 1992; Ellerbrock et al., 2014）。個體發展至青少年階段時，人際關係網絡經歷緊密、複雜的重組（例如與過去同儕團體的分離、投入親密關係等），更需要投入情緒與社會支持資源應付同儕互動，資源不足或人際壓力過高的個體更容易出現適應困難與心理困擾（潘奕瑄，2015；Mathieson et al., 2014; Rudolph, 2009）。

有鑑於此，本研究回顧自殺相關理論模型，參考Joiner（2007）基於人際需求所建構之自殺人際理論，以探究青少年自殺相關行為之人際病理機制。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自殺人際理論認為，個體具有與社會連結的基本需求，當個體受他者長期且穩定的關懷，且彼此具有頻繁且愉悅的正向互動時，便產生了歸屬感。自殺的渴求源自於基本需求未被滿足的強烈心理困擾，即個體與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edness）斷裂，使其相互扶持關係減少、引發孤寂感所致，稱之為挫敗的歸屬感（thwarted belongingness）。挫敗的歸屬感是一種動態的認知與情感狀態，受個體內在與人際關係的影響，是一種連續向度的構念。然而歸屬感需求未被滿足者並不一定會有「挫敗感」，若個體缺乏與潛在親和（affiliative）對象的面對面互動，或是受其拒斥，使個體無法投入親和關係與行為的現象才引起嚴重的挫敗歸屬感（Maner et al., 2007）。研究上亦發現持續的挫敗歸屬感會引發後續的自殺意念（Cacioppo et al., 2006）。除了挫敗的歸屬感以外，若個體與社會連結的歷程中，產生「在家庭中我是可被消耗拋棄（expendable）的一員」或是「別

人沒有我會更好」等想法，進而衍生自我累贅感與自我憎恨，即稱之為覺知他人負擔（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同樣的，這種感受也是一種動態的認知與情感狀態，受個體內在與人際關係的影響，是一種連續向度的構念。過去文獻顯示，覺知他人負擔能預測個體後續自殺意念，亦為自殺相關行為的重要風險因子（Brown, et al., 2002; Sabbath, 1969）。Joiner（2007）認為挫敗的歸屬感與覺知他人負擔兩項因素，即構成近端的被動自殺意念，於其理論中扮演了自殺相關行為最基礎的人際風險因子，並與青少年的人際議題息息相關。然而，對遭遇到人際困難的青少年來說，前述二個人際風險因子預測自殺意念的效果卻有所差異。在受到慢性人際壓力的青少年中，僅有覺知他人負擔能預測後續的自殺意念，挫敗的歸屬感則不具顯著預測效果（Buitron, et al., 2016; Puzia, et al., 2014）。此外，此理論亦能解釋自殺意念於人口學變項中差異，女性對於親密人際的需求常高於男性，故人際需求不滿足引起自殺意念者也更多。後續亦據此理論編製了人際需求問卷（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INQ; Van Orden et al., 2012）作為評估自殺意念之工具，而無論是兩大人際因素分量表分數或全量表皆能預測自殺意念（Ellerbrock et al., 2014; Opperman et al., 2015; Van Orden et al., 2012）。

圖 1

自殺人際理論模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Van Orden et al. (2010).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576.

自殺意念由被動發展成主動的關鍵在於無望感 (hopelessness)，而由意念發展為嘗試的關鍵則為自殺能力的取得 (acquired capability)。人類對生存的本能使個體對疼痛與死亡產生恐懼，使個體產生自殺意圖並進一步計畫的關鍵即為不再畏懼死亡，而當個體對疼痛耐受度的認知評估跨越了行動閾值時，便會執行自殺嘗試。雖然此理論對自殺行為歷程提出了完整的模型架構，亦同時以個體內在 (intrapersonal) 與人際外在 (interpersonal) 雙面向解釋自殺病理，自殺相關行為的機制仍有許多可能性，此模型之貢獻在於標示出高風險之個體，進行事前預防與事後介入 (Van Orden et al., 2010)。本研究認為，組成被動自殺意念的兩大人際因素與青少年族群人際需求提升之特性相互呼應，及早標示高風險青少年個體，並進行介入、預防後續可能之自殺行為有其重要性，故將參考Joiner (2007) 自殺人際理論中前端的自殺意念部分，進行後續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病理機制之探究。然而，有文獻顯示兩大人際因素對自殺意念預測效果之差異，此部分仍有待驗證之。

第二節 青少年憂鬱之社會認知病理機制

壹、認知病理模型與脆弱質－壓力假說 (diathesis-stress hypotheses)

早期的憂鬱病理多從認知的角度切入，認為個體遭遇負向生命經驗時，對該經驗之思考、態度與解釋等認知面向皆有可能引發憂鬱情緒，並造成鬱症初發 (onset)、維持 (maintenance) 及未來復發 (recurrence) 的可能性 (Joormann, 2009)。最主要的認知病理模型有三：Beck (1976) 的基模理論 (schema theory)、Bower (1981) 的連結網絡理論 (association network theory) 與Abramson等人 (1989) 提出的無望感憂鬱模型 (hopelessness model of depression)。

Beck (1976) 認為「基模 (schema)」受到個體過去經驗的影響，作為其篩

檢環境刺激、進行認知處理的依據。憂鬱患者可能在發病以前，即具不適應性的負向基模，使他們在處理外界訊息時產生系統性的認知偏誤，傾向對中性或模糊刺激進行負面解釋，而此負向基模即為憂鬱的脆弱質之一。平時此負向基模與認知偏誤是潛在的，不易引起情緒困擾，然而當壓力事件發生後，負向基模與認知偏誤受到活化，對周遭環境的負面解釋產生了憂鬱情緒，憂鬱情緒再干擾認知處理的歷程，漸形成憂鬱的負向循環，並構成扭曲的憂鬱認知模式，對於自我、世界與未來三面向充斥了負向的意念，稱作「負向認知三角（negative cognitive triad）」。

Bower (1981) 認為連結網絡由許多節點 (nodes) 構成，各節點包含了不同的記憶內容，當單一節點受環境刺激活化時，活化將會擴散到與之連結的其他節點。雖然連結網絡並非針對憂鬱所提出的理論，但節點活化閾值的改變和連結網絡的重組，被認為是憂鬱的脆弱因子，與負面情境相關的節點更容易被活化，且負面的認知、情緒等節點更容易形成同一組高關聯性的網絡 (Ingram, 1984; Teasdale, 1988)。此連結網絡重組的現象相似於Beck (1976) 的基模理論，適應不良的認知模式可能為先於憂鬱症狀存在的脆弱質之一。

無望感憂鬱模型啟發自「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此理論認為個體反覆經歷無法控制的負面情境後，不再嘗試迴避負面刺激的消極行為狀態，此狀態可能導致憂鬱症狀的產生 (Seligman, 1972)。Abramson 等人 (1978) 據此提出了「習得性無助修正模型 (Reformulation of Learned Helplessness Model)」，此模型提出個體在面臨壓力事件時，歸因風格包含了三種向度，包括：內在或外在 (internality or externality)、穩定或不穩定 (stable or unstable) 及普遍或特定 (global or specific)。若個體的認知風格傾向將遭遇壓力事件歸因於內在、穩定而普遍的，發展出憂鬱症狀的風險較高。後續研究加入脆弱質－壓力假說 (diathesis-stress hypotheses) 再度修正理論，提出無望感憂鬱的認知模型，認為個體穩定、普遍的歸因風格，災難化壓力事件後果，再加上對壓力事件的內歸因引起的低自尊、失價值感等三個條件之湊合，才構成憂鬱的認知脆弱質，並透過

壓力事件的促發引發無望感憂鬱 (Abramson et al., 1989)。

Abramson 等人 (1989) 的發現聚焦於認知內容的脆弱性，Beck (1976) 與 Bower (1981) 則聚焦於認知的歷程，共同點為三個理論皆提出了認知脆弱質透過壓力事件促發後續憂鬱症狀的假設。若認知因素於憂鬱病理中實為脆弱質之存在，患者於發病前或緩解階段仍應具此認知特性。過去的橫斷式研究多呈現不一致的結果，然縱貫式研究中發現，無論樣本為兒童、青少年或成人，前述認知脆弱質與負向生活事件之交互作用，皆能預測後續憂鬱症狀的嚴重程度，且具有前述認知脆弱質之群體，發展成鬱症之風險也較高 (Alloy et al., 2006; Joormann, 2009)。Abela和Hankin (2008) 聚焦以青少年樣本為主之文獻回顧指出，部分研究證實此族群的憂鬱病理機制可以用認知脆弱質—壓力假說來解釋，而其餘文獻認為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為認知發展上的差異。從Beck (1976) 的角度思考，基模在個體青春期末至成年早期間，仍需要持續性的新經驗重構並穩定之；從Abramson等人 (1989) 的角度思考，個體至少需要發展到形式運思期，才能學會形成歸因風格所需的抽象推理能力。此二理論中的認知因素，皆因青少年族群尚未發展成熟而難以形成穩定的脆弱質，Hankin (2005) 發現這些認知脆弱質至少在六年級以後才會逐漸形成穩定的特質，且穩定度於青春期末仍持續成長。此外，壓力事件對個體的影響也會因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尤其是青少年族群更關注人際關係的改變，故兩者交互作用對憂鬱的影響也就不同。

綜上所述，無論於成人或青少年中，認知因素皆為憂鬱病理中的重要角色，且透過脆弱質—壓力假說的解釋，認知脆弱質透過壓力事件的促發，導致個體發展出憂鬱症狀。然脆弱質—壓力假說於青少年族群的研究發現不甚一致，故本研究將參考前述認知模型，進一步探究青少年族群之憂鬱病理機制，檢驗人際需求增高之特性是否與特定認知脆弱質有關，且透過特定之負向生活事件促發憂鬱症狀。



貳、社會認知與訊息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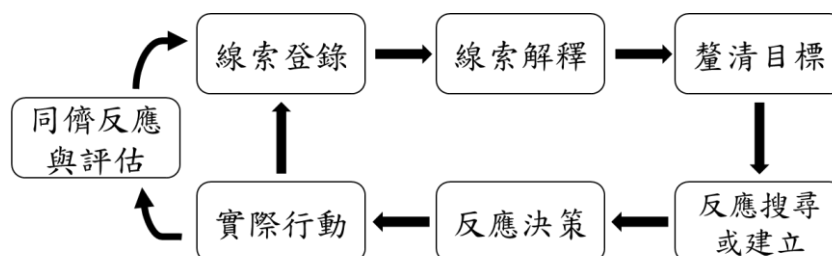
早期對青少年社會適應與心理病理的研究，其觀點多非聚焦社會認知發展的角度，而是認為認知架構是廣泛影響個體適應問題的，這一類屬於訊息轉化論（information-transformation theories）的文獻指出，個體過去的行為、經驗在記憶中被轉化為知識架構（如基模、連結網絡、歸因風格等），此架構將影響其未來處理外界訊息與產生行為的傾向，包括前述Beck(1976)、Bower(1981)、Abramson等人(1989)的憂鬱認知模型（Dodge, 1993）。本研究回顧此類文獻，青少年對其人際互動的負向認知評估為憂鬱的脆弱因子，例如對自己之社交技巧偏向低估、對他人情緒或動機的辨識偏誤、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的期待等，這些負向認知評估擴及自我、世界與未來的看法，亦常為內在、穩定而普遍的，易導致挫敗的人際互動經驗，而此經驗伴隨負面情緒使個體對人際的負向認知評估更加穩固（Joiner & Timmons, 2009; Joormann, 2009; Rudolph, 2009）。

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ies）的出現將青少年心理病理的研究聚焦在社會認知層面，比起廣泛的認知架構對人際層面的影響，個體從轉化社交訊息到非適應性行為產生之間，應具有一套普遍的心智歷程，而此歷程與心理病理機制有關（Dodge, 1993）。Dodge（1986）整合此歷程可能包含的各認知理論，如注意力的自動化搜尋、記憶的儲存與提取、關聯記憶的搜尋、分散與階層式平行處理、問題解決能力等，提出社會訊息處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社會訊息處理論認為此普遍的心智歷程始於登錄（encoding），依序為表徵與解釋（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反應搜尋（response searching）、反應決策（response decision），最後為行動（enactment）。「登錄」為個體於所處社交情境中，運用感官知覺、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擷取訊息並儲存於短期記憶的過程。「表徵與解釋」為個體將登錄的訊息及與其相似的記憶進

行交互比對，據此產生解釋，並依其情緒需求或社交目標賦予情境意義的過程。個體過去的社交經驗以制約的形式，儲存於長期記憶中，形成一套連結網絡，「反應搜尋」則為個體對社交情境產生表徵後，於網絡中活化相關行為的過程。「反應決策」為個體考量社會規範（如道德）、個人社交目標、預期行為後果等，評估活化的行為中何者對其最有利的過程。最後做出行為決策並付諸「行動」，包括語言、動作、自律神經活動、神經內分泌等任何大腦主導的身體反應。理論最初為線性的模型，Crick和Dodge（1994）為了更精準地描繪青少年社會認知的心理歷程，修正為環形結構，以線索登錄（encoding of cues）為始、第二步為線索解釋（interpretation of cues）、第三步釐清目標（clarification of goals）、第四步反應搜尋或建立（response access or construction）、第五步反應決策（response decision），最後一步為實際行動（behavioral enactment）。理論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修正版社會訊息處理理論模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Crick & Dodge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1), 76.

修正版理論加入了「釐清目標」此步驟，認為青少年的社交行為是目標導向，且面對不同社交情境時會修正、甚至建立新的目標；修正版亦於原有步驟補充更多細節，包括「線索解釋」中有關情境因果、自我效能、他人動機等面向的評估，「反應搜尋或建立」中個體面對陌生情境需要建立新的行為反應。青少年處理同

儕間人際互動的社會線索、產出相應的行為後，透過同儕的反應、評估做為回饋，再回到程序的第一步、進行下一次的循環（Crick & Dodge, 1994）。

過去文獻發現，具憂鬱症狀之青少年多具有人際互動困難，他們可能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上具有偏誤，包括登錄較多的負面訊息、傾向將社會線索解釋為負面（如被拒斥的徵兆等）、反應搜尋時活化較多憂鬱相關的人際記憶、反應決策時傾向將行為後果評為負面且無法達成其人際目標等。綜整而言，憂鬱青少年具有更多負向、更少正向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這些文獻認為，脆弱質－壓力假說仍然可以解釋社會訊息處理歷程與青少年憂鬱的關聯，社會訊息處理的偏誤為一種社會認知的脆弱質，而人際互動困難即為其壓力事件促發青少年憂鬱的結果（李宛津等人，2009；高民凱、林清文，2008; Luebbe et al., 2010; Quiggle et al., 1992）。

若以社會訊息處理的架構回顧過去的憂鬱認知模型，不同訊息轉化形式仍與處理歷程中特定步驟具相似之處。負向基模使個體登錄訊息時，傾向篩去正向線索、對負向線索的注意力也較強，而在表徵與解釋時，更容易賦予失敗、失落等負面意義；內在、穩定而普遍的歸因風格為特定的表徵傾向，無望感則使個體傾向於反應決策時，將行為後果評估為無效（Dodge, 1993; Quiggle et al., 1992）。Ingram（1984）則從連結網絡的角度思考，與憂鬱相關的記憶活化影響了訊息處理歷程，個體傾向登錄與記憶內容相關的訊息、搜尋出與過去相似的行為，而受情緒干擾有限的認知資源，則使表徵與解釋產生扭曲，最後產出的行為反應與後果又引發憂鬱情緒，形成新的節點，成為負向的循環。Dozois和Dobson（2001）研究憂鬱個體自我表徵系統如何影響社會訊息的處理，他們發現憂鬱個體回憶較少正向訊息，處理歷程中也較少把正向訊息與自己連結。後續Gotlib等人（2004）更發現憂鬱個體更容易注意到和難過情緒有關的社會訊息，也更容易回憶起這些訊息。綜整而言，過去的認知模型主要影響了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前端步驟，包括訊息登錄與表徵階段；理論亦整合了過去的認知模型，從廣泛的認知層面聚焦到社會認知，再從社會認知歷程延伸到行為層面，提供了青少年憂鬱病理研究新

的整合視角。



參、非語言情緒訊息：臉部情緒辨識與憂鬱

一、情緒歷程

Crick和Dodge (1994) 曾於社會訊息處理論中提及情緒對認知歷程的影響，雖非其理論主軸，卻也認為情緒為社會認知中的重要因素。Lemerise和Arsenio (2000) 據此提出情緒歷程 (emotional processes)，他們認為情緒與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為一體兩面，情緒幫助個體處理社會訊息的各種特徵，包括辨識他人動機、促進溝通與互動，並進一步引導其產出適應性社交行為；人際互動對象的情緒線索即為重要的社會訊息，歷程前端的登錄與表徵影響了個體調節社交行為的能力。

在過去社會心理學有關社交技巧或溝通的研究中，情緒線索的辨識與解釋即為重要的議題，而其中又可分為語言與非語言訊息兩種。語言訊息的情緒表現於其內容本身，較顯而易見；非語言訊息包括了臉部表情、聲音語調、穿著打扮與身體姿勢等，功能如輔助個體語言表達、傳遞額外內容等，亦蘊含了豐富的情緒線索，日常生活中不乏透過非語言訊息傳遞的微小或強烈情緒，甚至非語言表達的情緒與語言不一致的情形，而這些非語言情緒訊息已是人際互動經驗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中又以臉部表情最被廣為研究 (黃玉蓮，2006；曾懷萱，2003)。

有關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人際互動最早於1872年由達爾文提出 (Darwin & Prodger, 1998)，他認為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是演化上有利於生存而保留下來的生物本能，使人類能透過情緒辨識趨吉避凶，建立與維繫人際關係並促進社會連結。早期研究認為臉部情緒的表達與辨識雖然是共同演化的結果，卻因為在不同文化與社會背景下學習而有差異，直至Ekman等人 (1972) 才逐漸改觀。Ekman等人 (1972) 提出六種基本情緒，包含高興 (Happiness)、生氣 (Anger)、難過 (Sadness)、害怕 (Fear)、厭惡 (Disgust)、與驚嚇 (Surprise)，認為六大基本情緒具有文

化普遍性與穩定性，不受特定社會脈絡的影響（Ekman, 1992a; Ekman, 1992b）。Ekman和Friesen（1976）根據六大基本情緒並額外加入中性刺激，建構出一套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測驗工具，以此工具進行的研究結果與文化普遍、穩定性的假設一致。Shariff和Tracy（2011）以Darwin的理論為基礎，整理了近代演化心理學對於非語言情緒訊息的研究，提出兩階段模型（two-stage model）。他們認為多數的非語言情緒訊息最初是物種為了適應環境而出現的，以「害怕」為例，當個體辨識出環境中的威脅刺激後，會產生如呼吸加速、提高警覺、臉部肌肉活動等反應，臉部肌肉活動原始的目的為擴大眼距、提升眼動速度以偵測威脅刺激；族群內逐漸將此臉部肌肉活動與「害怕」的情緒連結，辨識其他個體的脸部肌肉活動而成功迴避威脅刺激的經驗形成正回饋，加強了此「表情」的情緒意涵，形成非語言情緒訊息的傳遞與接受，原始的肌肉活動作為溝通的社會性功能才開始存在。從演化與生存的角度來看，Thompson和Voyer（2014）認為「適應威脅假說（fitness threat hypothesis）」可解釋過去文獻中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性別差異現象，女性為了嬰兒的生存，對具有潛在威脅的情緒訊息較敏感，以利保護行為；此假說與過去文獻中，女性於脸部負面情緒的辨識能力顯著優於男性的結果相互呼應，且此現象於兒童或青少年時即存在（Lawrence et al., 2015）。

早期對憂鬱的認知脆弱質研究大多採用文字刺激、或是點偵測作業（dot-probe task）等方法，此類文獻認為憂鬱個體的認知偏誤屬於注意力層次；近代逐漸採用脸部情緒照片作為研究刺激，認為憂鬱個體的認知脆弱質不只影響注意力層次，亦影響其社會認知層面，即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的缺損與憂鬱症狀有關（Alloy et al., 2006; Gotlib et al., 2004; Hale, 1998; Joormann, 2009; Mogg & Bradley, 2005）。過去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的文獻中，發現「難過（sadness）」情緒臉的辨識與憂鬱症狀最具關聯，多數認為憂鬱個體的脸部情緒辨識偏誤與其情緒狀態一致，亦即對難過情緒臉的辨識準確率較高、反應時間較短、較易將中性或其他情緒臉辨識為難過等，部分研究結果更擴及個體對其他負面情緒（生氣、害怕等）辨識準確率較高、對快樂情緒臉辨識準確率較低（陳爾璞，2008；黃玉蓮，

2006; Bourke et al., 2010; Gollan et al., 2010; Milders et al., 2010; Weightman et al., 2014)。然，另有部分研究結果發現憂鬱個體並不存在偏誤與情緒狀態一致的現象，憂鬱個體在難過情緒臉的辨識準確率反而低於健康控制組，尤其在臉部情緒刺激強度愈低時此現象愈明顯（Csukly et al., 2009; Joormann & Gotlib, 2010; Leppänen et al., 2004; Surguladze et al., 2004）。

若將樣本限縮於兒童與青少年族群，研究結果趨勢與成人相似，憂鬱個體對難過情緒臉辨識準確率較高、但低強度刺激時變低，也較易將中性或其他情緒臉辨識為難過。然而，過去研究多比較憂鬱組與控制組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差異，部分研究則透過憂鬱相關量表的分數探究症狀嚴重度與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缺損的相關性，雖然兩者具有顯著關聯，但對於兩者間預測的方向性，及脸部情緒辨識能力是否為憂鬱之社會認知脆弱質，皆尚未被釐清。此外，青少年研究主要以社區樣本配合量表為主，將研究結果由「症狀」推論至「診斷」是否合宜，亦為此研究領域有待討論之處（Nyquist & Luebbe, 2020）。

綜上所述，在青少年人際需求提升的特性下，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結合情緒對青少年憂鬱病理的影響值得探究，而參考脸部表情於非語言情緒訊息辨識的重要性，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亦可能為其中的社會認知脆弱質。此點，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一。

二、研究工具

國外在脸部情緒辨識方面的研究工具多採用Ekman和Friesen（1976）所建立之pictures of facial affect（POFA），以美國較常見的種族臉孔組成，和其餘常見之脸部情緒資料庫相同，較缺乏亞洲臉孔。本國學者發現，雖然Ekman認為基本情緒具有文化普遍性，然脸部表情的辨識一定程度上仍受到覺察個體本身之文化與社群的影響（陳建中等人，2013）。有鑑於本國缺乏本土化之脸部情緒辨識研究工具，陳淑惠（2006）根據Nowicki和Duke（1994）編製之Diagnostic 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 Scale-II（DANVA-II），重新編製DANVA-II-TW。考量非

語言情緒辨識之文化差異，採用臺灣本土、非專業表演者製作臉部情緒與聲音語調刺激材料，更貼近日常生活辨識臉部情緒的情境，以提升生態效度。原版 DANVA-II-TW 屬電腦施測的操作性工具，包含臉部情緒辨識、聲音情緒辨識、臉部聲音情緒混合辨識三個分測驗，目的為測量個體於單獨或混合使用不同非語言情緒辨識管道的辨識能力。其中刺激材料採用六大基本情緒中相對單純的高興、難過、生氣、害怕四種，並額外加入中性刺激，五種刺激各十二張照片，其中情緒強度高低與男女性別角色皆均衡，共計60張，每次皆以區間隨機排列呈現刺激。每張照片刺激呈現500毫秒後，將進入反應階段，包含辨識情緒種類與情緒強度。有鑑於DANVA-II-TW素材本土化、非專業表演者製作等優勢，且信效度表現穩定（曾懷萱，2003；Tseng et al., 2012），本研究將採用DANVA-II-TW之臉部情緒辨識分測驗，作為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之測量工具。

第三節 關係霸凌受害及青少年憂鬱病理

壹、人際壓力事件：校園霸凌的定義與分類

過去以脆弱質—壓力假說探究憂鬱病理的文獻，多聚焦於脆弱質，如前文所述針對認知、或再擴及到社會認知層面。然而除了脆弱質作為前置條件，壓力事件的促發亦為重要的因素。青少年族群人際需求的提升、頻繁的同儕互動等特性，使其經常暴露於人際壓力事件之中，也可能對此類壓力有更強的情緒反應，造成後續憂鬱與自殺的結果（Hammen, 2009; Joiner & Timmons, 2009; Shih et al., 2006）。Flynn和Rudolph（2011）認為當青少年面臨人際壓力情境（如社會排斥、人際關係損害）時，若難以產生適當的因應策略，易導致自我價值低落或無望感，而這些負面情緒與認知便成為憂鬱症狀發展的溫床，負面情緒與認知本身亦使其錯估中性或模糊的人際情境，更加容易產生非適應性的社交行為，使憂鬱症狀惡化（潘

奕瑄，2015；Rudolph, 2009）。近年來，青少年人際壓力事件以校園霸凌最受關注。據兒童福利聯盟（2019）調查顯示，39.8%的家長表示自己的孩子曾被霸凌，而一年內曾受凌的比例亦達23.6%，然該年教育部統計之通報數僅159件，相比之下恐怕仍有黑數。這些校園受凌經驗對青少年個體易產生生理、心理、社會適應等困難，干擾其學習與發展歷程，而此負面影響常延續至成年期。此外，心理困擾可能進一步發展出焦慮、憂鬱、物質使用障礙症等疾患，其中又以憂鬱與受凌經驗關聯性最強，且憂鬱症狀中介了受凌經驗與自殺相關行為的關係（Moore et al., 2017; Reed et al., 2015），國內研究也發現受凌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自殺意念與嘗試皆比一般控制組嚴重（黃舒亭，2023；Yen et al., 2014）。綜整而言，校園霸凌對臺灣青少年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見一斑，後續引發的人際困難與憂鬱、自殺交互惡化，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人際壓力事件。

霸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當時以「欺凌（mobbing）」一詞描述集體攻擊的行為（Copeland et al., 2013）。直到Olweus（1994）提出「霸凌（bullying）」一詞，指稱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位以上同學的欺負、騷擾之下的現象，而「權力不均等」為區分霸凌與一般攻擊行為的重要指標，其包含各種面相如體型差異（譬如，壯碩者欺負瘦弱者）、掌握人際資源（譬如，人脈廣欺負人脈淺）、年齡、性別等，也成為往後研究辨識霸凌行為的要點，國外研究多數也和 Olweus 的定義大同小異（Craig, 1998），多數後續研究以Olweus的定義進行延伸。國內學者對霸凌的定義大致包含三點特徵：帶有惡意的攻擊行為、長時間持續而重複、權力不均等的現象（王孜甯、程景琳，2010；游亞儒，2013）。除了研究以外，臺灣教育部參考各家學者建議頒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民109），將霸凌定義為「個人或集體持續對他人進行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的行為，致使他人處於不友善之校園環境、產生身心上的損害，影響其正常的學習活動」。

過去研究主要將校園霸凌分為三類：肢體型、言語型、及關係型（Rigby, 2007）。國內兒童福利聯盟（2007）則依據不同的行為樣態將校園霸凌進行簡略的分類，

大致上可以分成關係霸凌、言語霸凌、肢體霸凌、性霸凌、反擊性霸凌、網路霸凌等六類。肢體霸凌包含踢、打、揍、損壞財物等直接攻擊行為，其傷害往往顯而易見，也更容易受到關注；言語霸凌包含威脅、辱罵、嘲笑等；關係霸凌涉及破壞社會地位、人際關係等，形式間接；性霸凌包含性方面的嘲諷、騷擾甚至是侵犯；反擊性霸凌為受凌者的報復或反擊行為；網路霸凌隨網路普及、電腦與手機使用漸趨頻繁後出現，影響範圍較傳統類型大，且具匿名與間接性（兒童福利聯盟，2007; Monks & Smith, 2006; Slonje & Smith, 2008）。


貳、關係霸凌的定義與影響

過去社會大眾多關注肢體霸凌直接且外顯的攻擊行為，卻較少關注關係霸凌，原因可能是錯誤地認為關係霸凌傷害性較低、或只是女性之間正常的行為，使教育現場或家長容易忽略或延宕處理，受凌青少年可能更因師長父母態度而不願主動提出，形成隱藏卻深遠的傷害（Bauman & Del Rio, 2006）。關係霸凌不同於直接霸凌的身體攻擊、財物破壞等行為，是一種使受凌者被排斥於團體之外，切斷其社會連結，或透過言語操縱人際關係的霸凌行為，容易造成受凌者的人際疏離感。關係霸凌受害的青少年和直接受凌者在心理層面受到的傷害並無顯著差異，他們都因為人際壓力出現了心理適應上的困難，引發行為問題與憂鬱、焦慮等情緒症狀，甚至出現自殺意念（Brunstein Klomek et al., 2019; Craig, 1998; Hampel et al., 2009; Perry et al., 1988; Wang et al., 2011; Wolke et al., 2000）。然而，關係霸凌在女性之間確實更容易發生，但絕非「正常行為」，且心理層面的傷害可能更嚴重。部分文獻指出，關係霸凌確實更常發生於女性青少年之間，原因是他們的同儕團體關係常較男性緊密，且認知發展較男性早熟，所以不採用可能暴露身分的直接攻擊，而是相較隱蔽、對人際關係更有效的間接攻擊行為，正因如此，關係霸凌受害的女性青少年相較男性也發展出更嚴重的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

(Barzilay et al., 2017; Björkqvist et al., 1992; Brunstein Klomek et al., 2016; Crick & Grotpeter, 1995)。此外，回顧前文所述的自殺人際理論 (Joiner, 2007)，構成自殺意念的二大人際要素為挫敗的歸屬感與覺知他人負擔。而針對人際關係進行攻擊的關係霸凌破壞了此二要素的共通點，即個體的社會連結 (social connectedness)，亦使其產生後續的自殺意念 (Arango et al., 2016)。

早期在霸凌研究尚未普及時，即有些許文獻以「關係攻擊 (relational aggression)」指稱類似的行為。譬如，Crick和Grotpeter (1995) 定義關係攻擊為透過社會排擠、惡意的謠言散播，意圖操縱或傷害他人人際關係的行為，包括了散播謠言或秘密、排擠、冷落、忽略等行為，這些行為妨礙受害者建立友誼、加入團體，使其感到不被群體接納。亦有部分文獻以「社交攻擊 (social aggression)」為名指稱，Cairns等人 (1989) 認為社交攻擊為透過離間、排擠、貶低名聲或自尊等手段，操縱受害者被團體接納的程度的攻擊行為，廣泛地來說，無論手段為何，直接傷害他人自尊與社會地位的行為就可納入社交攻擊的範疇，較不強調人際關係的損害 (Galen & Underwood, 1997)。此外，若強調攻擊手段的隱蔽性，部分文獻以「間接攻擊 (indirect aggression)」為名指稱利用他人或操弄社會架構，意圖間接傷害他人社交關係或社會聲望受損的行為，隱蔽的目的可能是掩飾攻擊意圖或避免被反擊，包括散播謠言、傳遞惡意紙條、暗地裡將受害者排斥於團體外等行為 (Björkqvist et al., 1992; Lagerspetz et al., 1988)。上述三種界定之要點有所差異，關係攻擊強調人際關係的受損，社交攻擊強調廣泛的自尊損害，而間接攻擊強調手段的隱蔽，然而，所涵蓋範疇實為大同小異，行為指標亦多有重疊之處 (王孜甯、程景琳，2010；林苡彤、程景琳，2010；Coyne et al., 2006)。綜上所述，本研究結合校園霸凌之定義與關係霸凌的行為內涵，將關係霸凌定義為「一個或多個同學，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下，有意圖地、且長期不只一次地使受害者人際關係、社會地位受損的攻擊行為。」

關係霸凌的行為指標包含了三種向度：關係操弄、社會排擠與散播謠言 (王明傳、雷庚玲，2007、2008；Crick et al., 1999; French et al., 2002)。關係操弄指




攻擊者操弄受害者與其之間人際關係的行為，包括忽略受害者、威脅解除友誼關係等（如：「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就不跟你當朋友！」）；社會排擠指攻擊者阻礙受害者受他人社會接納的行為，包括試圖拉攏其他同儕不與受害者一同遊戲、將其排斥於團體之外等；散播謠言則指攻擊者為了傷害受害者，而背地裡散布令其感到不適之訊息的行為，包括散播謠言、傳遞惡意紙條等。雖然上述三向度原先為間接攻擊不同的分類，實際上涵蓋了多數關係霸凌的行為指標，包括忽略、威脅絕交、排斥排擠、謠言與惡意紙條等，三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媒介」的不同。關係操弄之行為媒介為攻擊者己身，社會排擠之行為媒介為攻擊者以外的他人，而散播謠言是不具特定媒介，隱藏於群體中的惡意。過去國內外關係霸凌研究多以同儕提名法（peer nomination）或直接詢問相關經驗以蒐集資料，同儕提名法所得資料為類別變項，較不便統計分析，並且信效度較差、易受到同儕間熟識程度的影響，且測量結果常與受凌者本身認知有所差異；直接詢問則較缺乏行為效度。Holt等人（2015）認為定義關係霸凌行為後，再測量其行為指標較能準確描繪此現象，故本研究結合前述關係霸凌定義與此三項行為向度，自行編製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並檢驗其心理計量特性及因素結構之穩定性。

綜上所述，校園霸凌本身即為對青少年個體不可忽視的人際壓力事件，關係霸凌更是聚焦於人際關係的損害，對人際需求漸增的青少年影響深遠，可能導致憂鬱、自殺等身心問題。本研究認為關係霸凌是否於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病理機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值得深入探究。

參、關係霸凌與臉部情緒辨識能力

誠如前文已述，本研究透過社會訊息處理論的觀點，探究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於青少年憂鬱病理中的角色，以及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作為準確擷取、判讀社交訊息為產出適應性社交行為的基礎，若其於歷程前期臉部情緒辨識時即產生偏誤，



可能導致負向人際互動的發生，引發後續憂鬱症狀。Fox與Boulton（2005）發現關係霸凌受害和個體貧弱的社交技巧有關，這些社交技巧的基礎可能源自於對同儕的臉部情緒辨識。Woods等人（2009）比較10歲兒童在肢體受凌、關係受凌與未受凌組之間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差異，發現關係受凌組顯著低於另外兩組，尤其是生氣與害怕兩種情緒。他們認為較弱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代表缺乏理解同儕團體動力的能力，並且更容易誤解同儕社交行為背後的動機；以社會訊息處理論的觀點解釋，處理偏誤可能發生在線索登錄與解釋前兩階段，使這些兒童做出不適當的反應決策，最後成為關係霸凌加害者攻擊的目標。然而，針對關係霸凌與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之關聯的實徵研究較少，且多數未區分霸凌類型，研究結果也較不一致。譬如，Pozzoli等人（2017）發現，雖然青少年個體的受凌經驗愈嚴重，臉部情緒辨識總準確率愈低，但區分情緒後，性別的趨勢卻截然不同；男性的受凌經驗愈嚴重，低強度害怕、高強度難過的辨識準確率愈低，女性的受凌經驗愈嚴重，無論低或高強度難過的辨識準確率皆愈低，低強度高興的辨識準確率卻愈高。Franzen等人（2021）發現，當納入憂鬱症狀作為共變時，受凌青少年的脸部情緒辨識準確率顯著低於控制組，然而不納入憂鬱症狀作為共變後，此現象卻不再顯著，可能代表憂鬱病理在關係受凌與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的關係間扮演一定的角色；區分情緒後，受凌青少年和控制組相比僅更容易將中性情緒辨識成生氣，其餘情緒辨識準確率均未顯著低於控制組。Guy等人（2017）檢驗社會訊息處理論的訊息登錄與解釋二階段與受凌經驗的關聯，他們將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視為登錄階段，發現青少年受凌經驗和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並未具顯著關聯，而是與解釋階段的敵意歸因偏誤（hostile attribution bias）、特質自責（characterological self-blame）有關。

綜上所述，雖然過去文獻對關係霸凌與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的關聯，研究結果較不一致，但綜整憂鬱病理的脆弱質－壓力假說與社會訊息處理論的觀點，本研究認為二者與青少年憂鬱及自殺病理的關係仍值得探究。若考量過去脆弱質－壓力假說的觀點，關係霸凌作為人際壓力事件，為病理機制中的調節變項，意即，

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影響憂鬱症狀的效果，會因為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而愈強，而非情緒辨識直接影響關係霸凌的受害經驗。然而，從社會訊息處理論的觀點來看，關係霸凌的受害可能是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缺損導致。訊息登錄與解釋的偏誤使青少年個體產出不適當的社交行為，使其成為關係霸凌加害者攻擊的對象，受凌經驗進一步引發憂鬱症狀，意即，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成為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的中介變項。故本研究同時參考脆弱質－壓力假說與社會訊息處理論的觀點，分別檢驗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於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的調節或中介效果。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假設

壹、研究目的

綜整前述文獻回顧，青少年憂鬱的影響深遠，且自殺風險亦逐年升高，其背後的病理機制值得深入探討。過去的憂鬱病理多以脆弱質－壓力假說為主，並聚焦於認知脆弱質的影響。有鑑於青少年族群人際需求提升的特性，本研究將認知脆弱質與社會訊息處理論二者相關文獻結合，並參考Joiner（2007）的自殺人際論，嘗試從社會認知與人際的角度探究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的病理機制。情緒訊息在社交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脸部情緒辨識能力可能為其中的社會認知脆弱質之一。關係霸凌為對重視同儕關係的青少年亦產生許多負向影響，為重要的人際壓力事件。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構一青少年人際憂鬱與自殺的病理模型，探究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間的關係。本研究首先探究青少年的脸部情緒辨識能力，其於不同情緒辨識準確率之間、及中性刺激辨識成不同情緒次數是否具有差異。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的相關文獻中，提及不同情緒辨識與憂鬱間的關係，然僅有難過情緒具相對一致的研究結果，故本研究除了檢驗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其他變項之關係，亦進一步探索不同情緒辨

識之模型差異。由於各變項相關文獻皆提及性別差異，本研究亦以性別分組檢驗可能存在之模型差異。此外，為探討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作為人際壓力事件，是否扮演憂鬱病理機制中的調節變項，亦依受凌嚴重程度分組，檢驗可能存在之模型差異。

貳、研究假設

綜整前述文獻回顧與研究之目的，本研究假設如下。假設模型如圖3所示。

一、難過情緒辨識與憂鬱症狀之關係

假設1-1：難過情緒辨識準確率與憂鬱症狀嚴重程度具正相關。

假設1-2：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與憂鬱症狀嚴重程度具正相關。

二、模型路徑之預測效果

假設2-1：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分別負向預測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憂鬱症狀。

假設2-2：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分別正向預測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

假設2-3：憂鬱症狀正向預測自殺意念風險。

三、模型之中介效果

假設3-1：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中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至憂鬱症狀的關係。

假設3-2：憂鬱症狀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至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

假設3-3：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及憂鬱症狀完全序列中介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至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



四、性別差異

假設4-1：女性對負面情緒之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皆顯著高於男性。

假設4-2：性別分組之模型適配度、路徑顯著性、中介效果具有差異。

五、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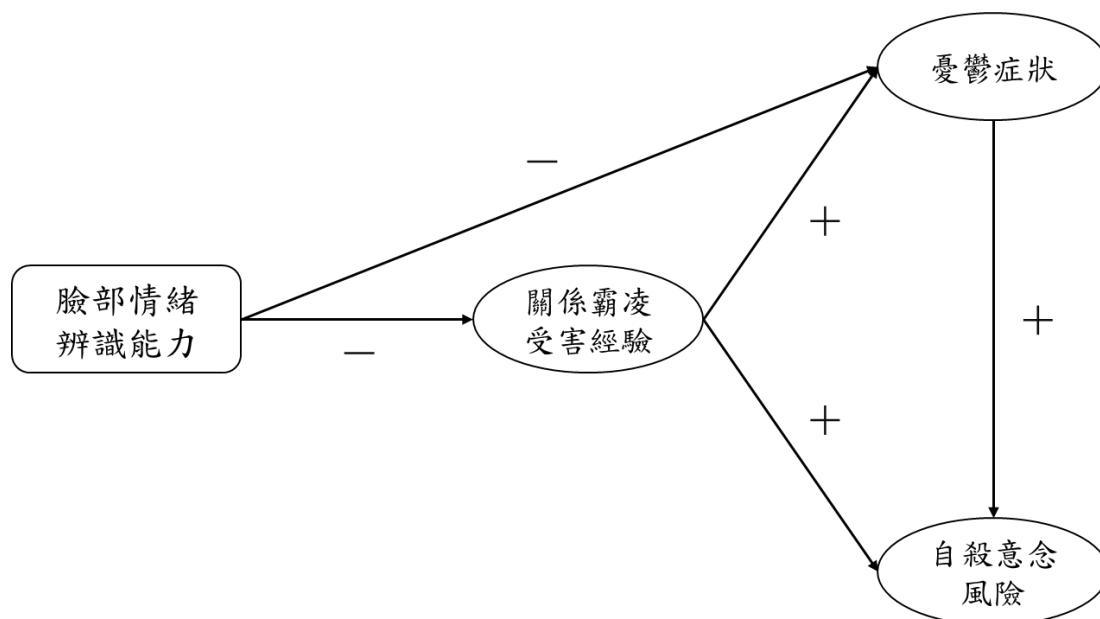
假設5-1：高受凌組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顯著低於低受凌組。

假設5-2：高受凌組之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皆顯著高於低受凌組。

假設5-3：受凌程度分組之模型適配度、路徑顯著性、中介效果具有差異。

圖3

研究假設模型







第二章 研究一：研究工具之建立

研究一進行研究工具之編修與心理計量特性檢驗，包括自行編製的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以及重新編譯的人際需求問卷（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INQ）。首先，編寫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原始題項，接著依據本階段問卷填答資料，對原始題項進行項目分析、探索式與驗證式因素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從中選取表現較佳、形成穩定因素結構之題項，組成最終版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其次，將 INQ 進行重新編譯，考量原量表與中國學者編譯之中文版量表皆具穩定因素結構（李曉敏等人，2015；Hill et al., 2015），保留全數編譯後題項，僅直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檢驗其內部一致性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若表現不佳，再進一步調整題項。研究一對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人際需求問卷之編修結果將作為研究二之基礎，採納二量表之最終版題項，分別作為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之測量變項。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參與者與研究程序

考量青少年樣本可得性較困難，研究一招募大學生樣本，並請參與者回憶國中生活，以填寫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考量參與者因時間效應導致回憶偏誤，

排除時間距離較大的碩士班以上之樣本；人際需求問卷部分，由於題項敘述以回憶形式填寫較困難，則以填寫時間點為準。此外，由於過去研究指出物質濫用和青少年憂鬱與自殺有關 (Kandel et al., 1991; Reed et al., 2015)，故本研究預計於後續研究二時排除有物質濫用情形者，然考量研究一之大學生樣本生活習慣與中學生不同，故僅排除使用違法物質之參與者。此研究樣本為 413 位之大學生，參與者於 2021 年 2 月至 3 月透過社群網站如 Facebook、PTT、Dcard 等得知研究招募廣告，並在網路上填寫研究參與同意書、基本資料與二份問卷。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抽獎，一共抽出 20 張約 150 元等值之飲料兌換券。排除疑似胡亂填答者 2 名、不符研究資格者 10 名（就讀碩士班以上與一名 55 歲界外值）、大麻使用者 1 名，一共刪除 13 名資料後，本研究的有效樣本共 400 位，包含 102 位男性（25.5%）與 298 位女性（74.5%），平均年齡為 21.23 ($SD = 1.55$) 歲，多數參與者年齡介於 20 至 24 歲之間。有效樣本中具酒精使用習慣者有 39 名（9.8%）、香菸使用習慣者 7 名（1.8%）。此外，本研究參與者就讀學校分布全台 30 多所大專院校，主要來自於國立臺灣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輔仁大學等五所。

貳、研究工具

一、基本資料

研究一蒐集參與者之基本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就讀學校與年級，以及物質濫用情形，含較常見之香菸、酒精飲料、大麻，或其他自行填寫等資料。

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

本研究參考王明傳、雷庚玲（2007、2008）對間接攻擊行為所建構之同儕估計法，其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之行為指標分為關係操弄、社會排擠、散播謠言等三個分向度，並據此建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之自陳式量表。本研究的量表中除了

部分題項參考同儕估計法外，其餘則根據文獻回顧中對三個分向度之定義而自行編寫。由於國內少有根據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之行為指標編製之量表，故研究者編寫較多題項，並透過心理計量分析之結果刪去過多的題項。研究者一共編寫 33 題，包含關係操弄 12 題、社會排擠 10 題、及散播謠言 11 題，採李克氏 5 點量尺（0-4 分；0 為完全沒有，1 為很少如此，4 為幾乎如此）評估個體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嚴重程度，分數愈高，代表其受凌愈嚴重。另外，為檢驗自行編製量表之心理計量特性，本研究將進行項目分析（item-analysis）、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及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等方法，並依據分析結果與理論篩選題項。

三、人際需求問卷（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INQ）

原版 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INQ; Van Orden et al., 2012）為 15 題之自陳式量表，包含挫敗的歸屬感（thwarted belongingness）9 題與覺知他人負擔（perceived burdensomeness）6 題，採李克氏 7 點量尺（1-7 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7 代表完全符合）評估組成個體自殺意念之兩大人際需求因素，分數愈高表示具自殺意念之風險愈高。原先已有李曉敏等中國學者（2015）翻譯中文版量表，然而研究者考量中國與本國中文使用習慣的不同，故進行臺灣版的翻譯。原量表因素結構穩定，具有良好心理計量特性，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佳（ $\alpha = .75 \sim .90$ ）（Hill et al., 2015）；中國中文版亦具有良好效標關聯效度，內部一致性信度（ $\alpha = .87$ ）、再測信度（ $r = .81$ ）亦佳。本研究重新翻譯臺灣中文版，遵循原版量表以 7 點量尺計分。另外，雖然本研究需檢驗重新翻譯後量表之心理計量特性，考量原量表與中國中文版量表已具有穩定因素結構與信效度，故直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檢驗全量表、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以及額外加入一自殺意念題項（例：「最近我有自殺的念頭。」）作為效標，檢驗全量表、分量表與該題之相關係數。



參、資料分析

研究一的目的有二，其一，為檢驗自行編製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心理計量特性，包含內部一致性信度、因素結構及因素間相關；其二，檢驗重新翻譯之臺灣版 INQ 之因素結構、內部一致性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統計分析軟體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6、SPSS 25.0 進行項目分析 (item-analysis) 與計算相關係數，以 SAS 9.4 與 AMOS 24.0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及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在項目分析的部分，本研究檢驗關係霸凌受害問卷之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各題項間相關，瞭解各題項所測得之構念是否相近，以及可能存在之共線性問題；另外，亦檢驗 INQ 之全量表與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以及全量表及分量表分數與額外添加自殺意念題之相關係數。最後，本研究亦檢視關係霸凌受害問卷各題項與總分間相關，判斷各題是否能反應全量表的構念意涵。

依據項目分析結果進行初步刪題後，為初步瞭解關係霸凌受害問卷之因素結構，先以全樣本 ($n=400$) 進行 EFA。首先進行 KMO (Kaiser-Meyer-Olkin)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檢驗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確認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後，參考 Kaiser 特徵值 (eigenvalue) 大於 1 準則 (Kaiser, 1960)、陡坡檢定 (scree test; Cattell, 1966)、平行分析 (parallel analysis, PA; Horn, 1965)、最小平均淨相關法 (minimum average partial correlation, MAP; Velicer, 1976)，以及綜合考量過去文獻與經驗觀察之合理性後，決定最終因素數目。接著採用迭代主因子法 (iterative principle factoring, IPF) 萃取初始因素負荷量。根據王明傳、雷庚玲 (2007、2008) 建構的間接攻擊行為之同儕估計法，將預設關係操弄、社會排擠、散播謠言等三向度為預期因素結構，且三因素間具有顯著相關，故本研究選用最優斜交轉軸法 (Promax) 進行轉軸。

最後，為驗證關係霸凌受害問卷之因素結構，本研究先將全樣本 ($n = 400$) 隨機均分為兩組 ($n_1 = 200$ & $n_2 = 200$)，其中一組資料先進行 EFA 以建立因素架構，另一組資料則進行 CFA 以驗證前述之因素架構。本研究依上述流程重複分析 5 次，每一次均將資料隨機分為兩組，除瞭解關係霸凌受害問卷因素結構是否穩定外，亦參考各項模型適配度指標數值、過去文獻理論及經驗觀察再次進行刪題，並觀察刪去題項後因素結構是否穩定、以及模型適配度指標數值的變化。INQ 則直接以全樣本進行 CFA，在全數保留題項下，調整殘差共變以觀察適配度指標數值變化，若無法達成穩定因素結構，再刪除題項重新進行 CFA。本研究進行 CFA 時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ML) 進行估計。此外，由於單一模型適配度指標無法全然瞭解模型表現 (Hu & Bentler, 1999)，因此本研究採用卡方值、SRMR、CFI、TLI、RMSEA 等指標評估模型之適配程度。依過去文獻建議， χ^2 的 p 值 $> .05$ 、SRMR $\leq .08$ 、CFI $\geq .95$ 及 TLI $\geq .95$ 表示模型適配良好 (Hu & Bentler, 1999)；RMSEA $< .05$ 接近完美適配， $.05 \leq$ RMSEA $< .08$ 則為可接受的適配 (Browne & Cudeck, 1993)。

第二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壹、項目分析

人際需求問卷 (INQ) 資料之描述性統計，扣除自殺意念題後，各題項分數接近常態分佈而稍有正偏傾向 ($skew = 0.16 \sim 1.49$, $kurt = -1.02 \sim 1.35$)；自殺意念題平均分數為 2.24 分 ($SD = 1.72$, $skew = 1.24$, $kurt = 0.32$)，為正偏分佈；全量表總分 (扣除自殺意念題) 介於 15 分至 95 分，平均分數為 43.09 分 ($SD = 17.73$, $skew = 0.60$, $kurt = -0.24$)，接近常態分佈而稍有正偏傾向。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覺知他人負擔分量表為 .95、挫敗的歸屬感為 .91，顯示臺灣版人際需

求問卷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全量表總得分與自殺意念題相關為 .67，覺知他人負擔分量表與該題相關為 .73、挫敗的歸屬感則為 .51，顯示本問卷在量測自殺意念上具有良好之效標關聯效度。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描述性統計，各題項分數有正偏分佈之傾向（偏態介於 0.91 至 2.87，峰度介於 0.18 ~ 8.87）；全量表總得分介於 0 分至 132 分，平均分數為 21.41 分（ $SD=23.54$, $skew=1.69$, $kurt=3.25$ ），亦有正偏分佈之傾向。檢驗各題項分數與全量表總分之間的相關，相關係數介於 .57 至 .91 之間，研究者先行挑選出相關過高（ $r > .86$ ）之題項，共有 2、11、12、13、14、21、22、23 八題，進一步檢視此八題與量表內其他題項之相關（表 1），根據 DeVellis(2016) 建議，適當的相關係數應介於 .30 ~ .70，發現近半數題目與此八題相關過高（ $r \geq .70$ ），推測可能存在共線性之疑慮。研究者認為此八題測得之構念可能已由其餘題項描述之行為指標充分解釋，又本問卷已事先編寫較多之題項，考量精簡量表之目的，予以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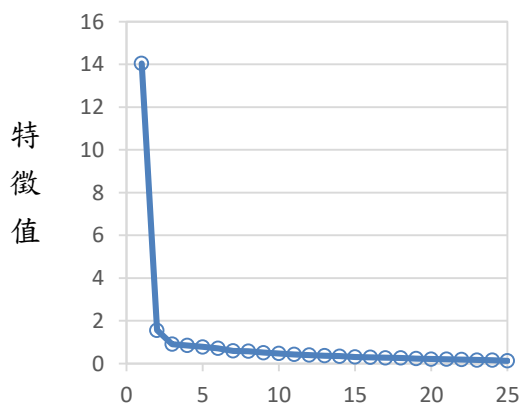
貳、探索性因素分析

進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探索性因素分析前，先行檢驗 KMO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顯示 KMO 值為 .963，球型檢定卡方值為 8190.376，達顯著水準（ $p < .001$ ），顯示此筆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接續以特徵值大於 1 準則、陡坡檢定、平行分析、最小平均淨相關法，以及綜合考量過去文獻與經驗觀察之合理性後，決定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最終因素數目。結果顯示，依據特徵值大於 1 法則，建議取 2 個因素；陡坡檢定建議取 1 到 2 個因素（如圖 4）；平行分析結果建議取 1 到 2 個因素；最小平均淨相關法之分析結果則建議為 2 個因素。綜上所述，建議萃取之因素數為 1 至 2 個，本研究除參考過去文獻、經驗觀察以及因素結構之可解釋性外，亦檢視屬於第二因子的四題題項敘述，分別為 30（「有同

學向老師打我的小報告」)、31(「有同學背地裡批評我的家人或朋友」)、32(「有同學惡意散播有關我家人或朋友的不實謊言或故事」)以及33(「有同學到處說我家人或朋友有關的八卦」)題。研究者推測，多數與散播謠言有關之題項敘述為「有關自己的訊息」，而該四題涉及「家人或朋友」等他者，有關聯對象上的差異。由於編寫該四題時僅參考研究者之經驗觀察，除了缺乏文獻支持以外，相較於第一因子題項數亦較少，考量量表精簡之目的，予以刪除。刪除該四題後，決定以單一因素為最終結果。刪除30~33題後，剩餘各題項於單一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如表2，接著為獲得更穩定之量表因素結構，以剩餘各題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驗證模型。

圖 4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陡坡圖



參、驗證性因素分析

一、關係霸凌受害問卷

為持續精簡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題項與因素結構，本研究藉前述項目分析與 EFA 之結果為基礎，進一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觀察排除題項後模型適配度之改變，進而篩選題項。

在此階段分析中，首先將全樣本隨機均分為兩組 ($n_1 = 200$ & $n_2 = 200$)，其中一組資料先進行 EFA 以建立因素架構，另一組資料則進行 CFA 以驗證前述之因素架構。本研究先重覆上述流程共 5 次。CFA 結果顯示單因子模型為最適合的因素結構，其中模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189, n = 200) = 526.48 \sim 667.23, p < .001$ 、RMSEA 介於 .095 至 .113，TLI 介於 .859 至 .890，CFI 介於 .873 至 .901，SRMR 介於 .043 至 .051，除 RMSEA 顯示適配較差以外，其餘指標表現皆接近良好之適配。研究者考量模型精簡與更穩定之因素結構，參考 CFA 的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ex, M.I.)、項目分析、EFA 的結果，以及回顧題項敘述後，剔除第 5 題 (不一定為針對人際關係傷害之行為，與總分、其他題項相關亦偏低)、第 8 題 (可能較少做為關係霸凌之手段，與總分、其他題項相關亦偏低)、第 17 題 (可能為單純競爭行為、或攻擊受害者本身而非其人際關係之手段) 與第 19 題 (該手段是否有關係霸凌之意圖需視另外成立群組之目的) 等 4 題。

本研究再次將樣本隨機均分，一組資料進行 EFA 以建立餘下 17 題之因素架構，另一組資料則同樣進行 CFA 以驗證之，此流程欲重覆 10 次。整體結果顯示，單因子模型仍為最適合之因素結構，其中模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119, n = 200) = 308.61 \sim 388.84, p < .001$ ，RMSEA 介於 .089 至 .107，TLI 介於 .894 至 .927，CFI 介於 .907 至 .936，以及 SRMR 介於 .036 至 .044。同樣參考 M.I.、項目分析、EFA 與回顧題幹敘述後，再剔除第 26 題 (該題與其他題項相關偏高，且其意涵與第 27 題相近，推測紙條可能並非現今散播謠言之主要手段)，最終保留 16 題。最終版之單因子模型如圖 5，其因素負荷量如表 3，模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104, 400) = 370.60, p < .001$ ，RMSEA = .080，TLI = .940，CFI = .948，及 SRMR = .033，顯示此因素結構接近良好之適配。最終版之 Cronbach's alpha 達 .96。

表 2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

題號	負荷量	題目內容
15	0.82 0.24	有同學在上課分組時故意不跟我一組。
20	0.82 0.23	有同學用讓我不舒服的方式迴避、疏遠我。
28	0.81 0.26	有同學背地裡批評我的外觀或個性。
7	0.79 0.30	有同學惡意曲解我說的話。
4	0.75 0.29	有同學故意把錯誤怪在我身上。
18	0.75 0.26	有同學在我面前刻意說一些只有他（們）聽得懂的事。
24	0.74 0.41	有同學散播關於我的不實謊言或故事。
10	0.73 0.30	有同學惡意擾亂我。
27	0.71 0.31	有同學用通訊軟體傳批評我的訊息。
6	0.70 0.35	有同學惡意不跟我分享（食物飲料、作業筆記...）。
26	0.70 0.37	有同學傳遞批評我的紙條。
29	0.68 0.38	有同學到處說跟我有關的八卦。
1	0.67 0.26	有同學故意以交別的朋友的方式來報復我。
17	0.65 0.39	有同學在公開場合惡意讓我出糗。
25	0.64 0.41	有同學惡意把我的秘密傳出去。
16	0.64 0.34	有同學告訴我沒人想跟我做朋友。
19	0.63 0.16	有同學在社群軟體（例：FB、LINE、IG）建立沒有我的群組。
3	0.58 0.35	有同學告訴我：除非我聽他（們）的話，不然就不跟我好。
9	0.58 0.21	有同學接近我只是為了利用我。
5	0.58 0.30	有同學故意在社群軟體（例：FB、LINE、IG）封鎖我。
8	0.55 0.35	有同學有消息（例：上課換地點或時間）刻意不通知我。
32	0.23 0.90	有同學惡意散播有關我家人或朋友的不實謊言或故事。
33	0.24 0.80	有同學到處說跟我家人或朋友有關的八卦。
31	0.34 0.73	有同學背地裡批評我的家人或朋友。
30	0.47 0.49	有同學向老師打我的小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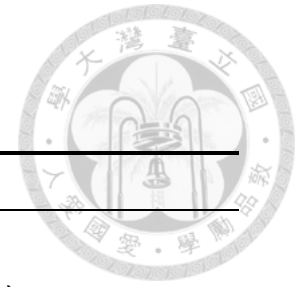


圖 5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單因子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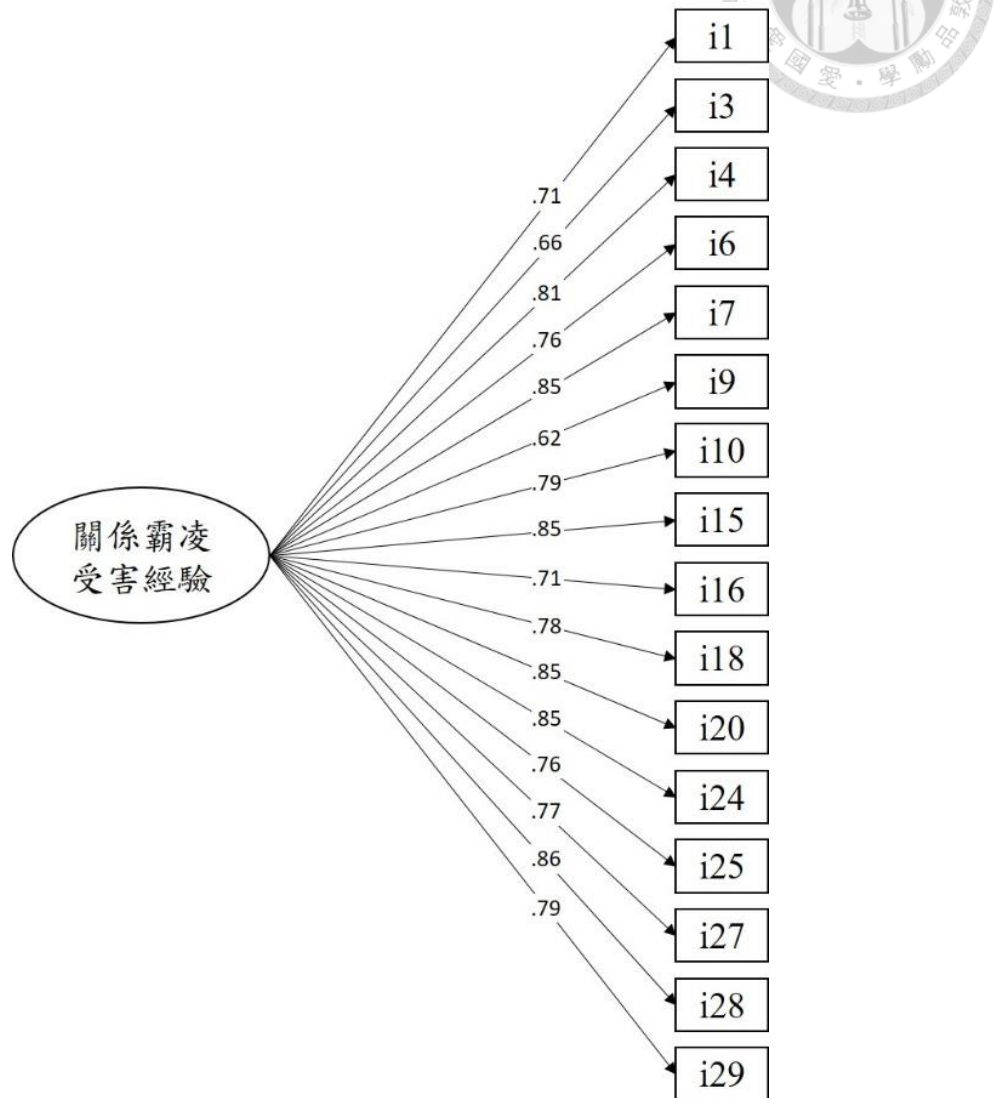


表 3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單因子模型因素負荷量

原題號	題目	因素負荷量
28	有同學背地裡批評我的外觀或個性。	.86
24	有同學散播關於我的不實謊言或故事。	.85
20	有同學用讓我不舒服的方式迴避、疏遠我。	.85
7	有同學惡意曲解我說的話	.85
15	有同學在上課分組時故意不跟我一組	.85

表 3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單因子模型因素負荷量 (續)

原題號	題目	因素負荷量
4	有同學故意把錯誤怪在我身上。	.81
29	有同學到處說跟我有關的八卦。	.79
10	有同學惡意擾亂我。	.79
18	有同學在我面前刻意說一些只有他(們)聽得懂的事。	.78
27	有同學用通訊軟體傳批評我的訊息。	.77
6	有同學惡意不跟我分享(食物飲料、作業筆記...)。	.76
25	有同學惡意把我的秘密傳出去。	.76
1	有同學故意以交別的朋友的方式來報復我。	.71
16	有同學告訴我沒人想跟我做朋友。	.71
3	有同學告訴我：除非我聽他(們)的話，不然就不跟我好。	.66
9	有同學接近我只是為了利用我。	.62



二、人際需求問卷 (IN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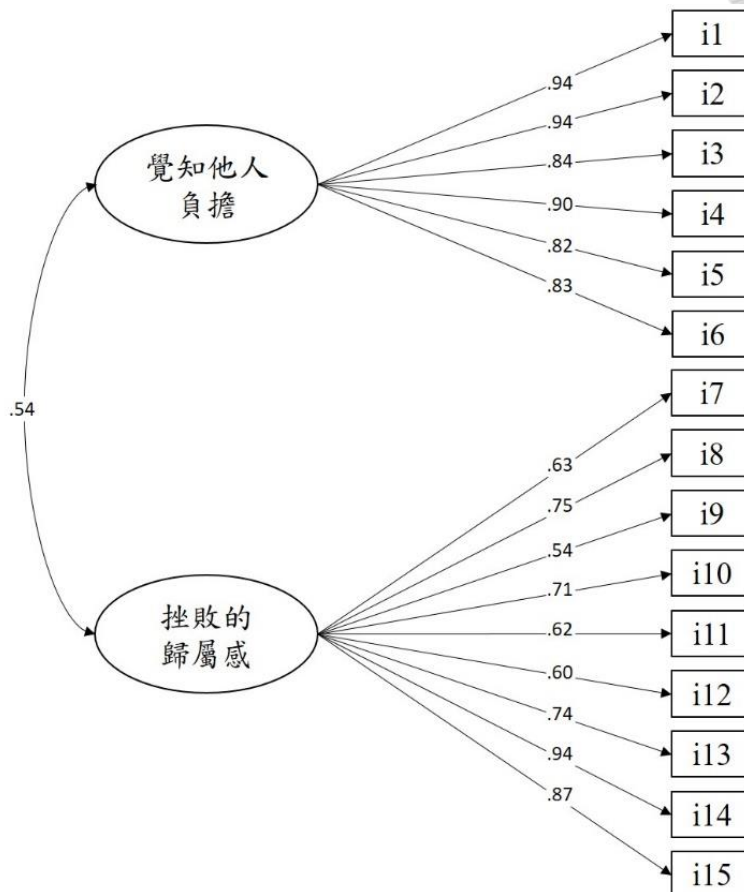
本研究為檢驗重新編譯的臺灣中文版人際需求問卷之因素結構，直接以全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在保留全數題項情形下，觀察添加殘差共變後之適配度指數數值變化，是否形成穩定之因素結構。

首先，以 Van Orden 等人 (2012) 所採用的穩定因素結構對本研究資料進行分析，其僅於原二因子結構添加第 11 題與第 12 題之殘差共變。模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88, 400) = 618.45$, $df = 88$, $p < .001$, $RMSEA = .123$, $TLI = .880$, $CFI = .899$, 以及 $SRMR = .095$ 。參考 M.I、回顧題項敘述，於同因子下之題項殘差間添加共變，以提升模型適配表現。一共添加第 7 題與第 8 題、第 9 題與第 12 題、第 9 題與第 11 題、第 5 題與第 6 題等 4 個共變後，再進行 CFA，模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84, 400) = 290.29$, $p < .001$, $RMSEA = .078$, $TLI = .951$, $CFI = .961$, 以及 $SRMR = .087$ ，顯示此因素結構接近良好之適配。其因素結構模型如圖 6。



圖 6

人際需求問卷 (INQ) 之二因子模型



肆、討論

本研究首先重新翻譯 INQ，接著針對 400 筆資料分析臺灣版 INQ 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臺灣版 INQ 的 Cronbach's alpha 達 .94，而覺知他人負擔分量表為 .93、挫敗的歸屬感分量表則為 .90；全量表總得分與自殺意念題相關為 .67，覺知他人負擔分量表與該題相關為 .72、挫敗的歸屬感則為 .52。CFA 之結果顯示，於保留全數題項情形下，添加四個殘差共變即達穩定之因素結構。綜上所述，臺灣版 INQ 應具有穩定因素結構與良好之信效度，其中，兩分量表與自殺意念題之相關稍有差異，推測兩分量表可能存在對自殺意念預測效力之

差異。Van Orden 等人 (2012) 檢驗 INQ 的效標關聯效度發現，在大學生樣本中，覺知他人負擔與挫敗的歸屬感皆能顯著預測當前自殺意念（覺知他人負擔：OR = 2.21, $p < .01$ ；挫敗的歸屬感：OR = 1.59, $p < .01$ ）或一個月後的自殺意念（覺知他人負擔：OR = 1.64, $p < .01$ ；挫敗的歸屬感：OR = 1.83, $p < .01$ ）；然而，亦有研究證據顯示，在控制了覺知他人負擔以後，挫敗的歸屬感不再能預測自殺意念（Bryan et al., 2012; Buitron et al., 2016; Monteith et al., 2017），這些研究中挫敗的歸屬感不再具有預測效力，其樣本皆為具臨床診斷之樣本，不同於 Van Orden 等人 (2012) 的大學生樣本。研究者推測，臨床個案對社會連結之需求可能於出現相關症狀後降低，同時亦可能因為症狀而增強覺知自身為他人負擔之感受，使得挫敗的歸屬感不再能預測其自殺意念。由於分量表對自殺意念的預測效果仍存在不一致的研究證據，後續研究二除了以 INQ 全量表作為測量自殺意念之工具外，亦可再次以研究二樣本分別檢驗兩分量表與自殺意念題之相關係數，若仍具落差，將使用兩分量表替代全量表分數進行 SEM 分析，並比較模型變項間效果與適配度指標之變動，未來亦能嘗試檢驗不同樣本性質如何影響 INQ 兩分量表預測自殺意念之效力。

本研究自行編製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並針對 400 筆資料進行項目分析、EFA 及 CFA，篩選題目與檢驗其因素結構，最終保留 16 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的 Cronbach's alpha 達 .96，EFA 建議此量表應為二因素結構，然因第二因子所含題項過少，考量模型精簡之目的與過去文獻、經驗觀察之合理性，剔除第二因子所含四題後再進行 CFA 驗證單因子模型，發現單因子結構即為最適配模型。根據王明傳、雷庚玲 (2007、2008) 對間接攻擊行為所建構之同儕估計法，本研究原先預期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應為三因子結構，然結果發現僅含單因子結構，推測可能與王明傳、雷庚玲 (2007) 之研究中，關係操弄、社會排擠、散播謠言等三向度於上層因素間接攻擊之負荷量較大，結果顯示其三向度皆具有有效解釋間接攻擊行為之可能性；此外，該研究亦提及相關行為於發展、文化、性別與測量方式等不同面向在該構念上的差異，而前文所整理之文獻對關係霸凌之定

義亦大同小異(Cairns et al., 1989; Coyne et al., 2006; Crick & Grotpeter, 1995; French et al., 2002; Galen & Underwood, 1997)。綜上所述，雖然本研究建構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並未發現相關行為具有次級因素之存在，仍存在共同之上層因素，亦即根據關係操弄、社會排擠、散播謠言等三向度編寫之題項，皆能反映關係霸凌之定義。

總結而言，本研究首先翻譯臺灣版 INQ，並檢驗其內部一致性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其量表結構穩定、無論是全量表或是分量表得分均與自殺意念相關，顯示臺灣版 INQ 具有良好之心理計量特性。同時，本研究嘗試編製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蒐集資料並經項目分析、EFA 與 CFA 檢驗後，最終建構此一具有單因子結構、共含 16 題之量表，其亦具備良好之心理計量特性。量表總分愈高，代表個體之受凌經驗愈嚴重。本問卷以行為指標結合行為定義測量關係霸凌之受害經驗，為國內少有之測量工具，惟本研究資料主要為大學生樣本且女性較多，故未來可嘗試蒐集青少年樣本、平衡性別比以重新驗證本問卷之因素結構，促進測量青少年族群關係霸凌行為之有效性，進一步提升教育或臨床現場應用之價值。





第三章 研究二：病理機制之模型檢驗與分組差異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參與者與研究程序

研究二的樣本皆來自於高雄市某國中一年級學生，共 233 位，年齡介於 11 歲至 13 歲之參與者。排除疑似胡亂填答者 21 名、物質使用者 2 名（1 名使用香菸、1 名使用酒精飲料），一共刪除 23 名的資料後，有效樣本共 210 位，包含 101 位男性（48.1%）與 109 位女性（51.9%），平均年齡為 12.24 歲（ $SD = 0.45$ ）。

正式施測之前，先由該校於一年級中隨機抽選十三個班級，共 328 名學生，研究者於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間向抽選中之班級說明研究目的與流程，並發放學生版與家長版兩式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為保障青少年權益，採主動知情同意，即兩式同意書皆繳回，且家長與學生本人皆簽署同意者，納為本研究正式參與者。同年 10 月至 11 月間，由研究者至該校進行紙本問卷施測，每次施測以班級為單位，時間約為一堂課 50 分鐘。開始施測前，由任課老師與研究者共同控管施測班級秩序，且不同意參與施測之學生由任課老師安排自習活動，正式施測時學生皆能保持安靜、不互相干擾並完成填答。施測內容包括臺灣版非語言情緒辨識工具臉部情緒分測驗－團體施測版（DANVA-II-TW）、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臺灣版兒童與青少年憂鬱量表（CDI_TW）、及本研究重新編譯之人際需求問卷

(INQ)。所有參與者完成填寫後可獲得 150 元等值之文具禮券。



貳、研究工具

一、臺灣版非語言情緒辨識工具臉部情緒分測驗－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本研究採用陳淑惠(2006)據 Diagnostic 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 Scale-II (DANVA-II; Nowicki & Duke, 1994) 重新編製之 DANVA-II-TW 的臉部情緒辨識之分測驗，該分測驗的評分者間信度 ($Kappa = .73$) 與再測信度 ($Kappa = .72$) 表現皆良好 (Tseng, Chen, & Huang, 2012)。DANVA-II-TW 原為電腦化自動呈現的個別施測版，因考量於學校進行團體施測之可行性，包括同時向全班學生呈現刺激材料、有限之施測時間等因素，遂於本研究製作出團體施測版。

團體施測版將 DANVA-II-TW 的臉部情緒材料，以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 透過教室之投影幕播放刺激材料與反應選項，而參與者於紙本問卷上填入其反應。團體施測版之刺激呈現仍維持區間隨機排列，惟以班級為單位，施測前根據亂數表排列將刺激區間隨機排序，故本研究共有十三種不同隨機排列之投影片。正式施測前，研究者透過投影片呈現範例並說明作答方式與程序，說明完畢後進入練習階段，一共五題，練習完畢後確認參與者熟悉作答方式，即進入正式施測階段。每題於刺激呈現前，先於畫面正中央呈現題號提示 1.5 秒，接續呈現十字符號 1 秒以集中參與者注意力，最後呈現照片刺激 500 毫秒後，進入反應階段；考量有限之施測時間，團體施測版僅要求參與者判斷情緒種類，刪除原版對情緒強度之作答，亦限制作答時間，每題 7 秒，並於倒數 2 秒時響起提示音，提示參與者即將呈現下一張照片。施測中為確保參與者依題號填入其反應，每五題即暫停約 10 秒提醒參與者確認填答是否有誤；此外，施測完成一半即 30 題時，將進行 1 分鐘之休息以維持參與者之注意力。總施測時間約 15 至 20 分鐘 (如圖 7 所示)。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結果將整理為總辨識準確率、分別四種情緒之辨識準確率，以及將中性刺激辨識為四種情緒之次數等資料。



圖 7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練習題刺激材料範例



註：情緒種類由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依序為高興、難過、生氣、害怕

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為本研究自行編製之自陳式量表，據研究一之分析結果，本量表共 16 題，為單因子結構，採李克氏 5 點量尺（0-5 分；0 為完全沒有，4 為幾乎如此），評估個體的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參與者須依據其最近一個學期之經驗填答，分數愈高表示其受凌愈嚴重。研究一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信度表現良好（ $\alpha = .94$ ），而以研究二之樣本進行分析，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亦佳（ $\alpha = .88$ ）。

三、臺灣版兒童與青少年憂鬱量表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_TW)



本研究採用陳淑惠 (2008) 翻譯 Kovacs (1982) 所編製之兒童與青少年憂鬱量表而成之臺灣版兒童與青少年憂鬱量表 (CDI_TW)。測驗適用年齡為 8 到 16 歲的兒童或青少年。此量表為自陳式量表，一共 27 題，包含五個分量表為負向情緒、效率低落、負向自尊、人際問題與失去興趣，採李克氏三點量尺，依序為 0 分 (無症狀)、1 分 (輕微或是可能有症狀)、2 分 (症狀較明顯或嚴重)，受測者須依據兩週內最符合之情況進行填答。分數愈高表示其憂鬱症狀愈嚴重。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alpha = .80 \sim .86$) 與再測信度 ($r = .85$) 皆表現良好。以本研究之樣本進行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亦佳 ($\alpha = .84$)。

原 CDI_TW 共含五個分量表，然國內心理計量研究顯示，此量表為三因子結構，包含負向情緒與身心症狀、負向自尊與校園困擾、社交困擾等三因素 (蔡卿雄, 2012)；研究者將參考前述文獻結果，以此三因子結構進行後續分析。另外，此量表第 9 題為自殺題，為避免其與自殺意念變項共變之影響，故於後續分析剔除之。

四、臺灣版人際需求問卷 (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INQ)

原版 INQ (Van Orden et al., 2012) 為 15 題之自陳式量表，包含挫敗的歸屬感 (thwarted belongingness) 9 題與覺知他人負擔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6 題，採李克氏 7 點量尺 (1-7 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7 代表完全符合) 評估組成個體自殺意念之兩大人際需求因素，分數愈高表示具自殺意念之風險愈高。原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佳 ($\alpha = .75 \sim .90$)，中國中文版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alpha = .87$) 與再測信度皆佳 ($r = .81$) (Hill et al., 2015)。研究一所編譯之臺灣中文版內部一致性信度亦表現良好 ($\alpha = .94$)。據研究一之結果，研究二完整保留原 15 題，以本研究之樣本進行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亦佳 ($\alpha = .91$)，另外，仍保留額外添加之自殺意念題項 (例：「最近我有自殺的念頭。」) 作為效標，並檢驗其餘全量表、

其他變項與該題之相關係數。



參、資料分析

研究二的目的為檢驗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以及自殺意念風險所建構之模型，同時，為探討模型可能存在之性別或受凌嚴重程度差異，分別將資料分為男性與女性、據重新計算後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總分為高受凌組與低受凌組，進行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PA)，以比較兩兩模型之差異。統計分析軟體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6、SPSS 25.0 進行基本統計量分析、*t* 檢定與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以 AMOS 24.0 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組進行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PA)，評估整體模型之適配程度，以及分組模型差異與中介效果之檢驗。

由於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重新編修後為首次使用，資料分析前將先檢驗非中性刺激素材 (四種情緒共 48 張照片) 中，辨識準確率與其所屬情緒種類比較是否有界外值存在，界外值標準以四分位數上下界為準，低於下界 (小於第一四分位數 1.5 倍四分位距)、高於上界 (大於第三四分位數 1.5 倍四分位距) 者視為界外值 (Rousseeuw & Hubert, 2011)，並於後續分析中刪除此類素材，重新計算辨識準確率。

進行 SEM 分析時，當量表所含題項增加，需要估計的參數數量亦隨之提升，為維持穩定的參數估計結果則需更大的樣本數量 (吳艷、溫忠麟，2011)。為避免當量表題項較多時，樣本數量不足造成參數估計偏差的結果，本研究將分別對各量表進行題項包裹 (item parcel)，使各量表反映之潛在變項皆保有精簡且足夠之觀察變項。參考過去文獻結果，每個潛在變項至少需要 3 個觀察變項 (Kline, 2011)，包裹前皆依預期因子結構進行 CFA 並進行排序；而對各量表的包裹策略，則據其反映之潛在變項為單因子結構或多因子結構，有所不同。關係霸凌受害經

驗問卷為單因子結構，採「鄰近包裹法 (adjacent-loading parcel)」，排序後將因素負荷接近之題項包裹為一組。包裹後仍能維持包裹前之因素結構，並擴大各包裹組間差異、縮小各包裹組內差異 (Yang et al., 2010)。CDI_TW 與 INQ 為多因子結構，採「題項－結構平衡法 (item-to-construct parcel)」，各因子下的題項分別進行包裹，將題項依因素負荷高至低依序放入各組，放入與預期包裹組相同數量後，接下來以反方向填放，直至所有題項皆放入包裹組。第一輪最高負荷之題項將與第二輪最低負荷題項同一組，而第三輪最高負荷者亦放入同組，以此類推。原次級因子將成為數個包裹後的觀察變項，原屬同因子之題項包裹組間差異縮小，包裹前之因素結構相對被保留，包裹後產生之參數估計偏差也較小 (吳艷，溫忠麟，2011)。最終包裹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由 4 個觀察變項構成，CDI_TW 原三因子分別由 3、3、2 個觀察變項構成，共 8 個；INQ 原二因子分別由 2、3 個觀察變項構成，共 5 個，並於覺知他人負擔因素下的 2 個觀察變項間添加殘差共變。

本研究之參數估計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ML) 進行估計。模型適配度部分，由於單一指標無法全然瞭解模型表現 (Hu & Bentler, 1999)，因此本研究採用卡方值、SRMR、CFI、TLI、RMSEA 等指標評估模型之適配程度。依過去文獻建議， χ^2 的 p 值 $> .05$ 、SRMR $\leq .08$ 、CFI $\geq .95$ 及 TLI $\geq .95$ 表示模型適配良好 (Hu & Bentler, 1999)；RMSEA $< .05$ 接近完美適配， $.05 \leq \text{RMSEA} < .08$ 則為可接受的適配 (Browne & Cudeck, 1993)。此外，因依照性別分為男女組，或依照重計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總分分為高低受凌組時，各組樣本數皆不足於過去文獻所建議 SEM 分析之之最小樣本數 ($n = 200$; Kline, 2011)，恐造成參數估計或模型適配度之偏差，故改以 PA 進行分組之模型分析與比較，參數估計方式與模型適配度指標如同前述。



第二節 研究結果

壹、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刺激素材篩選

首先，分別計算原 48 張非中性刺激素材之情緒辨識準確率(correct rate, CR)，再計算各情緒種類 CR 之四分位上下界，最大為 1、最小為 0。高興情緒辨識準確率(happiness correct rate, HCR)之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72 及 1，難過情緒辨識準確率(sadness correct rate, SCR)之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56 及 .96、生氣情緒辨識準確率(anger correct rate, ACR)之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31 及 1，害怕情緒辨識準確率(fear correct rate, FCR)之下界與上界分別為 .32 及 1。根據前述標準篩選出 CR 為界外值之刺激素材四張，為第 23 號(生氣, $CR = .26 < .31$)、第 27 號(高興, $CR = .46 < .72$)、第 31 號(難過, $CR = .47 < .56$)、第 33 號(高興, $CR = .50 < .72$)。後續資料分析將刪除此四張刺激素材(如圖 8 所示)，故本研究

圖 8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刪除之刺激素材



註：左上：第 23 號。右上：第 27 號。左下：第 31 號。右下：第 33 號。

之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最終含高興 10 張、難過 11 張、生氣 11 張、害怕 12 張、中性 12 張，共 56 張刺激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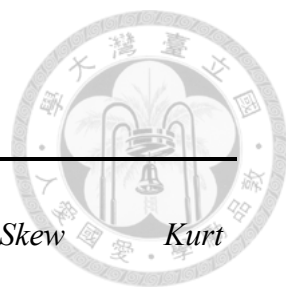
貳、描述性統計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量如表 4 所示，其中 HCR 平均較高，具負偏傾向；關係霸凌受害問卷、INQ 以及 INQ 額外添加自殺題之平均分數較低，具正偏傾向。各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如表 5 所示。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測量之不分情緒總辨識準確率 (total correct rate, tCR) 與其餘變項皆具顯著負相關。然細分不同情緒後，不同變項則有異，SCR 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皆具顯著負相關；HCR 除 INQ 外亦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皆具顯著負相關；ACR 僅與關係霸凌受害問卷具顯著負相關，FCR 則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皆未具顯著相關。中性刺激部分，僅 CDI 與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 (neutral to sadness, NS) 具顯著負相關、與中性刺激辨識成生氣次數 (neutral to anger, NA) 具顯著正相關。其中 CDI 與 SCR 及 NS 之相關較不符合正負向之預期。此外，關係霸凌受害問卷、CDI、INQ 三者間兩兩皆為顯著正相關，符合預期。

SEM 模型中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如表 6 所示。tCR 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各觀察變項具顯著負相關；細分不同情緒則以 HCR 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觀察變項皆達顯著，其餘情緒則相關較弱。tCR 與部分 CDI 之觀察變項具顯著負相關；區分不同情緒則以 SCR 與 CDI 其中四個觀察變項達顯著為最多。tCR 與 INQ 之觀察變項僅有少部分達顯著負相關。CDI 與 INQ 各觀察變項之間近乎全數達顯著正相關，符合預期。此外，INQ 二分量表與自殺意念題之相關係數接近，覺知他人負擔為 .54，挫敗的歸屬感為 .55。各觀察變項之偏態落於 0.31 ~ 2.53 之間，峰度則落於 -0.67 ~ 7.71 之間。

表 4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量



	總分 範圍	(Min, Max)	<i>M</i>	<i>SD</i>	<i>Skew</i>	<i>Kurt</i>
tCR	0-1	(.50, .98)	.79	0.10	-0.66	0.01
HCR	0-1	(.70, 1.00)	.95	0.08	-1.43	1.40
SCR	0-1	(.09, 1.00)	.75	0.19	-0.64	-0.02
ACR	0-1	(.27, 1.00)	.76	0.16	-0.59	0.05
FCR	0-1	(.15, 1.00)	.72	0.18	-0.77	0.28
NH	0-12	(0, 11)	3.27	2.18	0.61	0.13
NS	0-12	(0, 10)	4.10	2.18	0.27	-0.30
NA	0-12	(0, 10)	2.81	2.13	0.65	0.21
NF	0-12	(0, 6)	1.82	1.42	0.72	0.04
RB	0-64	(0, 27)	3.73	5.53	1.94	3.56
CDI	0-52	(1, 30)	12.56	6.42	0.46	-0.31
INQ	15-105	(15, 89)	31.39	15.64	1.16	1.07
Suicide	1-7	(1, 7)	1.70	1.44	2.05	3.07

註：NA = 中性刺激辨識成生氣次數。NF = 中性刺激辨識成害怕次數。RB =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Suicide = INQ 額外添加之自殺題。Skew = skewness. Kurt = kurto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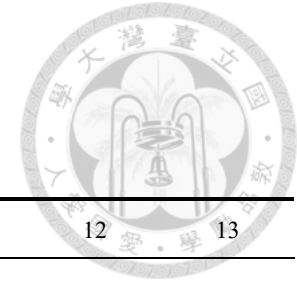


表 5

各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tCR	-												
2 HCR	.33***	-											
3 SCR	.66***	.26***	-										
4 ACR	.58***	-.02	.04	-									
5 FCR	.75***	.07	.22**	.28***	-								
6 NH	-.08	.14*	.08	-.11	-.19**	-							
7 NS	.06	.04	.21**	-.14*	.02	-.29***	-						
8 NA	.03	-.13	-.20**	.20**	.14*	-.47***	-.53***	-					
9 NF	-.02	-.08	-.14**	.08	.06	-.39***	-.30***	.04	-				
10 RB	-.24***	-.22**	-.14*	-.18**	-.11	.01	-.05	-.01	.07	-			
11 CDI	-.17*	-.17*	-.23***	.01	-.07	-.04	-.19**	.16*	.13	.42***	-		
12 INQ	-.18*	-.07	-.15*	-.10	-.09	-.11	-.04	.12	.04	.36***	.70***	-	
13 Suicide	-.22**	-.21**	-.23***	-.12	-.04	-.03	-.11	.11	.07	.35***	.59***	.59***	-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6

SEM 模型中各觀察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DANVA	-																						
2 HCR	.33***	-																					
3 SCR	.66***	.26***	-																				
4 ACR	.58***	-.02	.04	-																			
5 FCR	.75***	.07	.22**	.28***	-																		
6 RB 1	-.24***	-.23***	-.15	-.18**	-.09	-																	
7 RB 2	-.21**	-.15*	-.08	-.21**	-.11	.72***	-																
8 RB 3	-.15*	-.20**	-.12	-.07	-.06	.70***	.59***	-															
9 RB 4	-.22**	-.16*	-.11	-.14*	-.16*	.55***	.60***	.46***	-														
10 CDI 1	-.09	-.14*	-.17*	.06	-.02	.27***	.30***	.38***	.29***	-													
11 CDI 2	-.10	-.12	-.23***	.11	-.03	.32***	.31***	.37***	.25***	.56***	-												
12 CDI 3	-.20**	-.11	-.26***	-.02	-.08	.24***	.21***	.25***	.32***	.50***	.49***	-											
13 CDI 4	-.08	-.18*	-.08	-.06	.02	.25***	.26***	.34***	.24***	.43***	.42***	.28***	-										
14 CDI 5	-.07	-.06	-.11	-.04	.00	.27***	.28***	.22**	.23***	.39***	.43***	.25***	.49***	-									
15 CDI 6	-.17*	-.12	-.16*	-.06	-.09	.18**	.21**	.17*	.20**	.34***	.34***	.24***	.32***	.36***	-								
16 CDI 7	-.21**	-.09	-.10	-.05	-.24***	.13	.18**	.08	.30***	.32***	.32***	.39***	.25***	.17*	.14*	-							
17 CDI 8	-.03	-.07	-.08	.07	-.03	.10	.16*	.09	.13	.39***	.38***	.31***	.34***	.33***	.23***	.30***	-						
18 INQ 1	-.17*	-.05	-.16*	-.11	-.06	.28***	.33***	.36***	.26***	.43***	.45***	.44***	.35***	.38***	.35***	.37***	.27***	-					
19 INQ 2	-.15*	-.06	-.12	-.16*	-.05	.27***	.41***	.33***	.32***	.51***	.48***	.43***	.39***	.48***	.40***	.36***	.33**	.83***	-				
20 INQ 3	-.17*	-.09	-.10	-.09	-.12	.21***	.27***	.31***	.29***	.42***	.48***	.37***	.37***	.32***	.26***	.44***	.38***	.56***	.52***	-			
21 INQ 4	-.12	-.07	-.11	-.03	-.08	.17*	.28***	.25***	.21**	.42***	.40***	.37***	.32***	.29***	.31***	.56***	.39***	.55***	.56***	.74***	-		
22 INQ 5	-.12	-.03	-.16*	-.02	-.06	.13	.18**	.18**	.18**	.39***	.44***	.33***	.29***	.25***	.30***	.50***	.34***	.49***	.49***	.74***	.74***	-	
<i>M</i>	.79	.95	.75	.76	.72	0.32	0.21	0.28	0.12	0.36	0.66	0.25	0.65	0.62	0.54	0.20	0.56	1.78	1.93	2.40	2.17	2.18	
<i>SD</i>	0.10	0.08	0.19	0.16	0.18	0.51	0.40	0.46	0.26	0.36	0.39	0.36	0.43	0.41	0.33	0.28	0.39	1.18	1.28	1.26	1.23	1.29	

* $p < .05$. ** $p < .01$. *** $p < .001$.



參、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中，非中性刺激於不同情緒種類的辨識正確率 (CR) 之間、及中性刺激辨識成不同情緒之次數之間，是否具有差異，本研究透過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檢驗之。首先，分別進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如表 7 所示，兩者皆違反變異數同質性之假設，故改採 Welch 及 Brown-Forsythe 檢定，結果如表 8 所示。二檢定法均顯示不同情緒種類之 CR、及中性刺激辨識成不同情緒之次數，具有顯著差異；因變異數不同質，故採用 Games-Howell 事後檢定檢驗各變項間之差異細節，二者結果分別如表 9 與表 10 所示。非中性刺激部分，HCR 顯著大於其餘三種情緒之 CR，而其餘三種情緒 CR 間未有顯著差異。中性刺激部分，NS 顯著大於其餘三種情緒辨識次數；NH 與 NA 間未有顯著差異，而 NF 顯著小於其餘三種情緒辨識次數。

表 7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Levene 統計量	<i>df1</i>	<i>df2</i>	<i>p</i>
非中性刺激	26.70	3	836	< .001
中性刺激	15.41	3	836	< .001

表 8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之 Welch 及 Brown-Forsythe 檢定摘要表

	檢定法	統計量	<i>df1</i>	<i>df2</i>	<i>p</i>
非中性刺激	Welch	83.37	3	443.85	< .001
	Brown-Forsythe	46.88	3	718.90	< .001
中性刺激	Welch	60.43	3	455.23	< .001
	Brown-Forsythe	47.17	3	772.48	< .001

表 9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非中性刺激 CR 之 Games-Howell 事後檢定摘要表

(I)情緒種類	(J)情緒種類	平均值差異(I-J)	SE	p	95% CI
HCR	SCR	.146	.014	< .001	[.109, .182]
	ACR	.152	.012	< .001	[.120, .184]
	FCR	.147	.014	< .001	[.111, .184]
SCR	HCR	-.146	.014	< .001	[-.182, -.109]
	ACR	.006	.016	.979	[-.036, .049]
	FCR	.002	.018	.999	[-.044, .048]
ACR	HCR	-.152	.012	< .001	[-.184, -.120]
	SCR	-.006	.016	.979	[-.049, .036]
	FCR	-.005	.017	.991	[-.048, .038]
FCR	HCR	-.147	.014	< .001	[-.184, -.111]
	SCR	-.002	.018	.999	[-.048, .044]
	ACR	.005	.017	.991	[-.038, .048]

表 10

DANVA-II-TW 團體施測版中性刺激辨識次數之 Games-Howell 事後檢定摘要表

(I)情緒種類	(J)情緒種類	平均值差異(I-J)	SE	p	95% CI
NH	NS	-0.82	0.21	.001	[-1.37, -0.28]
	NA	0.46	0.21	.132	[-0.09, 1.00]
	NF	1.45	0.18	< .001	[0.99, 1.92]
NS	NH	0.82	0.21	.001	[0.28, 1.37]
	NA	1.28	0.21	< .001	[0.74, 1.82]
	NF	2.28	0.18	< .001	[1.81, 2.74]
NA	NH	-0.46	0.21	.132	[-1.00, 0.09]
	NS	-1.28	0.21	< .001	[-1.82, -0.74]
	NF	1.00	0.18	< .001	[0.54, 1.45]
NF	NH	-1.45	0.18	< .001	[-1.92, -0.99]
	NS	-2.28	0.18	< .001	[-2.74, -1.81]
	NA	1.00	0.18	< .001	[-1.45, -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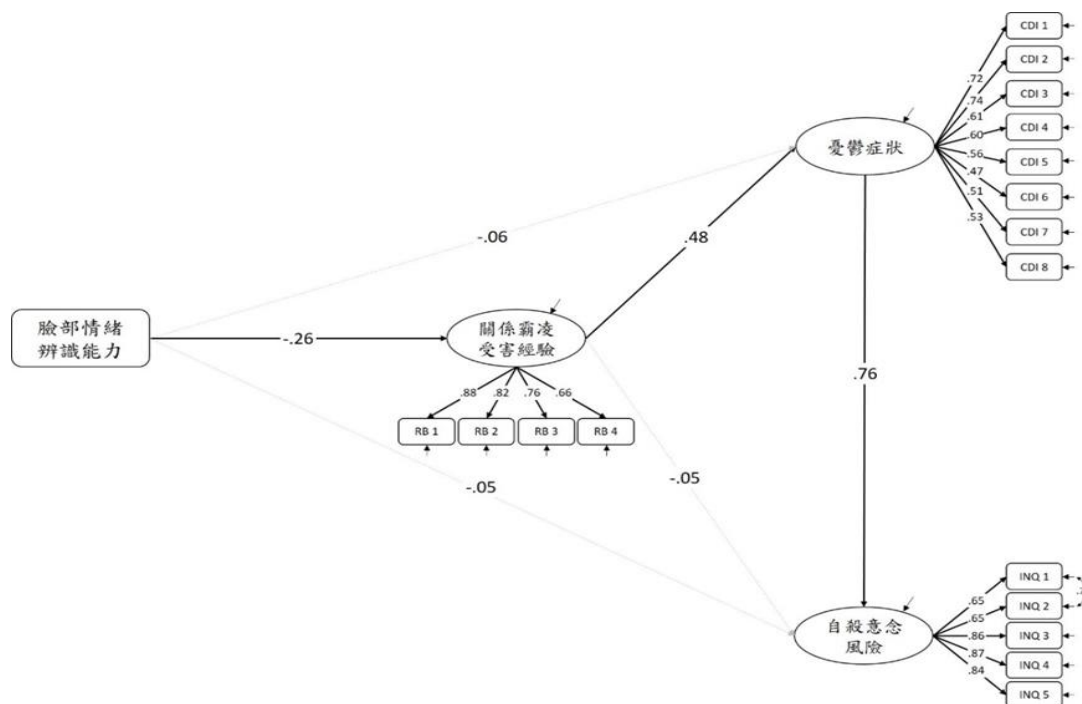
肆、結構方程模型檢驗

模型檢驗階段中，有關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變項，考量到各情緒種類中僅有 HCR 與 SCR 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具顯著相關，亦將其納入模型檢驗。此外，中性刺激之變項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未具顯著關聯性，且除了辨識成難過情緒外，過去文獻並未顯示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有關聯性之證據，故未納入模型進行檢驗。

首先，tCR 視為可觀察之變項，代表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並檢驗以其為獨變項之整體模型適配度。雖本研究預期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之風險並無直接關聯，仍將 DANVA 與 INQ 之間的路徑參數設定為自由估計。整體模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129, n = 210) = 277.26, p < .001$ ，RMSEA = .074 (95% CI = [.062, .086])，TLI = .902，CFI = .918，以及 SRMR = .074。整體而言，此模型具可接受之適配，模型如圖 9 所示。

圖 9

以 tCR 為獨變項之 SEM 模型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參數估計顯著之路徑；虛線表示參數估計未達顯著之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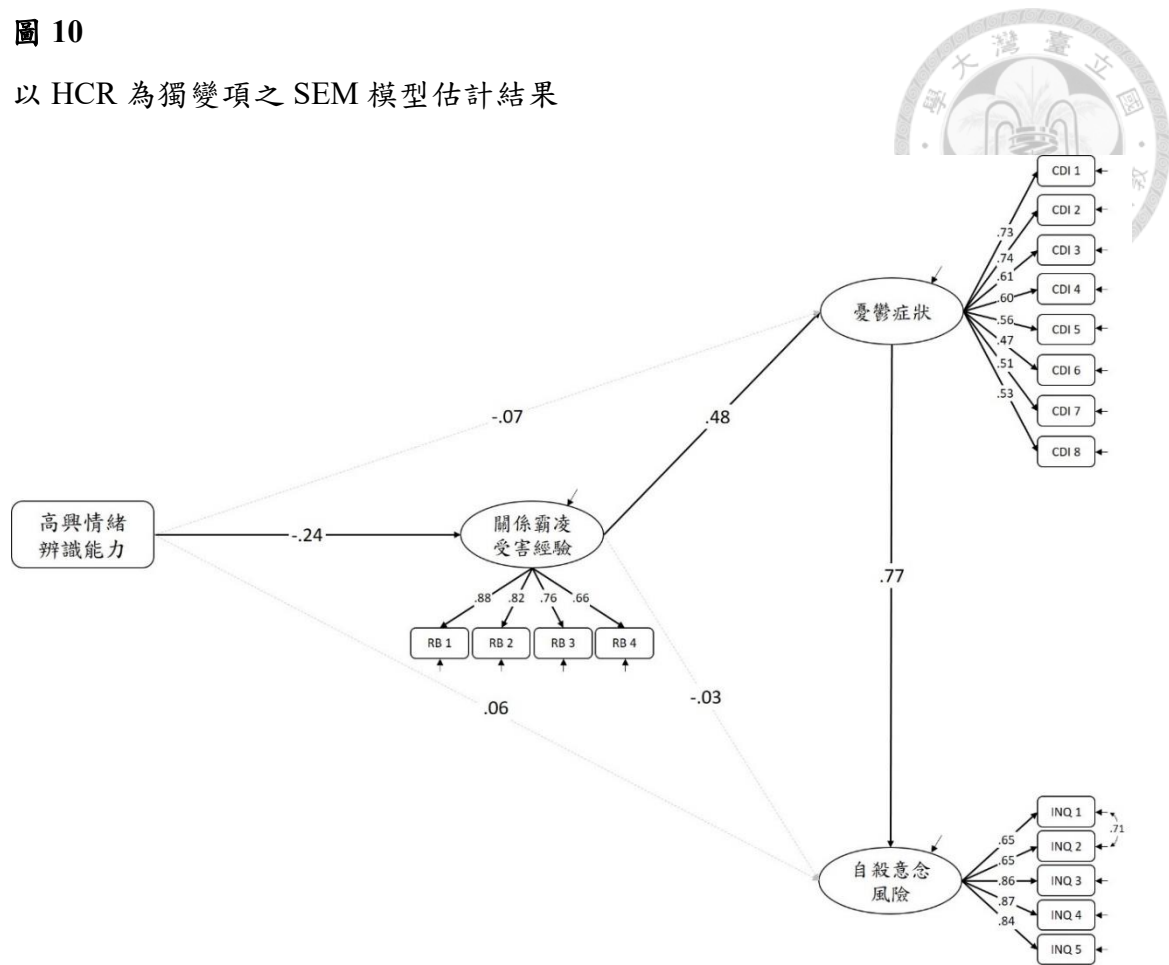
模型中之路徑係數部分與研究假設相異，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間的路徑係數未達顯著，且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亦未具顯著關聯；其他路徑係數之顯著與正負向皆符合本研究預期。中介效果部份如表 12 所示。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完全中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間的關係；當青少年個體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愈弱，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憂鬱症狀亦愈嚴重。此外，憂鬱症狀完全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的關係；當青少年個體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其憂鬱症狀愈嚴重，自殺意念之風險亦愈高。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憂鬱症狀於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的序列中介效果未達顯著。

考量 DANVA 區分情緒之 CR 中，僅 HCR 與 SCR 與非 DANVA 測量變項具顯著相關，故以此二種情緒 CR 替代 tCR，分別作為模型之獨變項，檢驗其模型適配度。HCR 及 SCR 二者與 INQ 之間的路徑參數仍維持自由估計。以 HCR 作為獨變項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129, n = 210) = 268.44, p < .001$ ，RMSEA = .072 (95% CI = [.060, .084])，TLI = .907，CFI = .922，以及 SRMR = .073，具可接受之適配；模型如圖 10 所示。路徑係數顯著性與正負向與 tCR 之模型相同。中介效果部份如表 12 所示。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完全中介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間的關係；憂鬱症狀完全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的關係。與 tCR 之模型不同的是，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憂鬱症狀完全序列中介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的關係；當青少年個體對高興情緒的辨識能力愈弱，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憂鬱症狀愈嚴重，且自殺意念之風險亦愈高。

以 SCR 作為獨變項之適配度指標如下： $\chi^2(129, n = 210) = 273.94, p < .001$ ，RMSEA = .073 (95% CI = [.061, .085])，TLI = .904，CFI = .919，以及 SRMR = .074，具可接受之適配；模型如圖 11 所示。路徑係數部分，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關係達顯著，然其正負向與本研究預期不符。中介效果部份如表 12 所示。憂鬱症狀完全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的關係；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於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間的中介效果未達顯著，即使如此，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憂鬱症狀仍完全序列中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的關係；當青少年個體對難過情緒的辨識能力愈弱，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憂鬱症狀愈嚴重，且自殺意念之風險亦愈高。

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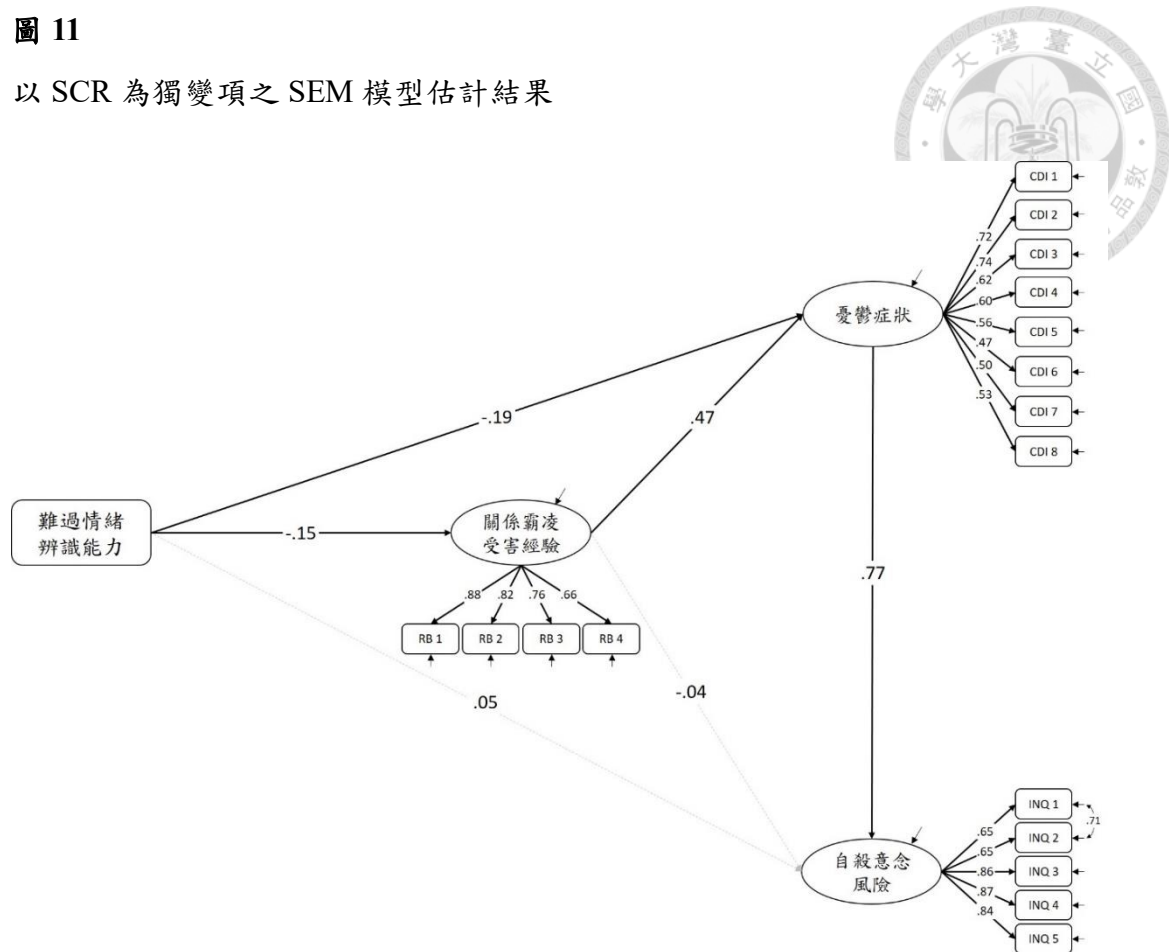
以 HCR 為獨變項之 SEM 模型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參數估計顯著之路徑；虛線表示參數估計未達顯著之路徑。

圖 11

以 SCR 為獨變項之 SEM 模型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參數估計顯著之路徑；虛線表示參數估計未達顯著之路徑。

表 11

不同獨變項之 SEM 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獨變項	CFI	TLI	SRMR	RMSEA	RMSEA 95% CI
tCR	.918	.902	.074	.074	[.062, .086]
HCR	.922	.907	.073	.072	[.060, .084]
SCR	.919	.904	.074	.073	[.061, .085]

表 12

不同獨變項之 SEM 模型中介效果統整

獨變項	中介路徑	β	95% CI	SE
tCR	tCR → RB → CDI	-.12***	[-.23, -.05]	.04
	RB → CDI → INQ	.36***	[.24, .52]	.07
	tCR → RB → CDI → INQ	-.13	[-.26, .02]	.07
HCR	HCR → RB → CDI	-.11**	[-.22, -.04]	.05
	RB → CDI → INQ	.37***	[.25, .51]	.07
	HCR → RB → CDI → INQ	-.14*	[-.27, -.01]	.06
SCR	SCR → RB → CDI	-.07	[-.16, .003]	.04
	RB → CDI → INQ	.36***	[.25, .50]	.06
	SCR → RB → CDI → INQ	-.19***	[-.32, -.07]	.07

* $p < .05$. ** $p < .01$.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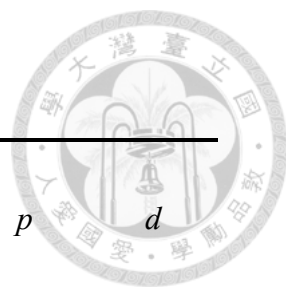
伍、性別分組比較

檢驗整體模型適配度與中介效果後，為瞭解性別差異於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各變項與整體模型之影響，分別檢驗男性與女性二組之模型。由於分組後二組之樣本數減少，較不適合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故以路徑分析各別檢驗並比較之。

一、性別差異之 t 檢定

進行路徑分析比較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性別差異對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等變項之影響。進行 t 檢定前先行檢驗變異數同質假設，若違反之則進行自由度之校正。分析結果如表 13 所示。女性在 tCR、ACR、FCR 顯著高於男性，NS 顯著少於男性。RB、CDI、INQ 及 INQ 額外添加之自殺題等四變項未具顯著性別差異，不符預期。

表 13

性別對各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i>n</i> = 210	男性 (<i>n</i> = 101)		女性 (<i>n</i> = 109)		<i>df</i>	<i>t</i>	<i>p</i>	<i>d</i>
	<i>M</i>	<i>SD</i>	<i>M</i>	<i>SD</i>				
	tCR	.78	.10	.81				
HCR	.96	.07	.96	.08	208	1.27	.207	.18
SCR	.75	.19	.75	.19	208	0.26	.795	.04
ACR	.74	.17	.78	.14	208	-2.18	.030	-.30
FCR	.69	.19	.76	.17	208	-2.99	.003	-.42
NH	3.16	2.10	3.38	2.26	208	-0.72	.470	-.10
NS	4.44	2.00	3.78	2.29	208	2.20	.029	.31
NA	2.65	2.20	2.96	2.06	208	-1.05	.292	-.15
NF	1.75	1.33	1.88	1.51	208	-0.65	.515	-.09
RB	4.18	5.83	3.32	5.24	208	1.12	.263	.16
CDI	12.37	6.78	13.54	6.62	208	-1.27	.210	-.18
INQ	32.08	17.18	30.74	14.12	194*	0.61	.541	.09
Suicide	1.68	1.40	1.71	1.49	208	-0.12	.907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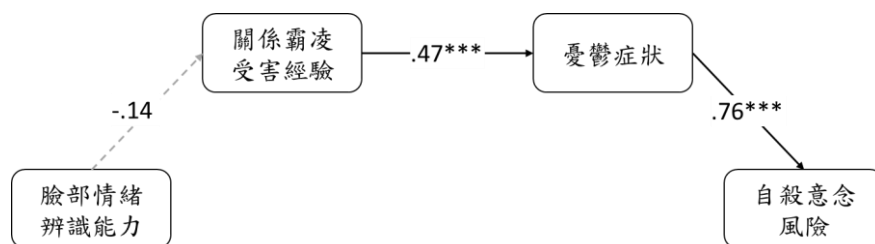
註：*經校正之自由度。

二、男性組路徑分析 ($n = 101$)

參考整體模型分析，分別以 tCR、HCR、SCR 等三個獨變項進行路徑分析，檢驗其模型適配度與中介效果。各模型如圖 12 所示；適配度指標如表 14 所示。整體而言，各模型均具良好之適配。路徑係數部分，三個模型中，僅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具顯著關聯；此外，關係霸凌正向預測憂鬱症狀，而憂鬱症狀正向預測自殺意念風險，符合預期。中介效果部分如表 15 所示。所有模型中，憂鬱症狀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之效果均達顯著。HCR 之模型中，無論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中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關係、憂鬱症狀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及整體序列中介效果皆達顯著；當男性青少年個體之高興情緒辨識能力愈弱時，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憂鬱症狀愈嚴重，且自殺意念風險愈高。

圖 1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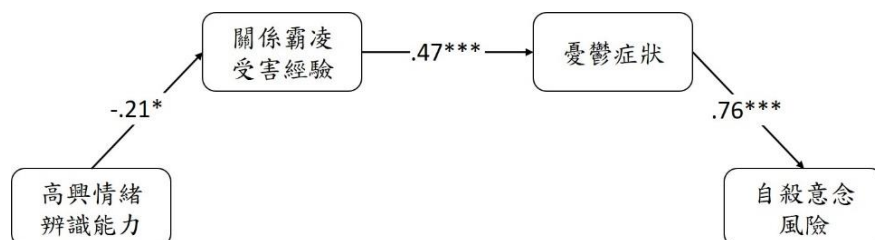
男性組以 t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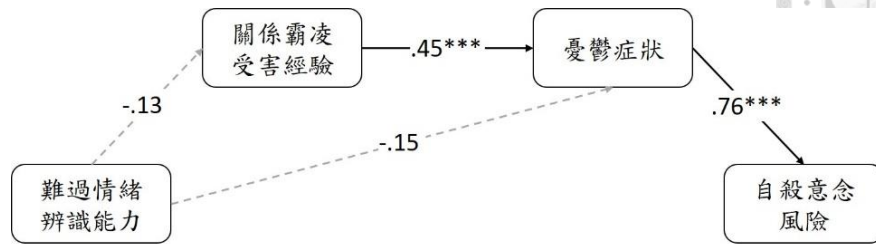
男性組以 H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2-c

男性組以 S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14

男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獨變項	CFI	TLI	SRMR	RMSEA	RMSEA 95% CI
tCR	.985	.970	.059	.075	[.000, .198]
HCR	.976	.953	.038	.095	[.000, .213]
SCR	.992	.975	.031	.068	[.000, .222]

表 15

男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中介效果統整

獨變項	中介路徑	β	95% CI	SE
tCR	tCR → RB → CDI	-.07	[-.17, .02]	.05
	RB → CDI → INQ	.36***	[.21, .49]	.07
	tCR → RB → CDI → INQ	-.05	[-.13, .11]	.04
HCR	HCR → RB → CDI	-.10*	[-.22, -.003]	.06
	RB → CDI → INQ	.36***	[.21, .49]	.07
	HCR → RB → CDI → INQ	-.07*	[-.17, -.004]	.04
SCR	SCR → RB → CDI	-.06	[-.18, .04]	.05
	RB → CDI → INQ	.34***	[.21, .47]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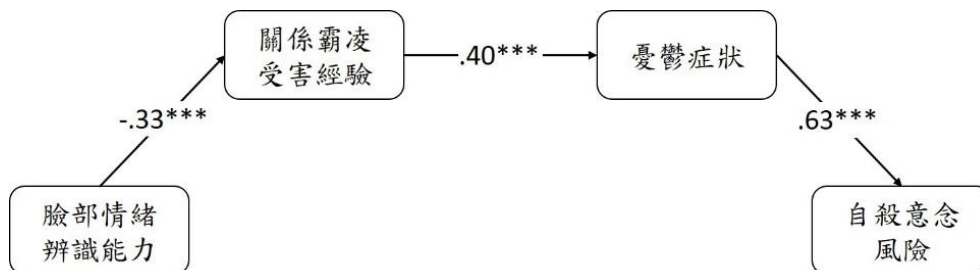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女性組路徑分析 ($n = 109$)

參考整體模型分析，分別以 tCR、HCR、SCR 等三個獨變項進行路徑分析，檢驗其模型適配度與中介效果。各模型如圖 13 所示；適配度指標如表 16 所示。整體而言，各模型均具良好之適配。路徑係數部分，女性青少年個體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未具顯著關聯，但與憂鬱症狀具顯著關聯。關係霸凌正向預測憂鬱症狀，而憂鬱症狀正向預測自殺意念風險，符合預期。中介效果部分如表 17 所示。除了 SCR 之模型中，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 SCR 與憂鬱症狀與之中介效果未達顯著外，其餘中介效果皆達顯著。女性青少年個體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或高興情緒辨識能力愈弱時，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憂鬱症狀愈嚴重，且自殺意念風險愈高。SCR 之模型不同的是，憂鬱症狀中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女性青少年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愈弱，憂鬱症狀愈嚴重，且自殺意念風險愈高。

圖 1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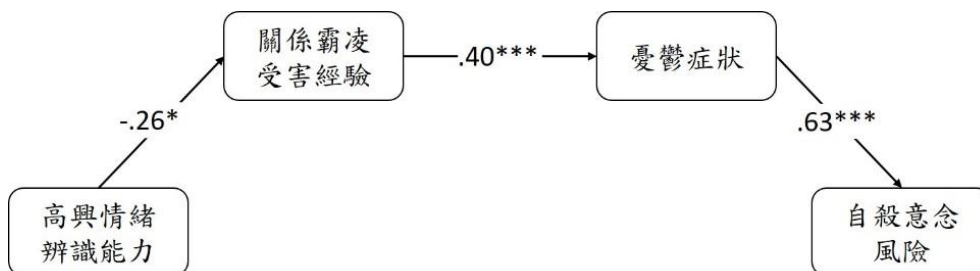
女性組以 t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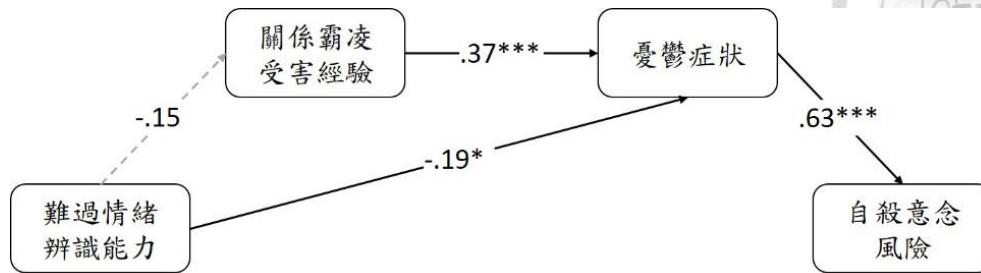
女性組以 H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3-c

女性組以 S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16

女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獨變項	CFI	TLI	SRMR	RMSEA	RMSEA 95% CI
tCR	1.000	1.037	.037	.000	[.000, .123]
HCR	1.000	1.046	.038	.000	[.000, .114]
SCR	1.000	1.079	.004	.000	[.000, .000]

表 17

女性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中介效果統整

獨變項	中介路徑	β	95% CI	SE
tCR	tCR → RB → CDI	-.13**	[-.25, -.03]	.06
	RB → CDI → INQ	.25***	[.15, .35]	.05
	tCR → RB → CDI → INQ	-.08**	[-.17, -.02]	.04
HCR	HCR → RB → CDI	-.10*	[-.21, -.01]	.05
	RB → CDI → INQ	.25***	[.15, .35]	.05
	HCR → RB → CDI → INQ	-.07*	[-.14, -.01]	.03
SCR	SCR → RB → CDI	-.06	[-.15, .02]	.04
	RB → CDI → INQ	.23***	[.13, .33]	.05
	SCR → CDI → INQ	-.16*	[-.32, -.03]	.07

* $p < .05$. ** $p < .01$. *** $p < .001$.



陸、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分組比較

脆弱質－壓力假說認為，環境壓力對憂鬱病理的影響具調節效果。為瞭解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作為調節變項對青少年人際憂鬱病理之影響，據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之原始資料重新計分，並以新分數將樣本分為低受凌組與高受凌組，比較二組在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各變項與整體模型之差異。

本研究將關係霸凌原始資料中，各題填答為 0 或 1 者重新計為 0 分，2 至 4 分者重新計為 1 分，並以此計分方式重新計算各樣本之總分，最後將總分 0 分者視為低受凌組，共 149 位；總分大於 1 分者視為高受凌組，共 61 位。由於分組後二組之樣本數減少，較不適合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故以路徑分析各別檢驗並比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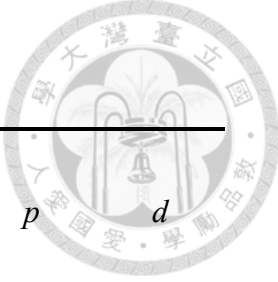
一、高低受凌組之 t 檢定

進行路徑分析比較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受凌經驗差異對脸部情緒辨識能力、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等變項之影響。進行 t 檢定前先行檢驗變異數同質假設，若違反之則進行自由度之校正。分析結果如表 18 所示。高低受凌組在 DANVA 測量之變項皆不具顯著差異。高受凌組在 CDI、INQ 及 INQ 額外添加之自殺題等三變項則顯著高於低受凌組。

二、高受凌組路徑分析 ($n = 61$)

分別以 tCR、四種情緒之 CR 等五個獨變項進行路徑分析，檢驗其模型適配度與中介效果。各模型如圖 14 所示；適配度指標如表 19 所示。整體而言，除 FCR 之模型外，各模型均具良好之適配。路徑係數部分，各模型之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關聯皆達顯著，符合預期；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難過情緒辨識能力、害怕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具顯著關聯，其中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正負向不符合預期。中介效果部分如表 20 所示。tCR 及 SCR 之模型達顯著，當高受凌青少年個體之脸部情緒辨識能力，或對難過情緒辨識能力愈弱時，其憂鬱症狀愈嚴重，且自殺意念風險愈高。

表 18

高低受凌組對各變項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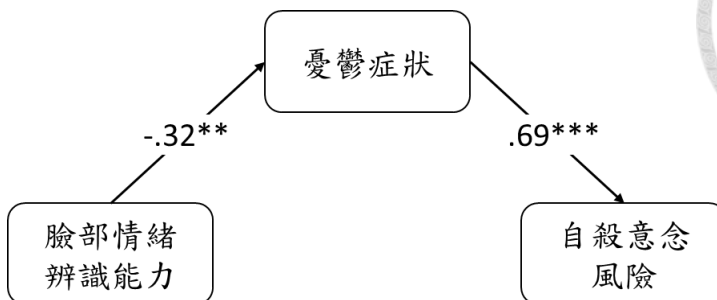
<i>n</i> = 210	高受凌組 (<i>n</i> = 61)		低受凌組 (<i>n</i> = 149)		<i>df</i>	<i>t</i>	<i>p</i>	<i>d</i>
	<i>M</i>	<i>SD</i>	<i>M</i>	<i>SD</i>				
tCR	.78	.10	.80	.09	208	1.54	.125	-.23
HCR	.93	.08	.96	.07	208	1.90	.059	-.29
SCR	.73	.21	.76	.18	96*	0.86	.390	-.14
ACR	.75	.17	.77	.15	208	0.82	.411	-.13
FCR	.71	.17	.73	.19	208	0.78	.438	-.12
NH	3.30	2.30	3.26	2.14	208	-0.10	.920	.02
NS	3.82	2.05	4.21	2.22	208	1.17	.241	-.18
NA	2.92	2.27	2.77	2.07	208	-0.45	.652	.07
NF	1.97	1.32	1.76	1.46	208	-0.97	.335	.15
CDI	16.57	6.63	10.92	5.57	96*	-5.86	<.001	.96
INQ	39.43	17.17	28.09	13.73	93*	-4.59	<.001	.77
Suicide	2.52	1.86	1.36	1.07	77*	-4.61	<.001	.87

註：*經校正之自由度。



圖 1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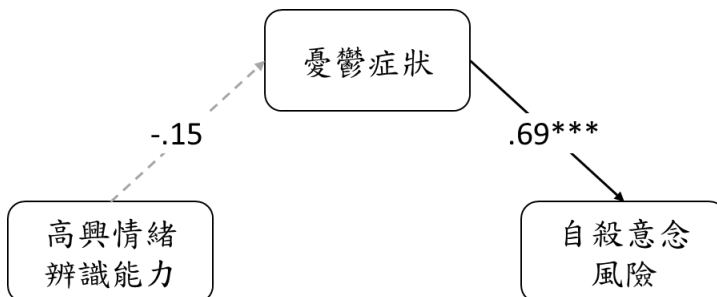
高受凌組以 t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p < .01$. $***p < .001$.

圖 1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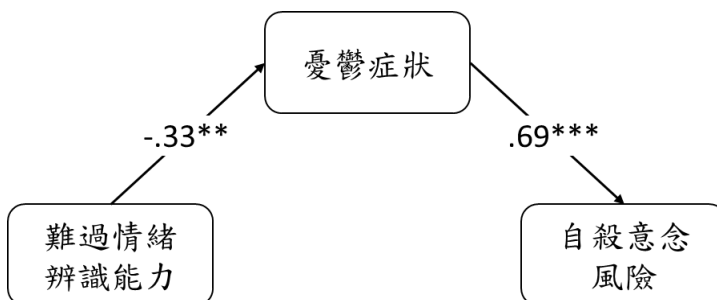
高受凌組以 H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p < .01$. $***p < .001$.

圖 14-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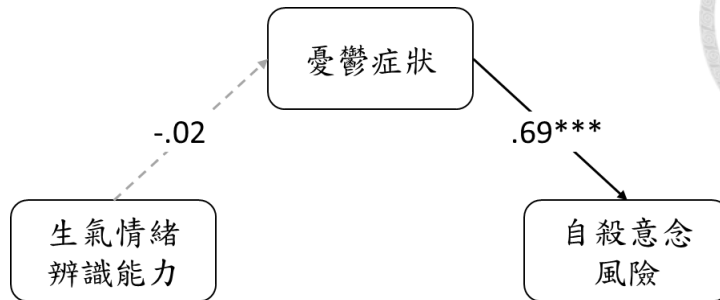
高受凌組以 S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p < .01$. $***p < .001$.

圖 14-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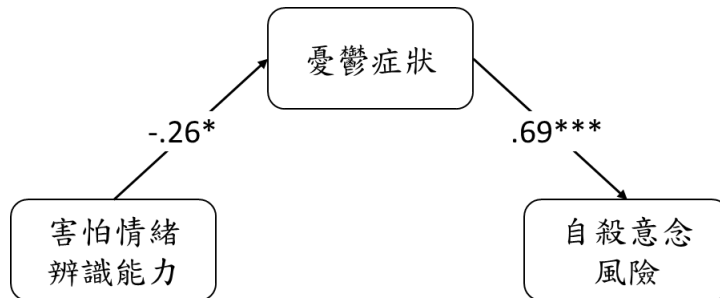
高受凌組以 A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p < .01$. $***p < .001$.

圖 14-e

高受凌組以 F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9

高受凌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獨變項	CFI	TLI	SRMR	RMSEA	RMSEA 95% CI
tCR	.994	.982	.041	.066	[.000, .357]
HCR	1.000	1.057	.021	.000	[.000, .279]
SCR	1.000	1.062	.013	.000	[.000, .243]
ACR	1.000	1.068	.017	.000	[.000, .262]
FCR	.938	.814	.070	.211	[.000, .460]

表 20

高受凌組不同獨變項模型之憂鬱症狀中介效果統整

獨變項	β	95% CI	SE
tCR	-.22*	[-.39, -.04]	.09
HCR	-.10	[-.24, .05]	.07
SCR	-.23*	[-.40, -.04]	.09
ACR	-.02	[-.18, .15]	.08
FCR	-.18	[-.38, .0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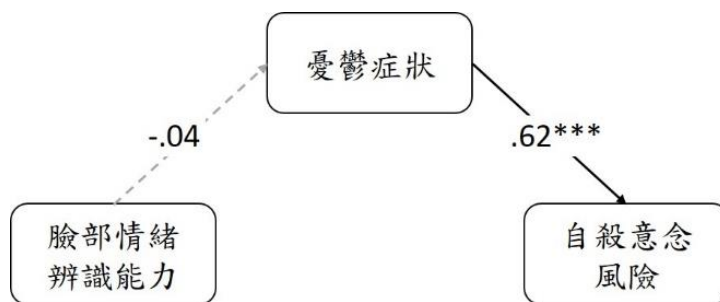
* $p < .05$.

三、低受凌組路徑分析 ($n = 149$)

各模型如圖 15 所示；適配度指標如表 21 所示。整體而言，除 ACR 之模型外，各模型均具良好之適配。路徑係數部分，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關聯皆達顯著，符合預期；DANVA 測量之變項與憂鬱症狀均未具顯著關聯。低受凌青少年個體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未顯著影響憂鬱症狀，然其憂鬱症狀愈嚴重，自殺意念風險愈高。

圖 15-a

低受凌組以 t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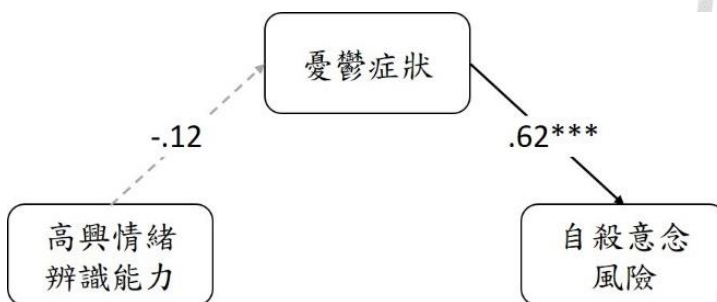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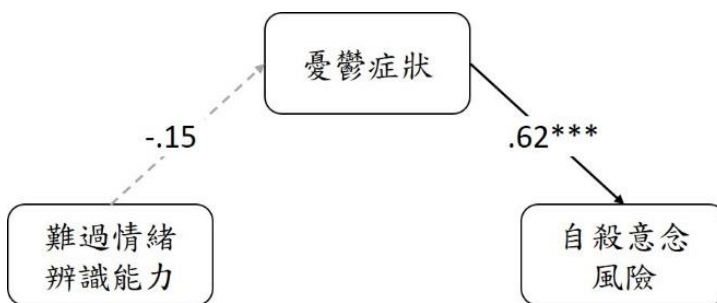
低受凌組以 H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5-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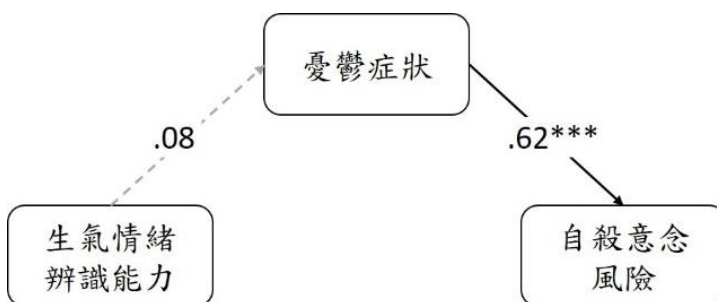
低受凌組以 S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5-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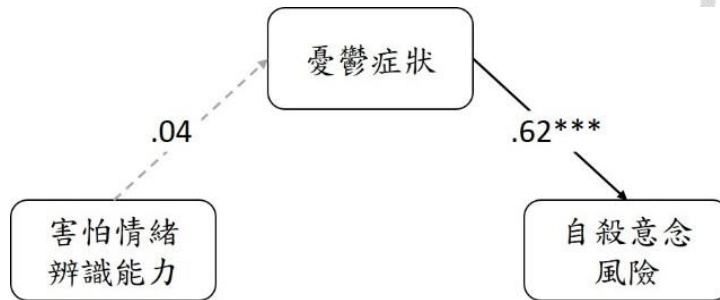
低受凌組以 A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15-e

低受凌組以 FCR 為獨變項之路徑分析估計結果



註：實線表示路徑顯著；虛線表示路徑不顯著。 $*p < .05$. $**p < .01$. $***p < .001$.

表 21

低受凌組不同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統整

獨變項	CFI	TLI	SRMR	RMSEA	RMSEA 95% CI
tCR	1.000	1.033	.012	.000	[.000, .170]
HCR	1.000	1.012	.022	.000	[.000, .204]
SCR	1.000	1.033	.012	.000	[.000, .167]
ACR	.939	.818	.061	.176	[.059, .330]
FCR	1.000	1.036	.011	.000	[.000, .162]



第四章 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於人際與社會認知層面，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的病理性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於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的病理機制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章將針對研究結果，進行以下部分的討論：首先，探討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情緒不具一致性的可能原因；其次，討論不同情緒種類在病理模型之中介效果的差異；最後，探討性別及受凌嚴重程度在本研究各變項與病理模型之差異。

第一節 脸部情緒辨識與憂鬱情緒一致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難過情緒辨識準確率、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皆與憂鬱症狀嚴重程度具顯著負相關，與研究假設不符。過去文獻多認為憂鬱者對難過情緒辨識愈準確，也愈容易將中性刺激辨識為難過情緒，具有「情緒一致性 (mood congruent)」的現象。本研究認為與預期不符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在方法層面，可能與脸部情緒刺激呈現時間有關。支持情緒一致性假說的文獻，其脸部情緒刺激呈現時間多為 1000 毫秒以上(黃玉蓮，2006; Bourke et al., 2010; Gollan et al., 2010; Weightman et al., 2014)；反之，不支持者多小於 500 毫秒 (Leppänen et al., 2004; Surguladze et al., 2004)。脸部情緒刺激呈現時間愈長，個體的認知處理時間愈長，而對於憂鬱個體來說，其負向認知模式也愈容易影響辨識的結果，若結合社會訊息處理理論的觀點，即登錄社會線索之後有更長的時間賦予負面的解釋，形成與負面情緒一致的辨識偏誤。本研究與其他呈現時間較短之研究結果皆不支持脸部情緒辨識具情緒一致性的現象，可能原因即為個體於社會訊息登錄階段以

後，負向認知模式於解釋階段未具充足時間影響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故本研究中難過情緒辨識準確率、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皆與憂鬱症狀嚴重程度具顯著負相關，可能為刺激呈現時間較短，導致憂鬱症狀背後的認知模式僅影響了訊息登錄階段的結果。然此部分推論尚缺乏驗證，故刺激呈現時間與社會訊息處理不同階段如何影響臉部情緒辨識，仍待後續研究探究。

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不符情緒一致性假說的原因，可能為個體憂鬱症狀愈嚴重，習慣了難過情緒的表達與接收，而對難過情緒之敏感度下降，類似情感麻木的現象。當他們接收到難過情緒刺激時，可能認為與中性情緒更接近，故降低了對難過情緒辨識的準確率；而面對中性刺激時，也因為他們更熟悉難過情緒臉，而較不易將其辨識為難過。然而目前相關文獻並未提及類似現象的研究證據，建議未來研究持續深入探討。

第二節 SEM 模型中的中介效果

模型路徑部分，本研究結果大致與假設相符，除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間無直接關聯，且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間亦未具直接關係。改以高興情緒辨識能力為獨變項之模型分析結果相同，然以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為獨變項之模型中，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負向預測憂鬱症狀不符合研究假設，其可能原因如前一節所述。中介效果部分，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高興情緒辨識能力之模型相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完全中介情緒辨識與憂鬱症狀的關係，而憂鬱症狀完全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本研究認為情緒辨識與憂鬱症狀、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無直接關聯的原因，即為完全中介效果的存在。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不佳的青少年個體不一定會直接發展出憂鬱症狀，而是於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不佳的情形下，更容易受到關係霸凌，並因此發展出後續的憂鬱症狀，此機制與社會訊息處理論對青少年憂鬱病理的解釋相互呼應，亦與 Franzen 等人（2021）的研究結果一致，即社會線索的登錄或解釋偏誤，易使青少年個體產出不適切社交行為，成為關係霸凌的攻擊目標，進而引發憂鬱症狀。若從傳統脆弱質—壓力假說的觀點來看，也意味著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作為社會認知脆弱質，並不會單獨提升憂鬱的風險。同樣的，受到關係霸凌的青少年個體並

不會直接提升發展出自殺意念的風險，而是於受到關係霸凌的情形下，更容易發展出憂鬱症狀，進而增加了自殺意念的風險，此機制與 Reed 等人 (2015) 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有關關係霸凌受害與自殺相關行為的研究結果仍不一致。Barzilay 等人 (2017) 對歐洲青少年的大型研究發現，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無法預測自殺意念，僅能預測自殺嘗試，且憂鬱症狀的調節效果要在低家長支持的情形下才顯著；然 Peng 等人 (2020) 對中國青少年的大型研究發現，在言語、肢體、關係、網路四種霸凌類型中，關係霸凌對自殺意念及自殺嘗試的預測效果最強。前述研究結果之共通點為關係霸凌與青少年自殺相關行為具顯著關聯，然與自殺意念或自殺嘗試的關係之間，是否存在可能的文化差異，或是有其他保護或風險因子影響，甚至需要考量憂鬱症狀以後整體病理機制的樣貌，仍待後續研究釐清。

以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為獨變項的模型呈現與前述不同的機制。憂鬱症狀完全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與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及高興情緒辨識能力模型一致，然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關係的中介效果不顯著。檢視路徑係數發現，雖然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關係顯著，但其係數和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高興情緒辨識能力模型相比較小。故，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較弱的關聯性，可能為中介效果不顯著的原因。雖然過去文獻多針對難過情緒辨識與憂鬱的關聯，亦發現不同情緒辨識對憂鬱病理的影響可能具有差異 (Bourke et al., 2010; Weightman et al., 2014)。本研究推論在社會訊息處理對憂鬱與自殺病理的影響中，可能亦具有情緒種類上的差異，即不同的情緒辨識可能具有不同的訊息處理歷程，導致不同的社交後果，造成中介效果的差異。參考 Guy 等人的研究 (2017)，臉部情緒辨識與受凌經驗的關係在於解釋階段的敵意歸因偏誤及自責特質，此結果是否具情緒種類上的差異，而導致本研究高興情緒辨識能力、難過情緒辨識能力模型在中介效果上的不同？目前仍未具充足研究證據，建議未來研究從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角度，深入對不同情緒種類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關係探究。

序列中介效果部分，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之模型不顯著，但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難過情緒辨識能力之模型顯著，即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憂鬱症狀中介了高興及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卻不中介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然如前文所述，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之模型內兩條中介路徑

皆顯著，序列中介效果卻不顯著；難過情緒辨識能力模型中僅憂鬱症狀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到自殺意念風險之效果顯著，序列中介效果卻顯著。本研究認為此模型間差異更能印證不同情緒種類之辨識對憂鬱、自殺病理的影響。過去文獻提及「高興」情緒在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西方受到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影響，高興的情緒內涵代表自主性（autonomy）、個人成長、人生目標等，和自尊（self-esteem）、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有關。東方則受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影響，高興情緒在遵循社會規範、達成人際目標、促進關係和諧與正向情緒互動經驗中產生（Uchida, Norasakkunkit, & Kitayama, 2004; Uchida & Ogihara, 2012）。由此可見，在集體主義傾向環境中，高興情緒在人際互動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本研究推論對重視同儕關係的青少年來說，高興情緒的辨識能力對適應性社交行為的產出至關重要，故其對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自殺意念風險之影響相較於其他情緒更為顯著。此外，如本節前文探討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相關行為的關係所述，本研究推論青少年憂鬱與自殺之病理機制可能除了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二變項以外，仍有其他風險或保護因子的影響存在。

第三節 性別差異

壹、臉部情緒辨識能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中，女性的總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生氣情緒辨識能力、害怕情緒辨識能力顯著高於男性。生氣情緒辨識能力與害怕情緒辨識能力顯著高於男性之結果，符合女性對負面情緒辨識能力高於男性之假設，亦與 Thompson 和 Voyer（2014）的適應威脅假說相互呼應，生氣與害怕的情緒具有威脅迫近的意涵，女性為了保護後代的生存而對此類情緒辨識能力優於男性。總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顯著較高的結果，一部份可能為生氣情緒辨識能力與害怕情緒辨識能力較高導致。另一方面，Lawrence 等人（2015）對女性的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高於男性提出一假設，認為此現象與女性同理心（empathy）與動作線索的情緒辨識能力高於男性有關。然此推論目前仍缺乏研究證據，有待未來研究持續

探究同理心、動作線索之情緒辨識與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關係，並延伸至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性別差異。

在臉部情緒辨識的中性刺激部分，女性的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顯著少於男性，此結果與 Lopez-Duran 等人 (2012) 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發現高憂鬱風險的男性青少年在面對模糊刺激時，比女性更容易將刺激辨識成難過情緒。由於本研究結果之性別差異為使用全樣本分析，為檢視是否與前述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進行後續檢定，據 CDI 總分之中位數 ($Md = 12$) 區分低憂鬱組 ($CDI \leq 12; n = 111$) 與高憂鬱組 ($CDI \geq 13; n = 99$)，並對高憂鬱組進行 t 檢定比較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之性別差異。 t 檢定結果發現，高憂鬱組的中性刺激辨識成難過次數，男性顯著高於女性 ($M_M = 4.37 \pm 1.93, M_F = 3.27 \pm 2.39, df = 97, t = 2.48, p = .015, d = .51$)，與 Lopez-Duran 等人 (2012) 的研究結果一致。雖然本研究以 CDI 分數區分高低憂鬱組，而 Lopez-Duran 等人 (2015) 以親族病史作為風險高低之區別，但他們認為對細微的難過情緒過度敏感即為提高男性青少年憂鬱風險的機制之一。故本研究據此推論，男性青少年此特性可能續存至發展出憂鬱症狀之後，而對難過情緒過度敏感可能為男性青少年憂鬱病理機制中的重要風險因子。

貳、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

本研究結果顯示，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皆未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與研究假設不符。過去文獻多認為女性青少年涉入關係霸凌的機率高於男性，無論是作為攻擊者或受凌者。從心理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個體進入青少年早期時，男性較關注同性同儕團體間的權力與社會地位，易使用肢體霸凌此種明顯可見的形式達成目的；女性則關注其與同性同儕團體間的社交連結與影響力，易使用操縱人際關係的關係霸凌以達成目的 (Galen & Underwood, 1997)。然而，本研究之樣本為國中一年級的學生，且施測時間距離開學僅二個月，學生之間可能尚未建立穩固之同儕團體，故透過霸凌行為影響人際關係的現象也就較少，在發生率較低的情形下性別差異即不明顯。建議後續研究蒐集不同年級與不同時間點之樣本，比較其關係霸凌事件發生率，並進一步檢驗性別差異。

過去文獻認為，憂鬱的性別差異在兒童期時並不明顯，約在青少年早期 (約

13 歲時), 逐漸發展出女性多於男性的趨勢, 此現象可由脆弱質—壓力假說解釋。女性的認知脆弱質包括負向歸因、反芻、人際依賴傾向皆高於男性, 且於青少年早期開始包括生理上較男性早成熟, 或是人際與親密關係帶來的壓力, 使女性青少年面對環境壓力時的反應較男性強, 提升發展出憂鬱症狀的風險 (Girgus & Yang, 2015; Nolen-Hoeksema & Hilt, 2009)。考量過去文獻對憂鬱性別差異的解釋, 本研究推論未呈現顯著性別差異之原因可能為樣本年齡 ($M=12.23$) 較小, 故女性青少年面對之內在及外在挑戰尚未與其認知脆弱質交互產生顯著影響。另一方面, 本研究為社區樣本, 以 CDI 測量其憂鬱症狀嚴重程度, 而過去研究多以鬱症診斷與否進行分組比較, 樣本與方法上的差異亦可能為導致性別差異不顯著的原因。

根據 Joiner (2007) 的自殺人際論, 女性青少年之自殺意念高於男性的原因, 可能為女性的人際需求高於男性。然本研究結果顯示, 自殺意念風險並未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Kaess 等人 (2011) 調查青少年自殺相關行為的性別差異發現, 身心症狀、憂鬱或焦慮情緒、攻擊行為、偏差行為等情緒及行為問題能預測自殺意念, 且解釋變異量達 30%, 然考量性別因素後解釋變異量僅提升 0.3%, 顯示自殺意念的性別差異源於男女在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差異, 即女性青少年之情緒及行為問題較嚴重, 導致自殺意念較強之結果。本研究結果之憂鬱症狀即未呈現顯著差異, 且本研究亦未調查其他行為問題, 樣本中可能存在其他影響自殺意念風險之因素, 導致本研究結果呈現自殺意念風險未具顯著性別差異之結果。

參、模型及中介效果差異

模型適配度部分, 和女性組相比, 男性組在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高興情緒辨識能力、難過情緒辨識能力三種獨變項之模型適配度指標皆較差, 然仍具良好之適配。路徑係數部分, 男女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皆無法預測關係霸凌受害經驗, 而女性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負向預測憂鬱症狀; 高興情緒辨識能力皆能負向預測關係霸凌受害經驗; 總脸部情緒辨識能力僅有女性能負向預測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在所有模型中, 男女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皆正向預測憂鬱症狀, 憂鬱症狀皆正向預測自殺意念風險。承前一節所述, 不同情緒種類辨識對於青少年憂鬱、自殺之

病理機制可能有不同的影響，而在區分性別之後此差異仍存在。不同之處為僅有女性之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負向預測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本研究推測女性青少年整體較好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使其登錄、解釋社交線索並產出適切社交行為的能力較男性佳，故辨識能力愈強，受到關係霸凌的機會愈低；而男性青少年較弱的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與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關係即較弱。此外，女性的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負向預測了憂鬱症狀，憂鬱症狀也中介了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顯示難過情緒辨識能力在女性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病理的角色中，可能不受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影響，而直接提升了憂鬱及自殺的風險。最後，在所有模型中，憂鬱症狀皆中介了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顯示在不考量性別、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情形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皆於青少年憂鬱與自殺病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一人際風險因素。

第四節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之差異

傳統憂鬱病理的脆弱質—壓力假說中，將環境壓力視為調節變項，影響脆弱質與憂鬱的關係。本研究依據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嚴重程度進行分組比較，檢驗其對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的調節效果。

壹、差異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低受凌組在 DANVA 測量之變項皆不具顯著差異。雖然此結果不符合研究假設，但進一步檢視發現，高受凌組之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等五個變項（總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高興情緒辨識能力、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生氣情緒辨識能力、害怕情緒辨識能力）皆稍低於低受凌組，其中高興情緒辨識能力接近臨界顯著 ($p=.059$)。由於本研究樣本區分為高低受凌組後，高受凌組之樣本數較小 ($n=61$)，且樣本為單一國中的一年級學生，代表性較不足。建議未來研究增加樣本數，並納入不同學校，再觀察高低受凌組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差異。

高受凌組在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皆顯著高於低受凌組，符合研究假設，亦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 (Brunstein Klomek et al., 2019; Craig, 1998; Hampel et al.,

2009; Perry et al., 1988; Wang et al., 2011; Wolke et al., 2000)。此外，本研究模型分析中，憂鬱症狀中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即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愈嚴重者，其憂鬱症狀愈嚴重，且出現自殺意念之風險愈高。高低受凌組之差異與模型分析結果相互呼應，再度驗證了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青少年身心的負面影響。

貳、模型及中介效果差異

模型適配度部分，除高受凌組之害怕情緒辨識能力模型及低受凌組之生氣情緒辨識能力模型外，皆具良好之適配，顯示此二組模型估計無法完全解釋本研究樣本中有關害怕情緒辨識能力對高受凌青少年、及生氣情緒辨識能力對低受凌青少年的憂鬱病理影響。然而，其餘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為獨變項之模型皆具良好適配，本研究推測可能為研究樣本代表性的問題，有待未來研究持續檢驗害怕及生氣情緒辨識對青少年憂鬱、自殺之病理性影響，如何受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調節。

低受凌組在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變項與憂鬱症狀的關係皆未達顯著，故本研究未進行中介效果檢驗。高受凌組中，僅高興情緒辨識能力、生氣情緒辨識能力二者與憂鬱症狀未達顯著，與低受凌組相同。所有模型的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風險之關係皆達顯著。據此結果推測，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調節效果可能發生在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難過情緒辨識能力二者與憂鬱症狀的關係，即青少年個體的總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缺損並不會直接導致憂鬱症狀的產生，而是需要在受到關係霸凌攻擊的情形下，才會引發憂鬱症狀。此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及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憂鬱病理的影響，符合過去脆弱質—壓力假說的病理架構，即脸部情緒辨識能力作為脆弱質，需要透過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環境壓力）促發，才會導致憂鬱。然而，本研究整體模型顯示，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能中介總脸部情緒辨識能力、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的關係，中介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效果不顯著。相較之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關係具中介效果，但不具調節效果；反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關係具調節效果，但不具中介效果。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對總脸部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之關係既具中介亦具調節效果，然總脸部

情緒辨識能力本身即包含了不同情緒的辨識能力，本研究推測其應混雜了前述高興情緒辨識能力與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的結果，此結果亦反映了在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對憂鬱病理影響的研究中，區分情緒種類的重要性。







第五章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貢獻

壹、心理病理方面

有鑑於青少年憂鬱及自殺的問題日漸嚴重，過去臺灣國內已有許多青少年憂鬱或自殺的相關研究，探討了不同風險或保護因子的病理性影響。然而，從青少年族群人際需求提升之特性，深入探討社會認知層面的研究設計較少。本研究結合傳統認知脆弱質－壓力假說及社會訊息處理論等憂鬱病理模型，探討臉部情緒辨識能力、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在人際與社會認知層面的病理性影響。本研究證實了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為青少年憂鬱的社會認知脆弱質，尤其是高興、難過的情緒辨識，而關係霸凌受害經驗此一人際壓力事件則導致辨識缺損之個體產生後續的憂鬱症狀、提高自殺意念的風險。此外，在不考量脸部情緒辨識能力的情形下，憂鬱症狀完全中介了關係霸凌受害經驗與自殺意念風險的關係，雖然本研究為橫斷式設計，仍初步證實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引發青少年憂鬱症狀，再產生後續自殺意念的病理發展。本研究結果亦提供了脸部情緒辨識能力及關係霸凌受害經驗二變項在憂鬱及自殺病理上具性別差異的證據。雖然男女之間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未具顯著差異，但青少年的人際與社會認知對憂鬱及自殺病理影響的性別差異，仍為值得研究關注的議題。



貳、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自行編製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為首份整合關係霸凌之定義，據其行為指標編寫題項，且初步檢驗後具良好心理計量特性之量表。此量表除了研究上能更精準地捕捉關係霸凌之行為樣態，亦能應用於教育場域之篩檢。過去關係霸凌的研究多採用同儕指名法，或直接調查研究參與者之經驗有無，教育場域也多以後者為主。此類方法可能較易受到人際脈絡、社會期許等因素干擾，本研究所研發的此量表對關係霸凌的各項行為指標進行測量，能較客觀地瞭解填寫者是否有遭遇到符合關係霸凌定義之攻擊行為。學校導師或輔導教師可透過量表填寫之結果，深入瞭解學生受到關係霸凌之情形，並啟動後續輔導或臨床專業資源之轉介。此外，過去針對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的研究工具多為個人電腦化施測，而國內亦少有青少年樣本之資料。本研究考量教育現場之施測條件，重新製作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並以青少年樣本之資料篩選其刺激素材。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可直接於教育現場投影播放，提升施測之效率與便利性，未來也能應用此工具持續蒐集臺灣國內青少年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資料。

參、臨床與教育場域的應用方面

本研究期待能透過病理模型之建構，提供臨床及教育場域應用或介入的新視野，甚至嘗試整合三級預防之策略。結果證實，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為導致青少年憂鬱及自殺風險提升之人際壓力事件，而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缺損可能使個體產出不適切社交行為，使其成為關係霸凌攻擊的目標。國內校園霸凌之預防已行之有年，然而相關政策可能較少著墨於關係霸凌。教育最前端可提升導師對關係霸凌事件之敏感度，並與輔導教師合作，適時提供青少年有關同儕人際互動之教育，於課程設計中融入情緒辨識、解釋與社交行為之關係。針對受凌之青少年，可應用本研究編製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評估其受凌嚴重程度，同時評估其憂鬱症狀，必要時轉由臨床工作者協助。臨床實務方面，面對因關係霸凌受害而產生情緒困擾之青少年，可應用 DANVA-II-TW 評估其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並針對其高

興、難過二情緒辨識之缺損進行訓練。同時，臨床工作者可並行認知行為治療技術，與受凌青少年討論其對社交情緒訊息之解釋，並引導思考社交行為之後果，達到改變其人際互動模式之成效，避免再次成為關係霸凌攻擊的目標。自殺風險評估方面，可應用臺灣中文版 INQ 評估其覺知他人負擔及挫敗的歸屬感二個因子，臨床工作者據此與受凌青少年進行人際關係與自我的再評估，並重新建立、穩固支持網絡，促進其社會連結，以減緩自殺風險。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參與者均來自同一所國中的一年級學生，樣本代表性較不足。且施測期間距開學僅二個月，學生可能仍在適應新的學校環境、尚未建立穩固之同儕團體，故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所得之資料，有可能為參與者過去於小學之經驗。過去文獻發現，兒童青少年校園霸凌在六到九年級間最常發生，其中肢體霸凌比率逐漸下降，但關係霸凌比率卻逐漸上升 (Scheithauer et al., 2006)。故個體的年齡或不同教育階段等因素可能影響到關係霸凌受害經驗的發生率，而受凌經驗對憂鬱及自殺的病理性影響可能也不同。此外，由於據性別或受凌嚴重程度分組時，各組樣本數較小，故進行模型比較時，僅能採用未考量變項之測量誤差的路徑分析進行探索，未能如整體模型時採用 SEM 分析變項間之關聯。建議未來研究蒐集更多來自不同學校之樣本，並包含不同年齡層之青少年，重新驗證本研究假設之模型，觀察不同年級之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及其對憂鬱、自殺之病理性影響，並再次比較性別與受凌嚴重程度之模型差異。

本研究嘗試建構 SEM 模型並驗證變項間影響之路徑，然本研究為橫斷式設計，單一時間點蒐集之資料仍無法完全推論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尤其是難過情緒辨識能力與憂鬱症狀的關聯性。過去文獻對於二者預測方向性並未有共識，雖本研究認為難過情緒辨識能力為憂鬱症狀的社會認知脆弱質之一，然反過來憂鬱症狀是否影響了個體的難過情緒辨識能力？建議未來研究採縱貫式設計，蒐集不同時間點的資料，探討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作為脆弱質隨時間之穩定性，及變項間的時間序與預測方向性。此外，未來研究亦可嘗試納入跨時間點間可能的保護或風險因子，延伸對青少年憂鬱及自殺病理的理解，並擴展到實務及應用的面向。

研究工具方面，過去 DANVA-II-TW 電腦化施測版具良好之信效度 (Tseng, Chen, & Huang, 2012)，且能同時蒐集參與者對於情緒強度之辨識與反應時間。考量對青少年族群之施測效率及課堂時間限制，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未蒐集參與者對情緒強度之辨識與反應時間，且目前仍未進行評分者間信度與再測信度之檢驗。建議未來研究對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進行信效度檢驗，並於施測條件允許時重新加入對情緒強度之辨識；此外，亦能嘗試以電腦化施測版蒐集青少年對臉部情緒辨識之反應時間，並與團體施測版比較辨識準確率、中性刺激辨識成其他情緒次數等資料。

最後，本研究雖然探討青少年的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如何影響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於憂鬱及自殺病理的角色，但青少年階段個體需要面對的壓力是複雜且具挑戰性的。校園霸凌除了關係霸凌外，也包含不同種類，人際壓力事件亦有親密關係、家庭等，而非僅聚焦於同儕，這些壓力可能都與青少年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有關，即與登錄、解釋社交訊息到產出社交行為的歷程息息相關。建議未來研究結合社會訊息處理論，持續探究在臉部情緒辨識能力對憂鬱及自殺的病理性影響中，不同人際壓力事件所扮演的角色。



第六章 參考文獻

- 王齡竟、陳毓文 (2010)：〈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檢視同儕、專業與家外成人支持的緩衝作用〉。《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1)，65-97。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003_23\(1\).0003](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003_23(1).0003)
- 王孜甯、程景琳 (2010)：〈「情境式關係攻擊量表」之發展〉。《測驗學刊》，57(3)，345-370。
<https://doi.org/10.7108/PT.201009.0345>
- 王明傳、雷庚玲 (2007)：〈青少年前期的間接攻擊行為：同儕估計法的建構效度〉。《中華心理學刊》，49(2)，205-224。
<https://doi.org/10.6129/CJP.2007.4902.06>
- 王明傳、雷庚玲 (2008)：〈華人青少年前期兒童之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與情緒經驗〉。《中華心理學刊》，50(1)，71-90。
<https://doi.org/10.6129/CJP.2008.5001.05>
- 李宛津、黃恆獎、林慧麗、沈勝昂、劉同雪 (2009)：〈探討大學生家庭功能、社會訊息處理與憂鬱之關係〉。《輔仁醫學期刊》，7(3)，113-130。
- 李曉敏、辛鐵鋼、袁靖、呂麗霞、陶佳雨、劉勇 (2015)：〈人際需求問卷中文版測評大學生樣本的效度與信度〉。《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23(4)，590-593。
- 林苡彤、程景琳 (2010)：〈國中生關係攻擊加害者與受害者之規範信念、同理心與因應策略〉。《臺東大學教育學報》，21(2)，1-28。
<https://doi.org/10.6778/NTTUERJ.201012.0001>
- 兒童福利聯盟 (2007)：〈認識「校園霸凌」〉。兒福聯盟。
https://www.children.org.tw/archive/report_detail/88/119
- 兒童福利聯盟 (2019)：〈2019台灣家長對校園霸凌之認知與態度調查〉。兒福

- 聯盟。 https://www.children.org.tw/publication_research/research_report/724
- 吳艷、溫忠麟(2011)：〈結構方程建模中的題目打包策略〉。《心理科學進展》，19(12)，1859-1867。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11.01859>
- 教育部(民109年7月21日)：〈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81>
- 高民凱、林清文(2008)：〈中學生的解釋風格、生活壓力和憂鬱之關係：從憂鬱的認知特異質－壓力模式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30(1)，41-59。
<https://doi.org/10.7040/JGC.200805.0041>
- 張又文(2011)：《情緒脈絡線索與表情的一致性在社會焦慮者表情辨識所扮演的角色》(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https://doi.org/10.6342/NTU.2011.02544>
- 陳為堅(2001)：《青少年憂鬱症狀與憂鬱疾患的流行病學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報告書，計畫編號：NSC89-2314-B002-473。
- 陳淑惠(2006)：《憂鬱與非語言情緒辨識之關連性探索(II)》。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95-2413-H-002-022)。
- 陳淑惠(2008)：《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指導手冊》。心理出版社。
- 陳爾璞(2008)：《臉部表情的情緒辨認能力缺損：不同情緒狀態下的雙極性疾患患者比較》(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原大學。
<https://doi.org/10.6840/CYCU.2008.00359>
- 陳儀龍(2018)：《臺灣兒童全國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工具、盛行率、危險因子與疾病負擔》(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https://doi.org/10.6342/NTU201804130>
- 陳建中、卓淑玲、曾榮瑜(2013)：〈台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心理生理資料庫－專業表演者臉部表情常模資料〉。《中華心理學刊》，55(4)，439-454。
<https://doi.org/10.6129/CJP.20130314>
- 黃玉蓮(2006)：《憂鬱症患者之非語言情緒辨識表現初探》(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https://doi.org/10.6342/NTU.2006.02101>
- 黃舒亭(2023)：《青少年心理韌性與情緒調節策略對校園受凌經驗導致憂鬱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游亞儒 (2013) : 《校園關係霸凌事件中受凌學生之個案研究》 (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n3d4s4>

曾懷萱 (2003) : 《情緒性非語言行為的覺知特性與精神分裂病質傾向的關連性探討》 (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6pdfu3>

衛生福利部 (2022) : 〈死因統計: 110年年齡別統計表〉。

<https://dep.mohw.gov.tw/dos/lp-5069-113-xCat-y110.html>

衛生福利部 (2022) : 〈歷年全國自殺死亡資料統計暨自殺通報統計〉。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904-8883-107.html>

蔡卿雄 (2012) : 《兒童憂鬱量表之因素結構探究》 (碩士論文,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qvrh4c>

潘奕瑄 (2015) :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負面人際情境中的社會認知之探索》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

<https://doi.org/10.6342/NTU.2015.02177>

Abela, J. R. Z., & Hankin, B. L. (2008).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perspective. In J. R. Z. Abela & B. L. Hankin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p. 35-78). The Guilford Press.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2), 358-37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6.2.358>

Abramson, L. Y., Seligman, M. E., & Teasdale, J. D.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1), 49-74.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87.1.49>

Allison, S., Allison, S., Roeger, L., Martin, G., & Keeves, J. (200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young adolescents.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4), 498-503.

<https://doi.org/10.1046/j.1440-1614.2001.00927.x>

Alloy, L. B., Abramson, L. Y., Whitehouse, W. G., Hogan, M. E., Panzarella, C., & Rose, D. T. (2006). Prospective incidence of first onsets and recurrences of depression in individuals at high and low cognitive risk f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5(1), 145-156.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5.1.14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Arango, A., Opperman, K. J., Gipson, P. Y., & King, C. A. (2016).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youth who report bully victimization, bully perpetration and/or low social connectednes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51, 19-29.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6.05.003>

Bakken, L., & Romig, C. (1992). Interpersonal needs in middle adolescents: Companionship, leadership and intimac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5(3), 301-316.
[https://doi.org/10.1016/0140-1971\(92\)90032-Z](https://doi.org/10.1016/0140-1971(92)90032-Z)

Barzilay, S., Brunstein Klomek, A., Apter, A., Carli, V., Wasserman, C., Hadlaczky, G., Hoven, C. W., Sarchiapone, M., Balazs, J., Keresztesy, A., Brunner, R., Kaess, M., Bobes, J., Saiz, P., Cosman, D., Haring, C., Banzer, R., Corcoran, P., Kahn, J.-P., ... Wasserman, D. (2017).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and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in Europe: A 10-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1(2), 179-186.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7.0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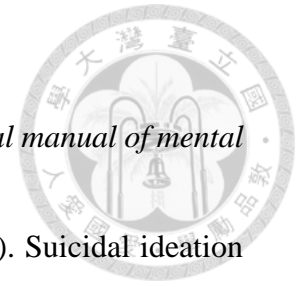
Bauman, S., & Del Rio, A. (2006). Preservice teachers' responses to bullying scenarios: Comparing physical, verbal,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8(1), 219-231.

Beck, A. T. (1976).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Björkqvist, K., Lagerspetz, K. M. J., & Kaukiainen, A. (1992). Do girls manipulate and boys fight?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regard to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18(2), 117-127.
[https://doi.org/10.1002/1098-2337\(1992\)18:2%3C117::AID-AB2480180205%3E3.0.CO;2-3](https://doi.org/10.1002/1098-2337(1992)18:2%3C117::AID-AB2480180205%3E3.0.CO;2-3)

Bourke, C., Douglas, K., & Porter, R. (2010). Processing of facial emotion expression in major depression: A review.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4(8), 681-696. <https://doi.org/10.3109/00048674.2010.496359>

Bower, G. H. (1981). Mood and mem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2), 129-14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6.2.129>



Brown, M. Z., Comtois, K. A., & Linehan, M. M. (2002). Reasons for suicide attempt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women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1*(1), 198-202.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1.1.198>

Browne, M. W., & Cudeck, R. (1993). Alternativ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1*(2), 230-258.

<https://doi.org/10.1177/0049124192021002005>

Brunstein Klomek, A., Barzilay, S., Apter, A., Carli, V., Hoven, C. W., Sarchiapone, M., ... & Wasserman, D. (2019). Bi-direction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uicide ideation/attempts, and depression among a large sample of Europe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60*(2), 209-215. <https://doi.org/10.1111/jcpp.12951>

Brunstein Klomek, A., Snir, A., Apter, A., Carli, V., Wasserman, C., Hadlaczky, G., Hoven, C. W., Sarchiapone, M., Balazs, J., Bobes, J., Brunner, R., Corcoran, P., Cosman, D., Haring, C., Kahn, J.-P., Kaess, M., Postuvan, V., Sisask, M., Tubiana, A., ... Wasserman, D. (2016). Association between victimization by bullying and direct self injurious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ce in Europe: A ten-country study.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5*(11), 1183-1193.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6-0840-7>

Bryan, C. J., Clemans, T. A., & Hernandez, A. M. (2012).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fearlessness of death, and suicidality among deployed military personne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3), 374-37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1.10.045>

Buitron, V., Hill, R. M., Pettit, J. W., Green, K. L., Hatkevich, C., & Sharp, C. (2016).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ce: An indirect assoc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toward other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90*, 143-149.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5.09.077>

Cacioppo, J. T., Hughes, M. E., Waite, L. J., Hawkley, L. C., & Thisted, R. A. (2006). Loneliness as a specific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1*(1), 140-151.

<https://doi.org/10.1037/0882-7974.21.1.140>

Cairns, R. B., Cairns, B. D., Neckerman, H. J., Gest, S. D., & Gariépy, J. L. (1989). Social network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peer support or peer rejection?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6), 815-823.
<http://dx.doi.org/10.1037/0012-1649.24.6.815>
- Cash, S. J., & Bridge, J. A. (2009). Epidemiology of youth suicide and suicidal behavior. *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 21(5), 613-619.
<https://doi.org/10.1097/2FMOP.0b013e32833063e1>
- Clayborne, Z. M., Varin, M., & Colman, I. (2019).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long-term psychosocial outcom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58(1), 72-79.
<https://doi.org/10.1016/j.jaac.2018.07.896>
- Copeland, W. E., Wolke D., Angold, A., & Costello, E. J. (2013). Adult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AMA Psychiatry*, 70(4), 419-426.
<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3.504>
- Coyne, S. M., Archer, J., & Eslea, M. (2006). “We’re not friends anymore! unless...”: The frequency and harmfulness of indirect, relational, and social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32(4), 294-307. <https://doi.org/10.1002/ab.20126>
- Craig, W. M. (1998).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ullying, victimizati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aggress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4(1), 123-130.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97\)00145-1](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97)00145-1)
-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1), 74-10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5.1.74>
- Crick, N. R., & Grotpeter, J. K. (1995).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6(3), 710-72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1995.tb00900.x>
- Crick, N. R., Werner, N. E., Casas, J. F., O'Brien, K. M., Nelson, D. A., Grotpeter, J. K., & Markon, K. (1999). Childhood aggression and gender: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In D. Bernstein (Ed.), *Gender and motivation* (pp. 75-141).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Csukly, G., Czobor, P., Szily, E., Takács, B., & Simon, L. (2009).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 Depressed Subjects: The Impact of Intensity Level and Arousal Dimension.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7(2), 98-103.



<https://doi.org/10.1097/NMD.0b013e3181923f82>

Darwin, C., & Prodger, P. (1998).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Vellis, R. F. (2016).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 26). Sage Publications.

Dodge, K. A. (1986).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In M. Perlmutter (E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s Soci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pp. 85-134). Psychology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02343>

Dodge, K. A. (1993). Social-cognitive mechanis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duct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4(1), 559-584.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44.020193.003015>

Dozois, D. J. A., & Dobson, K. S. (2001).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organization in unipolar depression: Specificity and comorbidity issu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0(2), 236–246.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0.2.236>

Ekman, P. (1992). Are there basic emo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3), 550-55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9.3.550>

Ekman, P. (1992). An argument for basic emotions. *Cognition and Emotion*, 6(3-4), 169-200.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9208411068>

Ekman, P., & Friesen, W. V. (1976). Measuring faci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Nonverbal Behavior*, 1, 56-75.

<https://doi.org/10.1007/BF01115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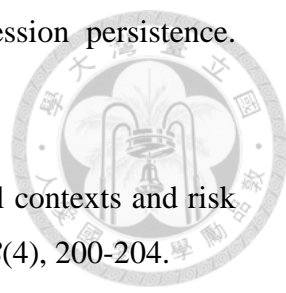
Ekman, P., Friesen, W. V., & Ellsworth, P. (1972). *Emotion in the human face: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an integration of findings*. Pergamon Press.

Ellerbrock, C., Kiefer, S. M., & Alley, K. M. (2014). School-bas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tting the foundation for young adolescents' belonging in middle school. *Middle Grades Research Journal*, 9(2), 1-17.

Fehling, K. B., & Selby, E. A. (2021). Suicide in DSM-5: current evidence for the proposed suicide behavior disorder and other possible improvement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1, 499980. <https://doi.org/10.3389/fpsyt.2020.499980>

Flynn, M., & Rudolph, K. D. (2011). Stress generation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Contribution of interpersonal stress response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 Psychology*, 39, 1187-1198.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1-9527-1>
- Fox, C. L., & Boulton, M. J. (2005). The social skills problems of victims of bullying: Self, peer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75, 313-328. <https://doi.org/10.1348/000709905X25517>
- Franzen, M., de Jong, P. J., Veling, W., & Aan Het Rot, M. (2021). Victims of bullying: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2983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729835>
- French, D. C., Jansen, E. A., & Pidada, S. (2002). United States and Indonesia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reports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by disliked peers. *Child Development*, 73(4), 1143-1150.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463>
- Galen, B. R., & Underwood, M. K. (1997). A develop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aggression amo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4), 589-600.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3.4.589>
- GBD 2015 Disease and Injury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Collaborators (2016).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for 310 diseases and injuries, 1990-2015: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 *Lancet*, 388(10053), 1545-1602.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678-6](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678-6)
- Girgus, J. S., & Yang, K. (2015). Gender and depress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 53-60.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5.01.019>
- Gollan, J. K., McCloskey, M., Hoxha, D., & Coccaro, E. F. (2010). How do depressed and healthy adults interpret nuanced facial express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9, 804-810. <https://doi.org/10.1037/a0020234>
- Gotlib, I. H., Kasch, K. L., Traill, S., Joormann, J., Arnow, B. A., & Johnson, S. L. (2004). Coherence and Specificity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Biases in Depression and Social Phob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3(3), 386-398.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3.3.386>
- Gotlib, I. H., Krasnoperova, E., Yue, D. N., & Joormann, J. (2004). Attentional biases for negative interpersonal stimuli in clinical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3(1), 127-135.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3.1.121>
- Guy, A., Lee, K., & Wolke, D. (2017). Differenc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or adolescents involved in bullying. *Aggressive Behavior*, 43(6), 578-587. <https://doi.org/10.1002/ab.21716>

- 
- Hale, W. W. (1998). Judgment of facial expressions and depression persistence. *Psychiatry Research*, 80(3), 265-274.
[https://doi.org/10.1016/S0165-1781\(98\)00070-5](https://doi.org/10.1016/S0165-1781(98)00070-5)
- Hammen, C. (2009). Adolescent depression: Stressful interpersonal contexts and risk for recurr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4), 200-204.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9.01636.x>
- Hampel, P., Manhal, S., & Hayer, T. (2009). Direct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0(5), 474-490.
<http://dx.doi.org/10.1177/0143034309107066>
- Hankin, B. L. (2005).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Prospective tests of attachment,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and stress as mediating processe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9, 645-671.
<https://doi.org/10.1007/s10608-005-9631-z>
- Hankin, B. L. (2006). Adolescent depression: Description, causes, and interventions. *Epilepsy & behavior*, 8(1), 102-114. <https://doi.org/10.1016/j.yebeh.2005.10.012>
- Hill, R. M., Rey, Y., Marin, C. E., Sharp, C., Green, K. L., & Pettit, J. W. (2015). Evaluating the 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Comparison of the reliability, factor structure,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across five versions.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5(3), 302-314. <https://doi.org/10.1111/sltb.12129>
- Holt, M. K., Vivolo-Kantor, A. M., Polanin, J. R., Holland, K. M., DeGue, S., Matjasko, J. L., Wolfe, M., & Reid, G. (2015). 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s: A meta-analysis. *Pediatrics*, 135(2), 496-509.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4-1864>
- Horn, J. L. (1965). A rationale and test for the number of factors in factor analysis. *Psychometrika*, 30, 179-185. <https://doi.org/10.1007/BF02289447>
- Horwitz, A. G., Berona, J., Czyz, E. K., Yeguez, C. E., & King, C. A. (2017).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ctations of hopelessness as longitudinal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high-risk adolescents.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7(2), 168-176.
<https://doi.org/10.1111/sltb.12273>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9909540118>

Ingram, R. E. (1984). Toward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nalysis of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8, 443-477.

<https://doi.org/10.1007/BF01173284>

Johnson, D., Dupuis, G., Piche, J., Clayborne, Z., & Colman, I. (2018). Adult mental health outcom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5(8), 700-716. <https://doi.org/10.1002/da.22777>

Joiner Jr, T. E. (2007). *Why people die by suicid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iner Jr, T. E. , & Timmons, T. A. (2009). Depression in its interpersonal context. In I. H. Gotlib, & C. L. Hammen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pp. 322-339). The Guilford Press.

Joormann, J. (2009). Cognitive aspects of depression. In I. H. Gotlib, & C. L. Hammen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pp. 298-321). The Guilford Press.

Kaess, M., Parzer, P., Haffner, J., Steen, R., Roos, J., Klett, M., Brunner, R. & Resch, F. (2011). Expla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non-fatal suicidal behaviour among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1, 1-7.

<https://doi.org/10.1186/1471-2458-11-597>

Kaiser, H. F. (1960).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computers to factor analysi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1), 141-151.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6002000116>

Kandel, D. B., Raveis, V. H., & Davies, M. (1991).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ce: Depression, substance use, and other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2), 289-309. <https://doi.org/10.1007/BF01537613>

Kline, R. B. (2011).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3rd ed.). Guilford Press.

Kovacs, M. (1982).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A self-rated depression scale for school-aged youngster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Medicine.

Lagerspetz, K. M. J., Björkqvist, K., & Peltonen, T. (1988). Is indirect aggression typical of femal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veness in 11- to 12-year-old children. *Aggressive Behavior*, 14(6), 403-414.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3.4.589>

Lawrence, K., Campbell, R., & Skuse, D. (2015). Age, gender, and puberty influence



- the development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Article 76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5.00761>
- Lemerise, E. A., & Arsenio, W. F. (2000). An integrated mode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ld Development*, 71(1), 107-118.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124>
- Leppänen, J. M., Milders, M., Bell, J. S., Terriere, E., & Hietanen, J. K. (2004). Depression biases the recognition of emotionally neutral faces. *Psychiatry Research*, 128(2), 123-133.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04.05.020>
- Liu, X. C., Chen, H., Liu, Z. Z., Wang, J. Y., & Jia, C. X. (2019). Prevalence of suicidal behaviour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a large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8(3), 280-289. <https://doi.org/10.1017/s2045796017000488>
- Lu, W. (2019). Adolescent depression: national trends, risk factors, and healthcare dispar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Behavior*, 43(1), 181-194. <https://doi.org/10.5993/AJHB.43.1.15>
- Lopez-Duran, N. L., Kuhlman, K. R., George, C., & Kovacs, M. (2013). Facial emotion expression recognition by children at familial risk for depression: high-risk boys are oversensitive to sadnes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4(5), 565-574. <https://doi.org/10.1111/jcpp.12005>
- Luebke, A. M., Bell, D. J., Allwood, M. A., Swenson, L. P., & Early, M. C. (2010).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children: Specific relations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affect.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9(3), 386-399.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1003691685>
- Maner, J. K.,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 Schaller, M. (2007). Does social exclusion motivate interpersonal reconnection? Resolving the "porcupine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1), 42-5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2.1.42>.
- Mathieson, L. C., Klimes-Dougan, B., & Crick, N. R. (2014). Dwelling on it may make it worse: The links between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relational aggression, rumin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6(3), 735-747.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4000352>
- Milders, M., Bell, S., Platt, J., Serrano, R., & Runcie, O. (2010). Stable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bnormaliti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 *Psychiatry Research*, 179(1), 38-

42.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09.05.015>

Mogg, K., & Bradley, B. P. (2005). Attentional bias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versus depressive disorder.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9(1), 29-45.

<https://doi.org/10.1007/s10608-005-1646-y>

Monks, C. P., & Smith, P. K. (2006). Definitions of bullying: Ag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 and the role of exper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4), 801-821.

<https://doi.org/10.1348/026151005X82352>

Monteith, L. L., Bahraini, N. H., & Menefee, D. S. (2017).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thwarted belongingness, and fearlessness about death: Association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female veterans exposed to military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3(12), 1655-1669. <https://doi.org/10.1002/jclp.22462>

Moore, S. E., Norman, R. E., Suetani, S., Thomas, H. J., Sly, P. D., & Scott, J. G. (2017). Consequence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orld Journal of Psychiatry*, 7(1), 60-76.

<https://doi.org/10.5498%2Fwjv.v7.i1.60>

Nolen-Hoeksema, S., & Hilt, L. M.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In I. H. Gotlib & C. L. Hammen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pp. 386-404). The Guilford Press.

Nowicki, S., & Duke, M. P. (199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f affect: The Diagnostic 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 Scale.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8, 9-35. <https://doi.org/10.1007/BF02169077>

Nyquist, A. C., & Luebke, A. M. (2020). An emotion recognition-awareness vulnerability hypothesis for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3(1), 27-53.

<https://doi.org/10.1007/s10567-019-00302-3>

Olweus, D. (1994). Bullying at school: Long-term outcomes for the victims and an effective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L. R. Hausman (Ed.), *Aggressive behavior* (pp. 97-130).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757-9116-7_5

Opperman, K., Czyz, E. K., Gipson, P. Y., & King, C. A. (2015). Connectedness and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among adolescents at elevated suicide risk: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al behavior.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Suicide Research,
19(3), 385-400. <https://doi.org/10.1080/13811118.2014.957451>

- Peng, C., Hu, W., Yuan, S., Xiang, J., Kang, C., Wang, M., ... & Yu, Y. (2020). Self-harm,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volved in different sub-types of bully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1, 565364. <https://doi.org/10.3389/fpsy.2020.565364>
- Perry, D. G., Kusel, S. J., & Perry, L. C. (1988). Victims of peer aggress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6), 807-814.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4.6.807>
- Pozzoli, T., Gini, G., & Altoè, G. (2017). Associations between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young adolescents' behaviors in bullying. *PLoS One*, 12(11), e018806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88062>
- Puzia, M. E., Kraines, M. A., Liu, R. T., & Kleiman, E. M. (2014). Early life stressors and suicidal ideation: Mediation by interpersonal risk facto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6, 68-7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3.08.027>
- Quiggle, N. L., Garber, J., Panak, W. F., & Dodge, K. A. (1992).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ggressive and depresse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63(6), 1305-1320.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1992.tb01696.x>
- Reed, K. P., Nugent, W., & Cooper, R. L. (2015). Testing a path model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age,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substance abuse,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adolescen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55, 128-137.
<https://doi.org/10.1016/j.chilyouth.2015.05.016>
- Reinherz, H. Z., Giaconia, R. M., Silverman, A. B., Friedman, A., Pakiz, B., Frost, A. K., & Cohen, E. (1995). Early psychosocial risks for adolescent suicidal ideation and attemp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4(5), 599-611. <https://doi.org/10.1097/00004583-199505000-00012>
- Rigby, K. (2007).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Aust Council for Ed Research.
- Rousseeuw, P. J., & Hubert, M. (2011). Robust statistics for outlier detection.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1(1), 73-79.
<https://doi.org/10.1002/widm.2>
- Rudolph, K. D. (2009).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I. H. Gotlib, & C. L. Hammen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pp. 444-466). The Guilford Press.

Rudolph, K. D., Flynn, M., Abaid, J. L., Groot, A., & Thompson, R. (2009). Why is past depression the best predictor of future depression? Stress generation as a mechanism of depression continuity in girl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8(4), 473-485.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0902976296>

Sabbath, J. C. (1969). The suicidal adolescent: The expendable chil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8(2), 272-285.

[https://doi.org/10.1016/S0002-7138\(09\)61906-3](https://doi.org/10.1016/S0002-7138(09)61906-3)

Salk, R. H., Hyde, J. S., & Abramson, L. Y. (2017).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in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samples: Meta-analyses of diagnoses and sympto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3(8), 783-822.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102>

Scheithauer, H., Hayer, T., Petermann, F., & Jugert, G. (2006). Physical, verbal, and relational forms of bullying among German students: Age trend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es. *Aggressive Behavio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ggression*, 32(3), 261-275.

<https://doi.org/10.1002/ab.20128>

Seligman, M. E. (1972). Learned helplessness. *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 23(1), 407-412.

Shariff, A. F., & Tracy, J. L. (2011). What are emotion expressions for?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6), 395-399.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1424739>

Shih, J. H., Eberhart, N. K., Hammen, C. L., & Brennan, P. A. (2006). Differential exposure and reactivity to interpersonal stress predict 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5(1), 103-115.

https://doi.org/10.1207/s15374424jccp3501_9

Slonje, R., & Smith, P. K. (2008).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2), 147-1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450.2007.00611.x>

Surguladze, S. A., Young, A. W., Senior, C., Brébion, G., Travis, M. J., & Phillips, M. L. (2004).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response bias to happy and sad facial expression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Neuropsychology*, 18(2), 212-218.

<https://doi.org/10.1037/0894-4105.18.2.212>

- Teasdale, J. D. (1988).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persistent depression. *Cognition & Emotion*, 2(3), 247-27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8808410927>
- Thompson, A. E., & Voyer, D. (2014). Sex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y to recognise non-verbal displays of emotion: A meta-analysi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8(7), 1164-1195.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3.875889>
- Tseng, H. H., Chen, S. H., Huang, Y. L. (2012). Dissimilar deficits of facial and prosodic emotion re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26(2), 105-113. <https://doi.org/10.29478/TJP.201206.0007>
- Uchida, Y., Norasakkunkit, V., & Kitayama, S. (2004).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happi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5, 223-239. <http://dx.doi.org/10.1007/s10902-004-8785-9>
- Uchida, Y., & Ogihara, Y. (2012). Personal or interpersonal construal of happiness: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2(4), 354-369. <http://doi.org/10.5502/ijw.v2.i4.5>
- Wang, J., Nansel, T. R., & Iannotti, R. J. (2011).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with depress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8(4), 415-417.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0.07.012>
- Weightman, M. J., Air, T. M., & Baune, B. T. (2014). A review of the rol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5, Article 179. <https://doi.org/10.3389/fpsy.2014.00179>
- Wolke, D., Woods, S., Bloomfield, L., & Karstadt, L. (200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rect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and behaviour problems am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41(8), 989-1002. <https://doi.org/10.1111/1469-7610.00687>
- Woods, S., Wolke, D., Nowicki, S., & Hall, L. (2009).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ies and empathy of victims of bullying. *Child Abuse & Neglect*, 33(5), 307-311.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08.11.002>
- Van Droogenbroeck, F., Spruyt, B., & Keppens, G.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results

- from the Belgian health interview surveys 2008 and 2013. *BMC Psychiatry*, 18(1), 1-9.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18-1591-4>
- Van Orden, K. A., Cukrowicz, K. C., Witte, T. K., & Joiner Jr, T. E. (2012). Thwarted belongingness and perceived burdensomeness: Construct validity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4(1), 197-215. <https://doi.org/10.1037/a0025358>
- Van Orden, K. A., Witte, T. K., Cukrowicz, K. C., Braithwaite, S. R., Selby, E. A., & Joiner Jr, T. E. (2010).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575-600. <https://doi.org/10.1037/a0018697>
- Velicer, W. F. (1976).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components from the matrix of partial correlations. *Psychometrika*, 41, 321-327. <https://doi.org/10.1007/BF02293557>
- Yang, C., Nay, S., & Hoyle, R. H. (2010). Three approaches to using lengthy ordinal scal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Parceling, latent scoring, and shortening scale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4(2), 122-142. <https://doi.org/10.1177/0146621609338592>
- Yen, C. F., Yang, P., Wang, P. W., Lin, H. C., Liu, T. L., Wu, Y. Y., & Tang, T. C. (2014). Association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levels/types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55(3), 405-413. <https://doi.org/10.1016/j.comppsy.2013.06.001>



附錄

附錄 1 個人基本資料表


填答說明：在下方內打勾或在__內填寫相關資料。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使用，所有資料都會以匿名保存，請放心填答，謝謝。

1. 生理性別： 男 女
2. 年齡：____歲
3. 就讀學校：_____
4. 年級：_____
5. 班級：_____
6. 請問你平常有下列哪些物質使用的習慣？
 - 無
 - 香菸
 - 酒精飲料
 - 大麻
 - 其他：_____

附錄 2 團體施測版 DANVA-II-TW



(1)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 投影片範例：刺激呈現與反應選項

練 1	+
	1 高興 2 難過 3 生氣 4 害怕

(2) 作答卷

同學你好，現在請你抬頭看投影幕，並聆聽施測者的說明。接下來要請你仔細注意投影片，我們會播放不同的人臉照片，請你辨別看到的情緒種類。每播完一張後，請你以直覺填寫你所看到的情緒種類所對應的數字。

練習題：

--	--	--	--	--

1		16		31		46	
2		17		32		47	
3		18		33		48	
4		19		34		49	
5		20		35		50	
6		21		36		51	
7		22		37		52	
8		23		38		53	
9		24		39		54	
10		25		40		55	
11		26		41		56	
12		27		42		57	
13		28		43		58	
14		29		44		59	
15		30		45		60	

附錄 3 關係霸凌受害經驗問卷



同學你好，這份問卷是想了解你在學校的生活，是否有受到關係霸凌的經驗。關係霸凌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同學，在權力不對等（例：霸凌者在班上比您受歡迎、霸凌者能躲藏而讓你不知道被誰攻擊…等類似仗勢欺人的感覺）的情形下，有意圖地、且長期不只一次地使你的人際關係、社會地位受損的攻擊行為。」請你閱讀以下的題目後，以你回想最近一個學期的經驗，有多常遭遇到題目所敘述的行為？並在各題右邊圈出最符合的數字。

	完 全 沒 有	很 少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常 常 如 此	幾 乎 如 此
1. 有同學故意以交別的朋友的方式來報復我。	0	1	2	3	4
2. 有同學告訴我：除非我聽他（們）的話，不然就不跟我好。	0	1	2	3	4
3. 有同學故意把錯誤怪在我身上。	0	1	2	3	4
4. 有同學惡意不跟我分享（食物飲料、作業筆記...）。	0	1	2	3	4
5. 有同學惡意曲解我說的話。	0	1	2	3	4
6. 有同學接近我只是為了利用我。	0	1	2	3	4
7. 有同學惡意擾亂我。	0	1	2	3	4
8. 有同學在上課分組時故意不跟我一組。	0	1	2	3	4
9. 有同學告訴我沒人想跟我做朋友。	0	1	2	3	4
10. 有同學在我面前刻意說一些只有他（們）聽得懂的事。	0	1	2	3	4
11. 有同學用讓我不舒服的方式迴避、疏遠我。	0	1	2	3	4
12. 有同學散播關於我的不實謊言或故事。	0	1	2	3	4
13. 有同學惡意把我的秘密傳出去。	0	1	2	3	4
14. 有同學用通訊軟體傳批評我的訊息。	0	1	2	3	4
15. 有同學背地裡批評我的外觀或個性。	0	1	2	3	4
16. 有同學到處說跟我有關的八卦。	0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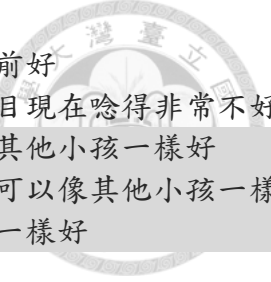
附錄 4 臺灣版兒童與青少年憂鬱量表 (CDI_TW)



下面列出了有關感覺和想法的題組，每一題包括三個句子。請你在每一題的三個句子中，選出一句最能描述你最近兩個禮拜的狀況的語句。每個人有時候會有不同的感覺和想法。因此，這些題組的答案沒有對與錯的分別。你只需要選出最能描述你最近狀況的句子，然後，在這句子前面的□裡，打一個☑。請不要漏答任何一題。

- | | |
|--|---|
| 1. <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爾感到悲傷
<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感到悲傷
<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感到悲傷 | 9. <input type="checkbox"/> 我沒有想要自殺
<input type="checkbox"/> 我想過要自殺但我不會這樣做
<input type="checkbox"/> 我想自殺 |
| 2.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任何事情會如我所願
<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確定事情的結果會不會如我所願
<input type="checkbox"/> 所有的事情都將如我所願 | 10. <input type="checkbox"/> 我每天都想哭
<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想哭
<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爾想哭 |
| 3. <input type="checkbox"/> 大部分的事我都會做得不錯
<input type="checkbox"/> 許多事我都會做錯
<input type="checkbox"/> 每件事我都會做錯 | 11. <input type="checkbox"/> 總是有事情困擾著我
<input type="checkbox"/> 經常有事情困擾著我
<input type="checkbox"/> 偶爾有事情困擾著我 |
| 4. <input type="checkbox"/> 我可以從很多事情中得到樂趣
<input type="checkbox"/> 我可以從一些事情中得到樂趣
<input type="checkbox"/> 我無法從任何事情中得到樂趣 | 12. <input type="checkbox"/> 我喜歡與人在一起
<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不喜歡與人在一起
<input type="checkbox"/> 我一點也不喜歡與人在一起 |
| 5. <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很壞
<input type="checkbox"/> 我經常很壞
<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爾很壞 | 13. <input type="checkbox"/> 碰到事情，我無法做決定
<input type="checkbox"/> 碰到事情，我很難做決定
<input type="checkbox"/> 碰到事情，我很容易做決定 |
| 6. <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爾想到壞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input type="checkbox"/> 我擔心壞事將會發生在我身上
<input type="checkbox"/> 我確定可怕的事將會發生在我身上 | 14. <input type="checkbox"/> 我看起來不錯
<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外表有一些缺點
<input type="checkbox"/> 我看起來很醜 |
| 7. <input type="checkbox"/> 我恨我自己
<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喜歡我自己
<input type="checkbox"/> 我喜歡我自己 | 15. <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必須逼自己去做功課
<input type="checkbox"/> 我經常需要逼自己去做功課
<input type="checkbox"/> 做功課對我而言不是一個大問題 |
| 8. <input type="checkbox"/> 所有不好的事都是我的錯
<input type="checkbox"/> 許多不好的事都是我的錯
<input type="checkbox"/> 不好的事通常並非我的錯 | 16. <input type="checkbox"/> 我每晚都睡不著
<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常睡不著
<input type="checkbox"/> 我睡得很好 |

17. 我偶爾會感到疲倦
 我常會感到疲倦
 我總是會感到疲倦
18.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不想吃東西
 我常常不想吃東西
 我的食慾很好
19. 我不擔心疼痛
 我常擔心疼痛
 我總是擔心疼痛
20. 我不覺得孤單
 我常覺得孤單
 我總是覺得孤單
21. 上學對我而言一點樂趣也沒有
 我偶爾可以從上學得到樂趣
 我經常從上學得到樂趣
22. 我有很多朋友
 我有一些朋友但我希望擁有更多
 我沒有任何朋友

- 
23. 我的功課不錯
 我的功課沒有以前好
 以前我拿手的科目現在唸得非常不好
24. 我永遠不可能像其他小孩一樣好
 只要我想要，我可以像其他小孩一樣好
 我就像其他小孩一樣好
25. 沒有人真的愛我
 我不確定是否有人愛我
 我確定有人愛我
26. 我通常會聽從別人的意思去做
 我通常不會聽從別人的意思去做
 我從不會聽從別人的意思去做
27. 我跟別人相處得很好
 我常與人爭執或打架
 我總是與人爭執或打架

附錄 5 臺灣中文版人際需求問卷 (INQ)



底下的問題要請你想想有關於你自己還有其他人。請你以自己「目前」的信念與經驗去回答每一個問題，「而不是」以你認為、或是對別人一般來說正確的，並且根據你最近一個學期的感受填答。請在量表中找出最符合你感受的數字並把他圈起來。答案並沒有對錯之分，我們關心的是你的想法還有感受。

	完 全 不 符 合	幾 乎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一 半	有 點 符 合	幾 乎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最近我覺得如果我消失了，生活周遭的人會好過些。	1	2	3	4	5	6	7
2. 最近我覺得生活周遭的人沒有我會過得更快樂。	1	2	3	4	5	6	7
3. 最近我認為我是社會的負擔。	1	2	3	4	5	6	7
4. 最近我認為我的死對生活周遭的人是一種解脫。	1	2	3	4	5	6	7
5. 最近我認為生活周遭的人寧願能擺脫我。	1	2	3	4	5	6	7
6. 最近我認為我讓生活周遭的人過得更糟。	1	2	3	4	5	6	7
7. 最近我每天至少有一次滿意的人際互動。	1	2	3	4	5	6	7
8. 最近我感覺有所歸屬。	1	2	3	4	5	6	7
9. 最近我覺得很少和生活周遭的人互動。	1	2	3	4	5	6	7
10. 最近我覺得很幸運有許多支持我、關心我的朋友。	1	2	3	4	5	6	7
11. 最近我覺得我和其他人失去連結。	1	2	3	4	5	6	7
12. 最近我常常覺得我像是社交聚會的局外人。	1	2	3	4	5	6	7
13. 最近我覺得當我需要的時候，我有可以尋求協助的對象。	1	2	3	4	5	6	7
14. 最近我覺得我與其他人是靠近的。	1	2	3	4	5	6	7
15. 最近我覺得其他人是關心我的。	1	2	3	4	5	6	7
16. 最近我有想自殺的念頭	1	2	3	4	5	6	7